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梁衡◎著





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他自己却从没有拿过枪杆子，但笔杆子倒是一辈子须臾不离手。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泽东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毛文堪称空前绝后，他之前没有，他之后也不可能有。毛文所产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它当时指导的工作任务也早已完成，但是为什么人们还在读它，用它？一有事就想起它？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它早已褪去了有形的外壳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成为永远悬在天空，时刻启迪我们的星辰。

毛文的特点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已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之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险峰。





定价：39.00元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梁衡◎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 梁衡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6
（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推荐书系）
ISBN 978-7-5502-7908-7

Ⅰ. ①毛… Ⅱ. ①梁… Ⅲ.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 Ⅳ.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848号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作　　者：梁　衡
选题策划：梁霄羽
责任编辑：夏应鹏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尹　鹏
责任校对：王　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70千字　640毫米×910毫米　1/16　印张：21.25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502-7908-7
定价：39.00元

目录

第一章

文章大家毛泽东



文章大家毛泽东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三十七年。政声人去后，尘埃落定，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以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有拿过枪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帅、十大将，一千多个将军（1955 年第一次授衔将官以上一千零五十二人），从井冈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驱蒋、抗美，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何等潇洒。打仗，他靠的是指挥之能，驭将用兵之能。但笔杆子倒是一辈子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虽然他身边也有几个秀才，但也只是伺候笔墨，实在不能为之捉刀。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险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美文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曾说到，古今文章家有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之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
> 《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五四"时期，刚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每个历史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地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有动摇和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甚至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你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

是不是有《过秦论》中秦王振四海、制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辞：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从上面所举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先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曾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也论文，他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来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

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今人和古人的。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从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了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中国。要让中国的民众和他领导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件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要对中国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翻新改造，结合当前的实际。在毛泽东的书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

这有三种情况。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在一个战士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拉回到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引用它却这样给以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作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

《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简短，只有千数字，而且还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毛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

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 年 4 月在对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甚至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中概括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像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轻松地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

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了。就司氏本人来说，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为中国，特别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但阴差阳错，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也就只好背上了这个形象。

毛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掉书袋。他是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考据癖的程度。如 1958 年

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专科中是找不到的。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袖是不合格的领袖。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不装不假，见真人性。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要端个架子，这是官场的通病。越是大官，架

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许多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的文章虽然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但是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幽默的谈吐。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举重若轻。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用长篇大论来阐述明白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毛曾自信地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先看他的讽刺。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毛在新闻稿中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

《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毛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

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

《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是“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我们再看他的幽默。毛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这不容易。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毛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1956 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对我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也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鲁迅先生也曾有这样的用法：

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它。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

《父亲的病》

毛是很推崇鲁迅的，他深得其笔法。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幽默的谈吐，不慌不忙，说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中共早期的领袖有此才，二战时的国际领袖也有此才，如丘吉尔就以幽默闻名。

战后英国国会通过提案，拟塑一尊丘吉尔的铜像，置于公园。丘吉尔回绝道："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会在我的头上拉屎，还是请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毛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毛之后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也是幽默的。1978 年 10 月邓访问日本，这是一次打破僵局、恢复邦交、学习先进的破冰之旅，任务很重。邓说，我来目的有三，一是互换条约，二是看看老朋友，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仙草"的。日本人听得笑了起来。他们给邓最好的接待，给他看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苦难出人才，时势造英雄，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我们常说，领袖也是人，但领袖必须是一个有个性、有魅力的真实的人，照葫芦画瓢是当不了领袖的。

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一下就被它的开头几句所吸引："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与他们的不同是又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我们先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

《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郦道元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我们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此文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

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是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

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最好的典范。不管是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之前这样的人物不多，他之后这样的领袖也还没有出现。

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的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要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地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地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

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件假、大、空的语言多了，毛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他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和“党八股”的坏文风做斗争的。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在文风之江河日下，“假大空”之登峰造极，否则他会拍案大骂，或者会被活活气死的。

功过与才艺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一个有错、有过的人物。这在官方已有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章方面说，毛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他以大气魄写过许多好文章，但也写了气势不小的《炮打司令部》，发动了“文革”。他相信文章能指挥全党，调动天下。1959年，庐山会议时，“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败象已露，他仍大声宣布要亲自写一篇一万字的《人民公社万岁》。

他辛辣幽默，痛斥反动与落后，但后来却以自己的错误来讽刺别的同志的正确，如挖苦反冒进的周恩来写不出“跃进”文章，说不愿加快合作化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他善用典故，却在庐山会议上借枚乘的《七发》来嘲笑反对“大跃进”的张闻天是发疟疾病，等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历史很有意思，总是把一个大人物推到最高的位置，让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智，建功立业，却又给他权力，让他有条件去犯大错误。

毛的功过自有评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勿让功过掩盖了他的才艺，勿因情感好恶忽略了他的文章。比如他的书法，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因为书法更偏重于形式艺术，离内容较远。其实文章写作也是一门艺术，也有许多形式方面的规律和技巧。毛泽东是职业政治家，但是死后的毛泽东并不全靠政治吃饭。“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不像我们现在的许多干部，退休后一没有会开，就坐卧不宁，无所适从。其实这也不是个新问题，就是古代的皇帝、宰相（他们也是职业政治家）也分两种，有的人亡政息，有的死后还活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或者艺术王国里。这与他们的政绩没有多大关系。如魏武帝的诗、李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艺术就是艺术。当年骆宾王曾起草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看后鼻子都气歪了，但还是忍不住夸奖是好文章。文章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名传后世，抗战时毛泽东还将它作了社论的标题。骆武之争，人们早已忘记，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檄文的样板。可见文章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只可惜常被政治所掩盖。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红尘过后，

斯人远去，还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汲取一点营养，特别是注意补充一点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2013 年 1 月 21 日写毕，2 月 10 日（正月初一）改定

《人民日报》2013 年 2 月 28 日整版刊发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为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毛泽东由于正当新旧时代之交，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思想。他一生处于战争和政治的旋涡中，形格势逼，以文章打天下，不得不搜尽平生所学，拿出十八般武艺，来应酬这复杂的局面。但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他文章的多样性。从大会的报告、讲话到新闻稿的消息、评论，及署名文章、电报、命令、公告、书信，直到祝词、祭文等等，

无所不用。这在古今作家、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检点中国政治文库，贵为皇帝，只用诏书、批奏；权臣重相也只有些谏、表、书、奏之类；八大家文人也不过是些记、赋、辞、说。就是近现代的中外政治家也不过再加上演讲、报告。而毛泽东几乎用尽了中国古今文库中的所有文体，随手拈来，指东打西，挥洒自如。

什么是文章？广义的定义是：有内容的单篇的文字。就是说它只要能传达一定的信息，不是口头，是文字形式，就是文章。如很多应用文。但文章常指单篇的文字，太长了，分出许多章节就变成书本了。狭义定义是：表达思想内容并能产生美感的单篇的文字。这里就有了限制，就是说不只有内容，还得有美感。我们常说的文章其实是这个狭义的定义，如唐宋八大家文章。它不但传播一定的思想信息，还有美感，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我说，文章是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如公文类，属于前者，我们说，写通知、写命令、写决定等等，而不说写文章；散文、论文类属于后者，我们可以说写文章；新闻类是介乎二者之间，但是偏重应用类，属于消极修辞，主要是传播事实信息，我们说写消息、写通讯，或说写新闻，也不说写文章。而为新闻所配的评论是表达思想，并注意美感，所以称写文章。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狭义上的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

面我们一一分析他怎样写这些文章。

一、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

1. 领袖的讲话是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

“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而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毛之后无出其右。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指导现实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讲话，向来是政治领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章中的一种。一个一生没有精彩演说和讲话的领袖，就像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大小会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在他的一至四卷《选集》和一至八卷《文集》（下同）中共收有约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为“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天下官员何多，讲话何多，

官员印发自己的文章何多，但像毛这样的讲话风格进而成文的却不多。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要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愤然图进；二要言语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听得当场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做较长准备，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的，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

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意即亲自打仗开业。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之能了。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

2. 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笔者在政界多年不知接待过多少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又某次到某省采访，听各方汇报工作，一二十个厅局长一律低头念稿。会议室内，唯闻念经之声，只少一个木鱼。我无奈，只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然而抬头不到一秒钟，又低头看稿找字，其局促、羞涩之态仿佛是第一次相亲见人。后来我曾为此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干部怎么不会说话》。无论大小干部已不能、不会正常使用讲话这个文体、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手段，可知全党已作风僵化、能力退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讲话本来是一种交流，一个随机采集、同步加工的过程，是一种即席的创作。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活泼灵动的文风，而由此产生的文字也会是更鲜明更生动。好比树木的嫁接，美酒的勾兑，或者如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在无形的交融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系、新的风格。应该说自有文章以来，口头文学就是书面文章不断更新复壮的源泉，从古老的诗经到宋元平话、明清小说，直到今天的手机“段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胡适曾说，真正的文学史要到民间去找，上了书的都已经变味。而能保证不让书面文字变味、变僵、变空、变假的只有口语。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就是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发现、自

己的腔调讲出有思想、有个性的话，而不是念稿。就像毛泽东用湖南腔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用四川话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的领导全是念稿、背稿，甚至腔调也学播音员，几年也听不到一句自己的话。肢有残，可为帅；不能言，毋为政。中国古代有个孙膑，膑骨被剜，坐在车上打败了仇敌庞涓。美国出了一个著名的总统罗斯福，有点残疾，坐着轮椅照样在二战中领导美国战胜法西斯。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哑巴或播音员当领袖的。讲话实为领袖的第一素质，而许多著名的演说也作为文学名篇传之后世。如丘吉尔的《就职演说》、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

毛泽东作为领袖，起码在讲话方面是称职的（当然他还有政治、军事、文学等等更多方面的成就），他有实践，有创造，把讲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有自己的个性。

首先，他的讲话有王者之气，舍我其谁，气壮山河，是宋玉说的大王之风。不像有的领导一上台就紧张，一念稿子就出汗。你看，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真是气贯长虹。他到重庆谈判，讲了四十多天的话，会上讲，会下讲，与各种人谈。山城特务如林，暗夜如磐。戴笠甚至制定了以“便于随时咨询政务”为名扣留毛的计划。但毛的王者之气，潇洒之风，借他的讲话之声扫开了雾城的阴霾，朋友欢呼，敌顽止步，他胜利归来。

再者，他的讲话有灵动之美。尖锐，敏感，善交流，不木讷，不怯场，

能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中国有句古话叫“扶不起的天子”，不是给你个位置你就会演戏。位高之人讲话常犯两个毛病，要不底气不足，声音发抖；要不爱装个样子，拿腔拿调，失去真我。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毛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的总导演兼主角，何惧一场演说、一次谈话？相反，讲话、演说正是他与这个大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你看他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 “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全场鼓掌）

1954年他出访苏联，谈判紧张，难以抽身，但我留学生求见心切，在礼堂一直等了七个小时，不见不走。毛从外事现场赶来，发表了热情、风趣、理性的即席讲话。至今还传为美谈。这是真领袖，有魅力。

第三，言语通俗，善用修辞，讲话不但好懂，又很风趣。毛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不是经院派，始终和农民、工人、战士、干部厮磨滚爬在一起，他上接孔孟，下连工农，已做到集那个时代语言之大成。王明、康生由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归来，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说，今天是喜从天降，我们在这里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说，我们有武装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队伍。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说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两千年前的人民意见，现在我们更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9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现在技术革命是革愚蠢无知的命，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现在打仗，飞机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行。你看，说昆仑山下来神仙，是从《封神演义》而来；由朱总司令风趣地过渡到鲁总司令；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现在的双百方针；说到要用高级知识分子，就高到一万八千米的高空。1939年他在延安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比喻、对称、拈连、借代、反差等修辞格熟练地运用，大幅度地时空调动，自然趣味横生。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是文章传播的商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毛的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延安窑洞里那样艰苦的条件，那样紧张地战斗，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出访在外，接见留学生的即席谈话也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

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样的名言。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什么风雅。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做了一些修改，但那种轻松、自然、活泼、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这是一种内功，单从字面上是永远学不来的。

现在收入《选集》《文集》中的约一百一十九篇“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毛的这种风格。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讲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二、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

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军情、政情所迫；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三百四十八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

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毛泽东 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 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

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第二，公文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要想一想是给谁看。必须准确、平实，禁用空话、套话。

公文属应用文、实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直接办公。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一针见血，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建国初期，百废俱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以毛草拟的这份电报为例：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

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

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

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全文九百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遇到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而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官场的通病是官一当大、当久了就有架子。这“架子”一是为掩饰自己的空虚、低能；二是有意形成一个框子、套子，既能套住别人，自己又可偷懒。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领导者是最好驾驭的，但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

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第三，文章、文件尽量要短。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在《反对党八股》中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现在是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写。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说的长文之风，现在已是见怪不怪。一个不管什么活动的通知，也要“指导思想”“宗旨”“目的”“内容”“组织领导”等等，一段一段地套。好像长江大桥，前后引桥很长，而就是一步可跨的小河，也要修这么长的引桥。文风日下，文字日长！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八百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七百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一百二十二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文革”后期，知青问题成了一大社会难题，这是毛当初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所始料不

及的。为推动解决问题，也是一种表态，毛给反映问题的人回了一信，并公开发表，信只有三十四个字："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就是这三十四字的信，开始了知青运动的转折。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因为是公文，是权力文章，在滥用职权，而职权滥用的结果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政治腐败。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是治理众人之事，毛泽东说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失去了人众（听公文、执行公文的人），失去了人心，就党亡政息。历史从来如此。又长又空的文风是亡党毁政之兆，也从来如此。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第四，尽可能生动，多一点美感。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文字写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公文在修辞学上属于消极修辞，最讲平实，亦很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居然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这就像吃饭，不一定是多么好的美味，但你不能总往饭里掺沙子，这谁受得了？作为最高领袖，毛每天要看多少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 年 9 月 2 日，他批示《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

文件的意见》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 年 9 月 2 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先过科举再当官，到当上官时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选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现存于《选集》《文集》中毛的约三百四十八篇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毛说："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绝妙的用典，用蒋在抗日声明中的名言来打蒋的耳光。再如这样的句子："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上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

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时势异矣，伟人不再，如今，要在公文中找几篇美文几乎不可能了，毛泽东恐怕是共产党公文中“最后的贵族”。

三、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文章

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事业，无时不在发生重大事件，又无时不在受到解放区内外、国内外受众的关注。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要突破千重阻隔来报道毛和他的事业。写新闻本来不该是毛或政治领袖们干的事情，他们是新闻的主体，是创造时势的英雄，是被采访的对象，各国领袖亲自上阵写新闻的也确实少见。但毛泽东要亲自捉刀，而且还留下了五十二篇写作和修改的新闻作品（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这在中外政治史和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一例。可能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不多，人手不够，毛急而无奈，只好亲自上阵。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毛未当领袖时就在北大旁听新闻，又回湖南创办刊物。他身怀绝技，技痒难熬，关键时刻别人撰的稿又不合他意，便拨开众人，亲自拍马上阵。他也确实技高一筹，留下了不朽的新闻名篇和几段新闻佳话。

毛泽东怎样写新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讲政治，有高度，有气势，留下了时代印痕；二是语言生动、简洁，有个性。说到底是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这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在借媒体的一角来作文章。本来新闻这个行当有两个重要的助手：政治和文学。汝欲学

新闻，功夫新闻外，政治制高点，文学展翅膀。毛泽东政治引领，文学润色，这新闻以外的功夫，不是普通记者、报人所能比的。

1. 用政治家的眼光写新闻。

毛泽东是主张政治家办报的。解放后有一次佛教领袖赵朴初陪毛泽东见外宾，客人未到。毛问道："佛经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句式：赵朴初不是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毛是大政治家，在他眼里，新闻不是新闻，是名新闻，而实质是政治（新闻有四个属性：信息、政治、文化、商品）。他是把新闻当作政治，当作军事棋盘上的棋子来用的。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说，反攻敌人的方法就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他亲自动笔，用新闻稿、评论、发言人谈话、按语等来宣传群众，反击敌人。

1945 年，蒋介石要破坏和平，挑起内战。胡宗南欲进攻陕甘宁边区，毛立即写了《爷台山战事扩大》，揭其预谋，制敌于未动。1948 年蒋介石、傅作义欲偷袭石家庄，威胁已进驻西柏坡的党中央。毛写了《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将蒋军之兵力、部署公之于报端，敌虽出兵，见我有备，只好撤回。其实当时我军守备实在空虚，这是一出名副其实的空城计。而当我军进入反攻阶段后，他的新闻稿《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又是一声声进军的号角。这些新闻稿都是政治炸弹。

虽然是从政治上着眼，为战略服务，毛的新闻稿还是写得中规中矩，

时间、地点、人物、现场，跃然眼前。他是用新闻来翻译政治。下面仅举一例：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一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七日十七时急电］　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蒋军尚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二〇七师（辖三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五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条四百六十五个字的消息又是一颗政治炸弹。是强烈地针对战场形势和国共两党斗争的时局。

开始一句导语“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之后，就不厌其烦地将战事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反复交代，甚至敌军的番号、位置、路线也说得极详细具体。因为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受众（包括敌我双方）对战场上每时每刻的势态、军力变化都极为关注。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许多记者、通讯员经常在稿件中丢掉重要细节，读者最想知道的要素他就是不说。究其原因是受众意识淡漠。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受众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1919 年徐宝璜在北京大学首开新闻学时就强调：“新闻是阅者所关心之最近之事实。”可惜解放后半个多世纪，新闻教科书中的定义都不提“受众”（阅者）。特别是长期以来机关报一统天下，形成了我说你听的坏文风，更忽视了这个最基本的新闻规律。平时记者写稿经常以我为主，忘了读者是上帝。受众是新闻能成立的前提，没有人看的新闻，说了没用，构不成新闻；受众关心的新闻，你说不全，等于白说，也构不成新闻。没有受众，就没有新闻，就这么简单。学术中许多最基本的原理并不高深，只是自然的存在，只要到实践中一悟就知。毛的军事新闻稿都是用来长我志气、瓦解敌军、扭转形势的，有极强的指向性，在这里他使用新闻要素（军情）如同用兵。相信每读到稿中一个被歼灭的敌军番号，我军民都为之一跃，而蒋介石则心中一阵剧痛。用事实说话，这就是新闻的力量，也正如毛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连说的四个“请看事实”。

2. 用个性的语言写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消息、广播，读来、听来都是一个味，谓之“新华体”，没有了个性。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语言就是作者的镜子，能照见他的风采。毛泽东的新闻语言简练、通俗。这也是新闻写作最

基本的要求，但又是最难的，难在出新，难在简练、通俗共性之中的个性。新闻语言有两个源头，一是电报语，要求简而明。因为当初报纸的消息都是电稿，以字算钱，不能奢侈，逼你精短。二是口头语，消息要读，要听，要求通俗。可惜“经院派”“新华体”都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古文底子深，长期以电文指导战争和工作，惜墨如金，数字如珠；又长期与干部、战士、农民生活在一起，声息相通，言语交融。又难得他能将这二者完美地结合。如“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这两句基本上是古文、电文的味道，特别如“猬集黑山”“迅移锦州”“飞将军从天而降”更有书卷气，但到最后一句落地“该敌逃跑也来不及”则完全是口语，真是大俗大雅。类似的句式在其他新闻稿中还有不少，如“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就是毛文，也是毛的新闻稿的魅力，严肃时如宣言，平易处像说话，以叙述为主，却贮满感情，“工人、农民读了不觉为浅，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深”，这种语言的功夫有几人能够达到？

3. 新闻以外的功夫，叙事之外的“情”与“理”。

按常规，消息就是客观事实的报道，就是客观叙述，作者不能抒情，不能评论，如实在有话要说，再另写言论。但毛不管这一套，写稿如用兵，不循常规，想说就说，舍我其谁。如本稿中的结尾处“从十五

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应该说这已超出本消息的事实，可以不要，但毛意犹未尽，随手一笔点评，辛辣地讽刺、调侃、嘲弄，更有一种必胜的豪情。如《中原我军解放南阳》除开头一句导语说最新事实外，整篇都是对形势的叙述评论，结尾一句调侃加幽默，“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种笔法后人是学也学不来的，只有欣赏的份了。他是在写新闻，但这是一个政治家笔下的新闻，是“名新闻”，实政治。杀鸡用牛刀，冰山露一角。所谓经典就是空前绝后，因为你再也不可能重回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作者那样的经历，那样的气势，那样的修养。大道无形，许多艺术领域都是只可意会。如梁启超说苏东坡的书法不要去学，因为你是学不到的。

在政治家、文章家毛泽东的眼里，新闻确实只是“名新闻”，而更是政治，更是文学。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热心读报，细心研究模仿梁启超的报章文字，在北京大学旁听新闻理论，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在广州办《政治周报》，现在他借新闻的外衣来裹滚烫的政治，来吹响战斗号角。他的新闻稿一有新闻之规，二有政治之势，三有文学之美。呜呼，唯其人才有其文，又唯其时才得其文，这恐怕也只能是绝唱了。

新闻消息之外，毛还为媒体写了许多社论、时评、声明、按语、发言人谈话等，都尖锐泼辣，生动活泼，在中国人民解放的大潮中风助

火势，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解放后，毛借新闻指导工作主要是修改社论文章，可惜时势已异，再没有出现新的高峰。

四、毛泽东怎样写政论文

1. 政论文就是政治加文学。

毛泽东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文，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本来政论文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加文学。这是两个基本点。可惜近年来，文学因素常被忽视，政论文也成了枯燥、生硬的代名词，而被异化出散文领域。殊不知，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政论就是论政，是在进行政治斗争、政治建设，写作之前心中有论敌，有靶子，言必中的；写作中笔下有论点、论据，以理服人。论文是政治家最常用的武器，一个政治领袖不会写论文，犹如一个战士不会放枪。政论文是中国文章史的脊梁，从贾谊到梁启超，代代相续，玉树常青。一部政治文章史就是一部政治发展史，与中国的朝代更替、时代变革相缠相绕，绵延不绝。

政论文是以文论政，是用文学翻译政治，是笑谈真理。一个政治家开会、谈话、制定策略、领导战争和建设等等，是搞政治。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宣传自己的思想，这要用到文字，要借助文学之美，不但入理还要动情。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

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毛文是典型的政治家文章。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不离政纲，旗帜鲜明，指向明确，绝无呻吟之作。毛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他的文章里能体会到与他的政敌搏斗的无穷乐趣。他把笔杆子当作战斗的武器，而毫无文人吟风弄月、玩弄文字之习。这是时代使然，一代领袖占据着空前的政治高度，在用文章指挥队伍冲锋陷阵。二是思想深刻，犀利尖锐，有理有据，绝无空话、套话。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想一想在写给谁看”，他是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三是学识丰富，用典贴切，是从中国文化、民族传统的角度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又发展了中国文化。文章极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这已超出政治范畴而具有了文化意义。四是有自己个性的语言，虽然是在说政治但并不枯燥，既典雅又通俗，既庄重又幽默，既古典又现代。这语言来自古典文学语言、群众语言、报告讲话语、新闻报章语、公文用语，是熔多种语言于一炉冶炼成的高强合金。掷地有声，闪闪发光，斑斓多姿。只有他这样饱读诗书、揭竿起事、信仰马列、历经战火、终成领袖的人才可能造就这种特别的语言。

依其公务之身和领袖之责，毛文的内容总脱不了谈工作，谈政治，但是毛泽东骨子里有文人的一面，有追求文章审美的情怀。毛是把政论当文学来做的。毛身上至少有四重身份：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

文章家。他是假文学之手来行政治之责，在工作之时不自觉地创作政治美文。这种手写的文章与“讲话文章”比多了书面的讲究；与行政公文比脱去了具体事务的枯燥；与新闻稿比又跳出了叙事的体例，不受时空环境的限制，常嬉笑怒骂，更见情见理。每篇文章虽都负有专门的指导任务，但从审美角度看，则都已进入了文学领域。或者作者习以为常，竟未察觉，而后人读来益觉其美。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一篇文章美不美有三个标准：描述的美、抒情的美和哲理的美。在一般专业文人的作品中大都止于前两个层次的美，而一般政治家的文章大都没有前两个层次的美，哲理倒是有一点但常常表达笨拙、枯燥，也不甚美。我们在毛泽东的文章中除了可以读到深刻的思想，经常能同时欣赏到描述的、抒情的和哲理的美（这在后面有专门介绍）。这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是毛的过人之处。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过众多领袖，特别是早期领袖大多能文，建国后的领袖又有大量的写作班子与之为文，但为什么唯毛文独领风骚呢？奥妙就在这一点，毛从政治跨入了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诗词赋等抒情文学、小说笔记等叙事文学，无所不通。而许多政治领袖没有跨出这一步。又如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伟人，其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甚至有超过毛的地方，其文章也很朴实、深刻、干脆，但就差这一点点，少了文采，少了文学的美感。不要小看这一点，就像金属中的合金，加进一点，性质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就这一点就拉开了距离，硬是赶不上。邓之后就更

不敢想有人与毛比肩了。政治美文要能写出美感，能将政治理念表达为美好的可欣赏的东西，这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跨界的综合艺术。纯文人或单纯的政治家都干不了。毛是既占有好料又能做出好菜的大厨，是空前绝后的散文大家。

政论文之外，同样是服从于政治斗争，毛还熟练地运用了其他文体，如书信体（致宋庆龄、蔡元培、徐特立等的信）、悼亡体（《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通电体（类似古代的檄文，如讨汪精卫电）、考察报告（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对毛来说已分不清是挟着政治风雷在文学领域振聋发聩，标新立异；还是乘着文学的春风，在政治领域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他亦文亦政，亦古亦新，古今领袖唯此一人。

2. 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高屋建瓴，唯求出新

如前所述，政论文既是政治加文学，那么研究政论文的写法就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表达思想，即它的内容；二是如何提升美感，即它的形式。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我们都知道是科学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科学又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者是靠新的发现、发明，被称为科学家；后者是靠新的思想被称为政治家、思想家。在自然科学界，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就被人淘汰，历史只记住牛顿、爱因斯坦。在政界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也要被人淘汰，历史只记住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当前政界、知识界有一种轻浮、狂躁症，急着写文章、出书，为自己贴标签，树形象。曾有一位领导风趣地说，毛泽东是神，邓小

平是神，别人不行，无论如何装神弄鬼都不行。不行就是不行，愈描愈黑，愈装愈丑。写政论文就像科学家搞科研一样严肃，是靠思想成果说话。社会、革命、建设、改革就是他的实验室。政论文是他的实验成果报告。所以政论文好不好第一条看他有没有新思想，看立意的高度、深度。这本来也是一切政论文所遵从的规律。如贾谊的《过秦论》，讲一个政权为什么覆灭的道理；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讲一个政权怎样巩固的道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讲复兴中华的道理。他们讲得对，讲得好，文章就流传下来。

毛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伟人，是当中国处于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之时的领袖人物，他站在以往所有巨人的肩膀上，讲20世纪的中国怎样革命、进步。他讲历史唯物主义，讲社会历史的演进之理；讲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改造旧中国；讲中国共产党建党和中国革命之理；讲人民战争、民族战争取胜之理；讲群众路线之理；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之理；等等。这些道理都是可以放到每一本政治、哲学、军事专业书里去讲的，但是毛却用文学的语言，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把它表达出来。他是用文学翻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这样讲认识论：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反对党八股》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关于重庆谈判》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总重复毛的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最

可怕的是今天重复昨天的，下面重复上面的，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我们看《毛选》，每一篇文章都是何等的鲜活。

3. 永不脱离实践：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不是叙事文、抒情文，更不是诗词歌赋，它是政治，是真理，在文章诸姊妹中是最秉性严肃而作风实在的一个。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矛盾又上升到主要矛盾。两党三十多年打打停停，怨深似海，蒋介石对共产党言必称匪，这时却突然邀毛去谈判，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慨然前往，并达成协议，全党上下疑问不少。他就写了《关于重庆谈判》。他先讲了在重庆的谈判这件事：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

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事情就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的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

义。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时下政界、报界有一个误区，以为只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一个响亮的笔名，在报上占大一块版面，就能有轰动的文章。其实这种空中楼阁，没有人看。党的十八大专门就党风、文风的整顿提出“八条”意见，习近平指出“长、空、假”是当前文风的主要毛病。为什么“长、空、假”呢？主要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思想作风层面上的问题，是私心作怪。这又有两个原因。

一是私心所起之虚荣心、功利心。小则把发表文章看成一种荣誉、成绩、才华，用来作秀，从来不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大则把文章当作升官的阶梯，企图引起领导重视，造成社会舆论，为提拔重用铺路。二是私心所起之懒惰心。懒得去深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加工创造。按照上面的调子套下来，常用的口号填进去，剪贴拼凑一点社论、评论、领导讲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套话”文章。或者两种心理都有，既想偷懒，又想升官、作秀。这种作风已经脱离了工作的宗旨。毛泽东讲：“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既然是为私，偷懒，不准备斗争、解决问题、解决困难，怎么能望文风出新、文章出新呢？作者在报社工作多年，深为编读“长、空、

假”的稿件所苦（如毛所说：“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深为干部、领导干部争上版面所苦。连头版二版都要争，字多字少都要比，何谈什么无私、牺牲、创新呢？可见文风之败是因党风、世风之衰。一个干部如果工作能创新，文章也就有新意；如果工作平平，却望借文章出名，那真是欺世盗名。汝欲学文章，功夫在文外，先正人心，再谈技巧。

说到技巧，我这里试开一个药方。依作者多年编稿所见，干部写作投稿常犯这样几个毛病：一、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训话式写作，与读者不平等。二、太长太空，没有内容。应酬式、作秀式的写作，没有明确的目标、靶子，本来也不是为解决问题。三、枯燥干瘪，没有细节。公文式写作，不会运用形象思维。四、语不准确，糊涂为文。基本的概念、逻辑关系都没有搞清。五、语言不美，生动不起来。读书太少，没有修辞训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多读书，提高修养，但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只要心诚，不要自欺欺人。真想写作可以试一试这个笨办法，也比较好操作：一、能提出一个新问题（证明你是在思考，有的放矢）；二、有一个自己悟到的新思想（可看出你对理论的理解）；三、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证明你经过了调查研究，已能理论结合实际）；四、有一个合适的比喻或典故（这说明你已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五、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说明你不是抄文件，抄社论、讲话）。这个办法是比较笨，但只要上了这个线，你就从党八股中解放出来了。不是文件语、秘书语，是你自己在说话了。

不脱离实践，强调理从事出，这有点像作家不脱离生活，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文学作品产生的主要是审美效果，政论文产生的主要是思想。

4. 善于综合运用：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我曾有专文《文章五诀》，谈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五色花纹交错成锦绣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没有模式，没有重样。多色彩、能变化就是美文。怎么变呢？主要是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这五种手段，变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个层次。我们姑且叫“三层五诀法”。

因为文章的基本文体是描写、叙述、抒情、说理，所以再复杂的文章总不脱形、事、情、理、典这五个元素。不过因文章的体裁不同，内容、对象不同各有侧重。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组合，五彩斑斓。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为了说明“文章五诀”的用法，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专业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现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对他也喜欢的，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1959 年 4 月 5 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围绕穿插，编织为文。你看文中有“事”：静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莲赋》《西洲曲》；有“理”：讲独处的妙处。但是全篇都洋溢着情感，字里行间都是“情”。

再举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阳楼记》，毛对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

这篇文章中是想说一个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开头先说“事”：滕子京修楼；再写“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个“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泽东不是专业作家，更不是虚构故事的小说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说理，但是他不直说、干说、空说，而是借形、事、情、典来辅助地说，如彩云托月，绿叶扶花。就如你是一个善画高山峻岭的山水画家，但只画山不行，你也得辅以石、树、竹、村庄、人物等，并且要有机地组合。毛的文章以理为主，但他善用形、事、情、典去表现、烘托、突出理。

（1）借形说理。

形，就是有画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场景等。这在叙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说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论文中却几乎不见，因为它不能直接阐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

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组织起来》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我们再看他的人物形象的使用。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造反农民的形象，我们知道《报告》的主题是讲造反有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所以文中有多处这样的形象。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这是国民党军败将的形象，用在评论中长我志气，灭敌威风。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特别是对所要批驳的靶子，常常用形象说出。如：“因

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这里本可说“许多人有麻痹情绪”，但这是用概念，他宁肯换成“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以上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句话的本意是敌人很顽固，你不打，他不走。毛却把它转化为一个文学形象，就强化了作者的论点。有时候他并不是专门去塑造，而是随口说出便也十分形象生动。如：

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有趣的是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中国最大的两个政治派别，两个政治人物，不知互相“政论”了多少文章。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

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可耻事业的覆灭。

《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2）借事明理。

事，指过程、情节、故事，是叙述的方法（形是描写的方法）。事与形不同，形是静止的画面，事是动态的过程；形是停留、定格的表

面形象，事却有内容、情节。前面已经有专门一节谈“理从事出，片言成典”，是从文章的宏观立意上说毛文总是从大事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理。这里是从具体方法上谈在文中说理时怎样穿插叙事，借事明理。叙事多用于纪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

《给傅作义的信》

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下面更是一大段的叙事，讲“我”遇到的真实的事，讲共产党不会上当、不怕威胁、人民必胜的道理：

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

（3）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

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泽东文章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都是时代之情、人民之情。他的一生，时刻都被战争、苦难、理想和胜利所激动着。毛的性格有诗人气质，好激动，执着、坚定、浪漫，甚至有时走极端。这种性格在工作上有利有弊，有了革命、建国的成功，也有大跃进、"文革"的失败。这在文学方面却是好事，文学需要想象，需要浪漫。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作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憧憬之情。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届政协会祝词）

这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关于重庆谈判》

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

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断，但完全是诗的语言。任何一个诗人、散文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情感和豪放的语言，在他之前及与他同时的政治家中也没有过这样的情感与语言。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的作品的始终，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虽然都是严肃的政论文，但有感情无感情大不一样，用什么样的口气说出大不一样，这一个“情”字里有力量、态度、决心、

方向，领袖情动，群众动情，千军万马，海啸雷鸣。

《论联合政府》是七大的政治报告，主要是阐述党的当前任务。这是一个最后打败日寇、建设新中国的总动员。是共产党在战争时期的最后一届党代会。报告分五大部分，阐述形势、任务、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严肃的、庄重的政治报告，但是其中有多处大段的抒情文字以情助理，不但没有冲淡报告的严肃性，反而增强了报告的战斗性和豪迈感。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论联合政府》

（4）借典证理。

领袖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说“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 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

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们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愿作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等都很幽默。

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 1939 年 7 月 7 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只是要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

英雄气概。”

这里也是只为从“颂”字引出下文。

总之，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 342 条。

（5）综合运用。

下面我们选两篇文章举例，看一看毛文是怎样“一字立骨，五彩斑斓”，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的。

《愚公移山》是毛泽东 1945 年 6 月 11 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七大是很重要的一个会。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权范围内堂堂正正地开党代会。这之前，或者是秘密召开地下大会，或者跑到境外去开（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当时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又面临国共大决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这么重要的大会，毛的闭幕词只用了一千两百多个字。他响亮地提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大会的路线，也是文章的立论，是文章要讲的“理”。但是作者没有以理说理，像有些政治报告那样没完没了地、原地踏步式地说教，而是以“事”说理，以“典”证理，以“情”助理。总体来讲，全文的风格是平静地叙说，寓说理于叙事，再助以形象、情感。

文章开门见山，一叙开了一个大会，讲大会路线；二叙一个寓言故事，下定决心，争取胜利；三叙为美国人送行，讲对美政策；四叙这几天国共都在开会，但是结果将会不同。叙述中有具体的事件、人物、情节、形象，跳出了政治报告的老套，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自信，谈笑间，大局一目了然，前途就在眼前。最后，是一句带感情色彩的结尾。这也说明文章的力量并不只是文字本身，

而主要是时势的力量、作者的权威。如果换一个人，同样来讲这一席话，未必有此效果。

愚公移山

〔**事**〕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做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做广泛的解释。

〔**理**〕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典**〕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作太行山，一座叫作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

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形、事**〕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

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事**〕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理**〕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

〔**情**〕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这里顺便说一下细节在议论文写作中的运用。《愚公移山》中有一处，“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一般来讲，这样的句式不用在政论文中。这是描述句，而描写、叙述的句式多用在写景、叙事文中，求形象，要细节，是为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议论文主要用逻辑思维，多用概念、推理。毛文大胆地借用形象思维，使读者于沉闷、枯燥的推理中突然眼前一亮，心中一振。还有，形象思维是管记忆的，细节正是为了强化形象、调动记忆。文中这一句话

于文章内容关系不大，于阅读效果则关系极大。一是拉近距离，营造气氛；二是加深记忆。这叫“起棱”，我们看木器家具，比如一个小桌、一个首饰盒，如果四面平光就显得一般，很普通，如果起一点棱，做出点花纹立即就不一样，人们更爱把玩。文章也是这样，不能一块平板玻璃。我在报社工作时见到编辑编稿，总爱把人家文章的“棱”磨掉，这是图省事，不懂读者心理。为此，曾写了一篇《编稿要多用刻刀，少用锉刀》，专讲改稿留棱，不要把文章锉平。比如：“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中国底子薄，要赶上西方先进国家，我看要一百年。”“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是文章中起的一个棱，是在借用“形”和“事”说理，而编辑却以为无用，勾掉了，只留“毛泽东说”。殊不知这样一来，文章少了生动，多了平淡，少了一些可记忆的符号。假如我们把“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这样的句子都勾掉，《愚公移山》也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再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例，兼谈一下文章中意象的运用。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这是政治，是观点和立场。但只有正确的观点、敏锐的目光、深刻的理论还不行，如果只有这些，你去当你的政治家、理论家好了。你现在是要用文章宣传政治、普及政治，要借助文学的外衣产生美感，好让人亲近政治。作为文学作品，要讲形象、生动、含蓄、凝练，要有景、有情。所以政治家为文，或者文学家写政治，要能从政治之理中翻出情，翻出美。这是真功夫。

《别了，司徒雷登》是毛泽东政论文章中最文学性的一篇。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中除了“形、事、情、理、典”各要素俱全外，作者还罕见地使用了一个典型的散文手法：“意象”。而这正是散文写作的高难动作，就是在一般散文中也不常用的。这里涉及一个创作理论，

容我多说几句。

意象是什么？就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是一种象征，是借以还魂的躯壳，是诗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此法是纯文学手法，是行家里手的标志，犹如高音歌唱家之花腔，足球射手之倒钩，篮球之背投。意象是拿一个景物或一个镜头、一个形象来象征一种情感或阐述一种道理，是借实写虚。

但要注意，意象与其他手法的不同。意象不同于形象，形象侧重视觉效果，意象侧重心理效应，就是说比形象更深了一步，这形象里必得能变出点耐人寻味的东西。意象不是比喻，比喻是两个事物，意象是就从一件物生发开去，是从一颗茧里抽丝。意象与咏物、寓言相近，但也不同。咏物、寓言是直接从景物和故事中生发出情理，而意象是间接说事，如直接考察反与这物、事无关。如《爱莲说》是以莲说理，《愚公移山》是以愚公挖山这个故事说理。莲的形象与品质高洁，《愚公移山》的故事与奋斗坚持的道理都有直接关联。《别了，司徒雷登》中的政治主题与“别了”这个意象反而没有直接的表面的联系。它只取其曲折、隐晦之一点，曲径通幽，自圆其说，解出一篇大文章。所以说意象是集形象、比喻、咏物、寓言于一身。这个“高难动作”在诗歌中会用到（如徐志摩《再别康桥》），在抒情文中也只是偶一为之（如朱自清《背影》），政论文中几乎不见。文似看山不喜平，东边日出西边雨。毛是军事高手，当然懂得暗度陈仓，出奇制胜。

下面我们结合“文章五诀”来看他怎样做这篇文章。

文章开头还是从“事”说起，“白皮书来了，司徒雷登走了”，很具体，很形象。作者就从这个小口切入，慢慢道来。中间的文字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美国的角度讲它的侵略政策和所作所为，

包括白皮书的内容；后一部分从中国人的角度，谈如何不要受骗，对白皮书进行驳斥解剖。最后两段是收尾部分，却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镜头，是“形”字诀：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你看，首尾呼应，形象生动。这哪里是政论文，是小说，是杂文，是电影，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国共之战，这么大的题材全被他压进“别了”这个小葫芦里，把玩于手心。司徒雷登，一个曾创办了燕京大学的文化名人，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当了驻外使节，也只好代主子挨骂受过了。别了，美国的侵华野心；别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别了，中国人曾经受骗上当；别了，一个旧中国、旧时代。

“别了”这个意象在作者手里抽出了无尽的诗意。

文中还有不少生动的写“形”之处：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文中带有感情色彩的句子也不少：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至于用典就更多了：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等等。

文章五诀，随手拈来，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4. 毛泽东，不可复制的经典。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毛，只说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就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张闻天，毛是第六代，还不说同期的许多人物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有王明、张国焘等。这里除向忠发是个工人外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为留洋归来的马列理论家，或为工人运动、军事斗争的领袖。总之是群雄际会，各有资本。毛所以能脱颖而出，一是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第一线，在群众中踏踏实实做事；二是饱读书本，包括马列理论，特别是中国各种典籍。三是独立思考，必求创新。他是既虚心好学又雄才大略睥睨一切的。唯此才铸就他的事业与文章。所以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

毛文是一个经典，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我在《说经典》一文中说，凡经典一是空前绝后，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使用。毛文堪称空前绝后，他之前没有，他之后也不可能有。毛文所产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它指导当时工作的任务也早已完成，但是为什么人们还在读它，用它，一有事就想起它？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它早已褪去了有形的外壳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成为永远悬在天空、时刻启迪我们的星辰。我们至今在做文章时还不得不时时想起它、借鉴它。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有许多经典，都是不断吸收前人的成果，又自己创造生

成一座座的高峰，毛泽东就是这样一座离我们最近的高峰。

时下党风、文风弊端丛生，假、大、长、空、媚，泛滥成灾，以至于要党的政治局通过“八条”，要整顿党风、文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看毛文，实在是一面绝好的镜子。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2013年10月8日

毛泽东文章中的修辞研究

修辞是讲话、写文章时在语言这个层面的技巧（不是立意、结构等宏观层面上），主要是为了更准确、形象、生动地表达思想，同时产生美感。它属于语言的形式艺术的范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已有不少专著。影响最大的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而在生活中人们也总在不自觉地运用修辞手段，愈是民间的、基层的语言，修辞愈丰富。毛泽东是既多读书又长期生活在群众中的人，所以他的文章中修辞手法运用极多且很自然。常能出神入化，收意想不到之效。当文章内容本已经表达清楚，可以收笔之时，突然又跃上一个台阶而开出艺术之花，有惊艳、奇绝之美。可知修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专门锦上添花的。按说这不是对政治家、领袖的要求，我们也本不必以此来苛求于他们。但毛却能通此道，这得力于他年轻时的苦读多背，和后来留意向群众学习语言。于是这又为他的文章多增加了一份魅力。

我们这里并不作专门的修辞学研究，只是借门入径，来欣赏毛文。所以不必分得很细，也论不到所有的修辞。为了好记，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句面形式上的，即还是那些字、词、句，但在形式上一经重新排列组合，即能产生新的美感，如排比、递进、对仗、倒装、顶真、叠字、回文等；二是材料上的，即在原句的基础上借来新的材料，加强作者的表述，从而产生新的美感， 如比喻、双关、借代、仿拟、拈连等；三是意境上的，即主要目的是追求气氛、趣味、效果的美感，

类似戏剧里的音响和绘画里的写意效果，比如夸张、示现、呼告、拟人、比兴等。这三个类型常常穿插互用，并不能截然分开。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修辞也在发展，比如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网络语言和适应网络、手机的修辞。

下面我们分别举例。

一、形式上的

这类修辞的效果主要是作用于读者的视觉、听觉，初一接触，且不说内容，从形式上便产生一种美的享受。重在调动形式美的要素。

1. 对仗

对仗又叫对偶，是指两个句式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能产生整齐、平稳、饱满的美感。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

将“核心力量”与“理论基础”这样宏大的内容用一组对仗句表达。简明、扼要、易记。这成了一句著名的口号。

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四句一、二与三、四各自组成对仗，但全部四句又组成排比。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

"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很漂亮的对仗，可以看出作者的古文底子。

2. 排比

排比是连续用相似的句式和口气表述同一问题，形式整齐有一种步步紧追，排山倒海之势。如：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以上三例是分别对不同的对象，论述不同的问题，都熟练地用了排比。第一例连问三个“存在”（同时也是“设问格”）斥敌；第二例连用四个“为了”说理；第三例连用三个“是”肯定和歌颂。

3. 反复

在陈望道先生的书中称之为“复叠”，我们不如就通俗地称为“反复”。是指将一句话（短语）或一个词反复说两遍或更多。反复与下面谈到的叠字虽然都是偏重形式上的美感，但又有不同，前者是意思上的重复，借形式来强调内容；后者是字词（更多是字）上的重复，借形式来营造形、声上的美感。

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整顿党的作风》

这段话中作者重复“好箭！好箭！”以强调那些嘴上只说空话，不联系实际的态度不可取。

4. 叠字

叠字就是将一个相同的字连着重复使用，在句中造成一种铿锵、回环的效果，主要是收获音韵上的美感，所以在诗词中常见，文章中不多。如杜甫的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毛泽东词中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祭黄帝陵》

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赫赫”“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都是叠字。读者可以体味文字被强化后的音韵效果，进而由此形式的效果带来的内容的效果。

5. 设问

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将叙说的句子变成问答形式。设问有两种，一种只问不答，不言自明；一种是作者设计一个问题，接着作答。

第一种：

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

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将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其实已经很明白，是为了强调而“明知故问”。

第二种：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源泉”从何而来呢？作者自己一板一眼地剖析作答。

第一种与第二种的结合：

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

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作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6. 顶真

过去做针线活时手上带着一个工具叫“顶针”。顶着针往前推进。修辞的顶真就是下一句的开头重复上一句的结尾，句子头尾相连相顶，有上递下接的趣味效果。如：

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

《学习和时局》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两例中的“知识分子”“老年人”“刀”都是“顶真”之处。

二、材料上的

是指在行文时为说明问题，常要借来新的材料进行对比、分析，或将原有字词材料重新分析、组装，产生一种材质的美和组合的美。这时读者的美感首先来自材料。就如我们看到一件衣服，它向你展示的、引起你注意的主要不是设计样式，也不是这衣服与人结合的气质（意境），而是材料的质地，是布、绸、麻还是化纤或者是它们的混纺。

1. 比喻

比喻是用甲来比乙，通过甲乙之间的相似点，转换思维，让读者更生动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意图。甲乙中有一项是主要的，而另一项是借来的材料。甲乙之间相距越远越好，在不可能相似的事物间找到了相似点，别有味道，出奇制胜。比喻和被比喻的事物间必须有一点相似，但不能相同。比喻又分三种。一是明喻。甲像乙，甲乙之间有“好像”“如同”“一样”“若”“似”等词语相缩连。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就像飞机上天，总得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这两例用“一样”“像”将相距甚远的甲乙相连，是用具体的物来比抽象的理。

二是隐喻，又叫暗喻，甲就是乙。甲乙之间常用“是”连接，或只说甲乙，省掉“是”字。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

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隐语常用在肯定、强调的语境中。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不用怀疑。

三是借喻。干脆连甲也省掉，直接说乙。更含蓄、幽默。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

《关于重庆谈判》

前例直接说乌龟壳，借指碉堡；后例直接说有个脚盆，借指盆地；

有鱼有肉，借指我繁荣的解放区。可以看出借喻比隐喻更幽默、含蓄一点，常用于轻松或讽刺的语境。

2. 引用

在文章中直接引用别人的话以增加文章的可信度、权威性。

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组织起来》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

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说的是战略防御的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例引了一句古语，二例引了一句民间谚语，三例较完整地引了一段《左传》里的原文来说明战略战术的原则。是借古喻今。

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评战犯求和》

上例是引用对方的原话来成心驳斥对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毛泽东善辩，一生不知写了多少批驳敌人的文章，多及这种引敌批敌的方法。

3. 借代

当说甲时不直说，而是用乙来代替。以收婉转含蓄之效。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反对党八股》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

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例借“羊肉、鸭子”来代替“物质生产”；二例借“懒婆娘的裹脚”来代替长而空的文章。三例从头到尾都是讲“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但读者一看就知是在说反动派。

4. 映衬

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

《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

《反对党八股》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

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一例“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二例“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三例“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都是两相映衬。映衬在形式上又同时常表现为对仗格。

5. 析字

通过对单字或词的形、音、义三个方面的拆解、解析而变化出新的意趣，从而引申文章的效果，这是析字。汉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开发的空间。在文章最小的单元内都可以挖掘腾挪，这是汉字的独特魅力，任何外语都没有这个功能。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二十二年以前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就到井冈山上，成立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人很少，枪也很少。开始时，大家都说不行，国内外敌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是“匪”。匪者非也，就是说

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四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行不行呢？行得很。拿铁路来说，我们也要和国民党比一比，看谁把铁路办得好，是国民党办得好呢，还是我们办得好？这在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我相信，大概一年左右，特别是在东北，铁路事业就可以走上轨道了。将来我们再逐渐改进和发展，一定能在全国把铁路办得比国民党好。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这里把“匪”借谐音析到“非”上，然后借“非”之义展开论说。

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先析出“文”的反义词“武”，再从“武”字上解析，然后引申，展开论说。

6. 摹状

摹状就是摹写事物的状态，以造成一种如见其物、如临其境的效果。有摹写声音和摹写形状两类，来调动读者的听觉、视觉审美。一般摹写声音的较多。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反对党八股》

一例的“劣绅！今天认得我们！”是摹声；二例的“哇哇地叫”是摹声；“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是摹形。

7. 拟人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在羊肉面前没有威信”是把羊肉比拟为会说话、有思想的人。我们在和羊肉对话。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反对党八股》

这里是把党八股比拟为一个人，一个瘦瘪三。

三、意境上的

这一类修辞虽然也会用到形式、材料等法，但这时要达到的重点效果不是形式感观的美，而是直取内容，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意境的、趣味的美。类似国画的写意。这时作者主要不是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的直觉美感，而是调动他的思维联想，制造一个供读者思考享受的空间。

1. 讽喻

讽喻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临时造出一个故事，用故事来打比方，取讽刺、劝谏、阐发之效。与比喻不同处是，不只用一件事物比，而是用一个故事来比，但又不是寓言，这故事极简单，重点不在情节，而只在说出一个理。它有点接近寓言，但寓言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完整故事，而且是只寓意其中，并不挑明其意。讽喻是必须挑明其意，毫不避讳。如：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

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这是以坐井观天来喻主观片面。但作者不直接用成语"坐井观天"，也不慢悠悠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把这个成语故事飞快地、粗略地说了一遍，重在讲后面的理。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作者临时设计了一个"摘桃子"的故事，很生动。以后"摘桃子"倒成了一个常用的成语。

2. 递进

递进是用连续的口气步步深入，层层揭示以收刨根见底之效。如：

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

《必须制裁反动派》

这是论证中的递进，层层推出是反动派在指使。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头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这是叙述中的递进。

3. 呼告

作者写文章是给读者听或看的，但是行文中作者突然撇开读者，直呼文章中人或物，这叫呼告。有一种活泼跳跃、戏剧演出的效果，说评书时常用到。如：

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

《评战犯求和》

作者引过蒋介石的话后突然“哎呀呀”，以第三者的身份旁白一句。

4. 示现

示现是作者用超时空的手法，把并没有看见、实际不存在的场景说得如在眼前，化抽象为形象，更生动活泼。有一种特写镜头的效果。如：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

《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一个军被我包围击溃》

上两例中，蒋介石率领一群人跑、袖手旁观、住在北平看东北等，实际没有这个景，这是作者用示现手法推出的一个高度概括的典型化镜头。

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

《反对党八股》

"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这个镜头也是作者随手设计的，以示读者。

5. 夸张

前两个时期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做了不正确的事，叫作跌跤子。我们把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时局问题及其他》

"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比喻残酷斗争。人当然不可能磨成粉，这是夸张。

6. 拈连

在讲甲时顺手过渡到乙，巧妙地利用甲乙之间的某种联系。产生"一桥飞架南北"的效果。这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字面的拈连，如：

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组织起来》

这两个例句中就是从“文化团体”拈连到“武化团体”；从“救国公粮”拈连到“救民私粮”。这是从词面上的拈连。

还有词义上的拈连，如：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论人民民主专政》

“刺激”这本来是说对反动派的，这里拈连到“老虎”身上。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

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

《反对党八股》

“起床”本是专指人的动作，作者顺便把它拈连到“教条主义”上。同时也是一个拟人格。

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

《时局问题及其他》

说一百多万老党员是土里生长出来的，这是把人在斗争中的生长与种子在土壤中生长相拈连。

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的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

《反对党八股》

“调查研究”本是说工作，却拈用到洗脸。

现在戏剧、小品特别是喜剧中常用一种手法叫“穿越”，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中早就用“拈连”格来实现“穿越”，在政治宣传中别有味道。

薄一波在《回忆片断》（见198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一文中提到毛的一次讲话："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组织班子南下、地方干部、建立根据地等，这都是共产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专用词汇，把它拈接到四世纪的三国时代。这就是辞格造成的幽默效果。

7. 警言

又名警句，就是用极精练的语言，抽象出极深刻、准确的哲理。

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论联合政府》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1957年在苏联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反对本本主义》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以上这些句子已经成了后人常引用的名言。

8. 起兴

起兴是借上面的一件事引出下面的一件事，两者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只是借某一点的相似，来作引子巧妙地过渡。以收奇、趣、巧及轻松、活泼的效果。好像长江上建一座大桥，在离河岸的远处就开始起建引桥。这在诗歌，特别是民歌中常常用到。

如 1939 年 7 月 7 日，毛泽东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 (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只是借“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也是只借“颂”字引出下文。

9. 倒反

倒反就是说反话，字面的意思和心中的意思正相反。这分两类，一类是只语意相反并无讽刺之意（有时正是情深、爱惜）；第二类是讽刺。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作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反对党八股》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

《质问国民党》

那么，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以上三例都属第二类。

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文风

问：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们注意到今年春节一过，在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就罕见地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您的《文章大家毛泽东》，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您认为现在研究毛泽东的文风有什么特殊意义？

答：先要说明一点，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领袖。今天我们纪念他、研究他的文风，是针对现在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怎样写文章。

从来的纪念都是对历史的盘点和对未来的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积累下不少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党风、文风更是倒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由得会想起过去，反思党史。以史为镜这也是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毛泽东也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重提毛泽东的文风，研究它、学习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党风、文风及领袖之风的批评和呼唤。

问：您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毛泽东的文风。您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哪些特点？

答：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个侧面。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这实际上也是

一个领袖的素质，是民众对领导人的期待。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

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读过毛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气势。

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一段文字由周恩来手书，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两个伟人的作品，文章、书法都是一绝。可谓中国最大的一块“双绝碑”。中国人民真为他们的第一代领袖自豪。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至今已十二任领袖，毛是第六任，毛之前中国革命无此气象，毛之后事业的气象倒是大了，但领导人说话的底气却越来越小。特别是在对外方面。人民不满意，就怀旧，怀念毛、邓。

毛文的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现在知道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的一首诗《咏

青蛙》，就气度不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他在青年时期办《湘江评论》，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讲：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届政协会祝词）

他是一生英雄，绝不服软，绝不示弱，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和王者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给我们一点思想吧，这是人民对一个领袖的起码要求。

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毛在各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两个务必”，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这些都体现在他的文章中。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却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毛

文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

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一场临时的接见他就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的话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有学者式的积累，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

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我们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 1939 年 7 月 7 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只是要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三百四十二条。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也是只为从“颂”字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是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残疾的人都可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

小的字，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一看，“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回家就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我们先看他典雅的一面。

这是他早期的一段典雅的文字，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郦道元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

这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这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

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钩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1956 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

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毛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问：毛泽东无论写诗词、写新闻稿、写报告，都能做到笔走游龙，游刃有余。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

答：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先说毛泽东的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九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长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眼睛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十年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七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

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

毛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只《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就引用了成语、典故三百四十二条。

第二个秘诀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

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

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大大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秘诀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1948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四百零八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

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问：党中央提出号召端正党风、文风的《八条》后，您很快出版了《文风四谈》，短短数月已再版三次。在书中你对“假、大、空、媚”的文风提出尖锐批评。并且，其中专有一章是《回看来路，想起毛、邓》。您认为，今天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学习做文？

答：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

题是上下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是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

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

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成风。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前面我说过，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是一个读书人。我们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得了便宜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当官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出书。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您曾提到，“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您为何将文风复兴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定位得如此重要？您认为我们当下该如何实现文风的复兴？

答：我在《文风四谈》中曾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中。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上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民族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

如何实现文风复兴？两条，一是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讲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说：

“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不能掉以轻心。这也是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对他最好的纪念。

第二章

文章之外的毛泽东

这思考的窑洞

我从延安回来，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

照理说我对窑洞并不陌生，我是在窑洞里生、窑洞里长的。我对窑洞的熟悉，就像对一件穿旧了的衣服，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三年前，我初访延安时，这熟悉的土窑洞却让我的心猛然一颤，以至于三年来如魔在身，萦绕不绝。因为这普通的窑洞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而那些伟大的思想也就像生产土豆、小米一样在这黄土坡上的土洞洞里奇迹般地生产了出来。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斗争的心脏，是艰苦岁月的代名词。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延安的形象是战争，是大生产，是生死存亡的一种苦挣。但是当我见到延安时，历史的硝烟已经退去，眼前只有几排静静的窑洞，而每个窑洞门口又都钉有一块木牌，上面写明某年某月，毛泽东同志居住于此，著有哪几本著作。有的只有几十天，仍然有著作产生。这时，仿佛墙上的钉子不是钉着木牌，而是钉住了我的双脚，我久久伫立，不能移步。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几棵柳树轻轻地垂着枝条，不远处延水在静静地流。我几乎不能想象，当年边区敌伪封锁，无衣无食，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每天都十万火急，毛泽东同志却稳稳地在这里思考，写作，酿造他的思想，他的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在

中国，有两种窑洞，一种是给人住的，一种是给神住的。你看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石窟存了多少佛祖，北岳恒山上的石洞里甚至还并供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实际上是老百姓在假托一个神贮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偶像，眼前这土窑洞里甚至连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没有，但是五十年了，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因为这窑洞里的每一粒空气分子中都充满着思想。我仿佛看见每个窑门上都刻着"实事求是"，耳边总是响着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的那句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自党中央1938年1月由保安迁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先后住过四处窑洞。这窑洞首先是一个指挥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为了这些决策的正确，为了能给宏伟的战略找到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在这里于敌机的轰炸声中，于会议的缝隙中，拼命地读书写作，所以更确切点说这窑洞是毛泽东的书房。当我在窑洞前漫步时我无法掂量，是从这里发出的电报、文件作用大，还是从这里写出的文章、著作作用大。马克思当年献身工人运动，当他看到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人运动裹足不前时，就宣布要退出会议，走进书斋，终于写出了《资本论》这本远远超出具体决定，跨越时空，震撼地球，推动历史的名著。但是，当时毛泽东无法退出会议，甚至无法退出战斗和生产，他在延安期间每年还有三百斤公粮的生产任务。他的房子里也不能如马克思一样有一条旧沙发，他只有一张旧木床，也没有咖啡，只有一杯苦茶。他只能将自己分身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写文章。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古代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飞箭，再准备

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脚去踢，用嘴去咬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层，更早一步的人。他是领袖，更是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些文章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文件、决定。像达摩面壁一样，这些窑洞确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修炼真功的地方，是蒋介石把他们从秀丽的南方逼到这些土窑洞里。

四壁黄土，一盏油灯，这里已经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但是唯物质生活的最简最陋，才激励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最大的热忱、最坚忍的毅力、最谦虚的作风，去做最切实际的思考。毛泽东从小就博览群书，但是为了救国救民，他还在不停地武装自己。对艾思奇这个比他小16岁的一介书生，毛泽东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记得在艾思奇同志逝世20周年时，在中央党校的展柜里我还见到过毛泽东同志的另一封亲笔信，上有"与您晤谈，受益匪浅，现整理好笔记送上，请改"等字样。这不是对哪个人的谦虚，是对规律、对真理的认同。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礼贤下士的故事，刘备三顾茅庐，刘邦正在洗脚听见有人来访，就急得倒拖着鞋出迎。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成自己的大事。而毛泽东这时是真正的在穷社会历史的规律，他将一切有志者引为同志，把一切有识者奉为老师。蒋介石，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他何曾想到现时延安窑洞里这一批人的厉害。他以为这又是陈胜揭竿，刘邦斩蛇，朱元璋起事，他万没有想到毛泽东早就跳出了

那个旧圈子而直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我在窑洞里徘徊，看着这些绵软的黄土，感受着这暖融融、湿润润的空气，不觉勾起一种遥远的回忆。我想起小时躺在家乡的窑洞里，身下是暖乎乎的土炕，仰脸是厚墩墩的穹顶，炕边坐着做针线的母亲，一种说不出的安全和温馨。窑洞在给神住以前，首先是给人住的，它体现着人与大地的联系。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安泰只要脚不离地就力大无穷，任何敌人休想战胜他，而在一次搏斗中他的敌人就先设法使他脱离地面，然后击败了他。斯大林曾用这个故事来比喻党与人民的关系。延安岁月是毛泽东及我们党与土地、与人民联系最紧密的时期。他住在窑洞里，上下左右都是淳厚的黄土，大地紧紧地搂抱着他，四壁上下随时都在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着力量。他眼观六路，成竹在胸。

在一孔窑洞前的木牌上注明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论持久战》。依稀在孩童时我就听父亲讲过这本书的传奇，那时他们在边区，眼见河山沦陷，寇焰嚣张，愁云压心。一天发下了几本麻纸本的《论持久战》，几天后村内外便到处是歌声笑声，有如春风解冻一般。这个小册子在我家一直珍藏到文化大革命。后来读党史才知道当时连蒋介石都喜得如获至宝，发至全军每个军官一本。同时这本书很快又在美国出版。毛泽东为写这篇文章在窑洞里伏案工作九个日夜，连炭火烧了棉鞋也全然不知。第九天早晨，当他推开窑门，让警卫员把稿子送往清凉山印刷厂时，我猜想他的心情就像罗斯福签署了原子弹生产批准书一样激动。以后战局的发展果然都在他的书本之中。

一个伟人的思想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是事物间本来的联系，所以真理最朴素，伟人其实与我们最接近。一次，在延安雷电击死一头毛驴，驴主人说："老天无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有人要逮捕这个农民，

消息传到窑洞里，毛泽东说骂必有因，一了解，是群众公粮负担太重。于是他下令每年由二十万担减到十六万担，又听从李鼎铭的建议精兵简政。毛泽东在这窑洞里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他的许多深刻的论述挽救了党，挽救了多少干部，但是当他知道有人被伤害时，就到党校礼堂作报告，说，今天我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礼！并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到帽檐下。1942 年，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他刚在重庆吃过八百元一桌的宴席，这时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两毛钱的客饭，但他回去后写文章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5 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他看到边区的兴旺，想到以后的中国，问一个政权怎样才能永葆活力。毛泽东说，办法就是讲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我想他说这话时一定仰头环视了一下四周厚实的黄土。“七大”前后很多人主张提毛泽东思想，他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智慧。”“我这个人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作家萧三要为他写传，他说还是去多写群众。他是何等的清醒啊！政局、形势、作风、对策，都装在他清澈如水的思想里。胡宗南进犯，他搬出了曾工作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电报，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俘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

当你在窑洞前徘徊默想时，耳边会响起黄河的怒吼，眼前会飘过往日的硝烟。但是你一眨眼，面前仍只有这一排静静的窑洞。自古都是心胜于兵，智胜于力。中国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那几篇文章的胜利。延安的这些窑洞真不愧为毛泽东思想的生产车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展示才华思考写作的辉煌时期，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一百五十六篇文章，有一百一十二篇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毛泽东离开延安在陕北又转战了一年，胡宗南丢盔弃甲，哪里是他的对手。1947 年 12 月的一天，毛泽东在陕北米脂的一个窑洞里展纸研墨，他说："我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再写了。"他大笔一挥，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说我们要打正规战，要进攻大城市了。这是他在陕北窑洞里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写罢掷笔，便挥师东渡黄河，直捣黄龙，为人民政权定都北京去了。他再没有回延安，只是在宝塔山下留下了这一排永远思考的窑洞。思想这面铜镜总是靠岁月的擦磨来现其光亮，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离我们渐走渐远，而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却离我们越来越近。

1996 年 10 月 12 日，《散文》1997 年第一期

假如毛泽东去骑马

一

毛泽东智慧超群，胆识过人，一生无论军事、政治都有出其不意的惊人之笔，让人玩味无穷。但有一笔更为惊人，只是惜未能实现。

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说："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六十里，骑马三十里，走路三十里，骑骑走走，一路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从长江上游，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国内国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

1960年，毛的专列过济南，他对上车看他的舒同、杨得志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1961年3月23日毛在广州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1962年，他的一个秘书调往陕西，他说："你先

打个前站，我随后骑马就去。”1972年，毛大病一场，刚好一点，他就说：“看来，我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可见他对两河之行向往的热切。

自从看到这几则史料，我就常想，要是毛泽东真的实现了骑马走江河，该是什么样子？

这个计划本已确定下来，大约准备1965年春成行。1964年夏天从骑兵部队调来的警卫人员也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也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匹个头不太大的白马，很巧合，他转战陕北时骑的也是一匹白马。整个夏天，毛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

但是，1964年8月5日，突发“北部湾事件”，美国入侵越南。6日晨，毛遗憾地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黄河这次是去不成了。”

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是一个国家的遗憾，民族的遗憾，中国历史失去了一次改写的机会。按毛的计划是走三到五年，就算四年吧，两河归来，已是1969年，那个对国家民族损毁至重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可以推迟发生，甚至可能避免。试想一个最高领袖深入民间四年，将会有多少新东西涌入他的脑海，又该有什么新的政策出台，党史、国史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版本？一个伟大的诗人，用双脚丈量祖国的河山，“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又该有多少气势磅礴的诗作？

我们再看一下1965年的形势，那是新中国建国后最好的年份。正是成绩已有不少，教训也有一些，党又一次走在将更加成熟的十字路口。当时我们已犯过的几个大错误是：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反右倾。还遇上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这时，全党已经开始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错误，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形势也有了明显好转，原子弹爆炸，全国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

学焦裕禄，国力增强，民心向上。但是从深层来看，对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就像遵义会议时，从行动上和组织上已停止了“左倾”的错误，但真正从思想和路线上解决问题，还得等到延安整风。急病先治标，症退再治本。当时党和国家正是“症”初退而“本”待治之时。

毛泽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骑马走两河的。

二

我们设想着，当毛泽东骑马走江河时，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村发展的缓慢。

毛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他最初的秋收起义，十年的土地革命是为农民翻身。他穿草鞋，住窑洞，穿补丁衣服，大口吃茶叶叶子，拣食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趴在水缸盖上指挥大战役，在延安时还和战士一起开荒，在西柏坡时还下田插秧，还有包括江青看不惯的大口吃红烧肉，吃辣椒。他简直就是一个农民，一个读了书、当了领袖的农民。毛泽东一生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只不过命运逼得他建国前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战争。建国后，又急于振兴工业，以至于1953年发生了与梁漱溟的争吵，被梁误以为忘了农民。他在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为了农业的尽快翻身，有点空想，有点急躁，被彭德怀说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一句话真的刺伤了他的心，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为了农民。

他打马上路了，行行走走，一个半月后到达郑州。因为是马队，不能进城住宾馆，便找一个依岸傍河的村庄宿营，架好电台，摊开文件、

书籍。一如战争时期那样，有亲热的房东打水、烧炕，有调皮的儿童跑前跑后，饭后他就挑灯读书、办公。但我猜想毛这天在郑州的黄河边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河南这个地方是当年人民公社运动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七年前，1958 年 8 月 6 日晚，他到郑州，7 日晨就急着听汇报，当他看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时，如获至宝，连说：“这是个好东西！”便喜而携去。接着又去视察山东，8 月底就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社遍行全国，河南首其功，信阳首其功。但是全国第一个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刘少奇说，“饿死人这是要上史书的啊”。毛不得不在 1960 年 10 月 23 日到 26 日专门听取信阳事件的汇报，全国急刹车，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渡过难关。

这次，毛沿途一路走来，看到了许多 1958 年大跃进留下的半截子工程，虽经调整后，农村情况大有好转，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房东悄悄地对他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对农村生产力到底是起了解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反倒下降了呢？想解放战争时期，边打仗边土改，农民一分到地就参军、支前，热情何等的高。

离开郑州之后，毛溯流而上，他很急切地想知道 1960 年完工的大工程三门峡水库现在怎么样了。这工程当时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啊，诗人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曾传唱全国：“展我治黄河万里图，先扎黄河腰中带——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银河星光落天

下，清水清风走东海。”这些句子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得出，那真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毛很想看看这万年的黄河，是不是已“清水清风走东海”，很想看看他日思夜想的黄河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立马高坡，极目一望时，这里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高原明镜，而是一片湿地，但见水雾茫茫，芦花荡荡。原先本想借这座水库拦腰一斩，根治黄河水害，但是才过几年就已沙淤库满，下游未得其利，上游反受其害，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眉头一皱，问黄河上游每年来沙多少，随行专家答：“十六亿吨。”又问：“现库内已淤沙多少？”答：“五十亿吨。”这就是再修十个水库也不够它淤填的啊！当初上上下下热情高涨，又相信苏联专家的话，并没有精细地测算和科学地论证，就匆匆上马。看来建设和打仗一样，也是要知己知彼啊。不，它比战争还要复杂，战场上可立见胜负，而一项大的经济建设决策，牵涉的面更广，显示出结果的周期更长。

毛打马下山，一路无言。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上下叫好，只有一人坚决反对，这就是黄万里。1955年4月周恩来主持七十多人的专家论证会，会开了七天，他一人舌战群儒大呼：不是怎么建，而是三门峡根本就不宜建坝！下游水清，上游必灾啊。果然，大坝建成第二年，上游受灾农田就达八十万亩。黄的意见没人听，他就写了一首小词，内有“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句。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登出了这首词，黄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右派。毛泽东记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不觉长叹了一口气。

我猜想毛这次重到西北，亲见水土流失，一定会让他重新考虑中国

农业发展的大计。解放后毛大多走江南，再没有到过黄河以西。但他阅读了大量史书，无时不在做着西行考察的准备。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引黄济晋的雄心壮志，他说：“你这算什么雄心壮志，你们查一下《汉书》，那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引黄河过北京东注入海。当时水大，汉武帝还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航行呢，现在水都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啊。”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理时到山西视察，山西领导又重提引黄之事，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在场，听到赵又转述毛的这番话。大约1958年成都会议毛、陶对话时，赵亦在场。多年来，我们愧对的岂止是晋民，陕、甘、宁之民也都很愧对啊。这块中国西北角的红色根据地，当年曾支撑了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支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自解放以后就再也摆不脱黄风、黄沙、黄水的蹂躏。晋陕之间的这一段黄河，毛泽东曾经两次东渡。第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过河东征抗日，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第二次是由吴堡过河到临县，向西柏坡进发，定都北京。当时因木船太小，跟他多年的那匹老白马只好留在河西。他登上东岸，回望滔滔黄水，激动地讲了那名言：“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据他的护士长回忆，毛进城后至少九次谈起黄河，他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们欠了黄河的情”“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

这次毛重访旧地，我猜想米脂县杨家沟是一定要去的。1947年11月22日到1948年3月21日他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他转战陕北期间住得最长的一个村子，并在这里召开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准备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十二月会议”。但现在这里还是沟深路窄，仅容一马，道路泥泞，一如二十年前。农民的住房，还没有一间能赶上过去村里

地主的老房子。而当年毛的指挥部，整个党中央机关就借住在杨家沟一家马姓地主的宅院里，他就是在这里胜利指挥了全国的战略大转折啊。我去看过，这处院子就是现在也十分完好，村里仍无其他民房能出其右。这次毛重回杨家沟还住在当年他的那组三孔相连的窑洞里，心中感慨良多。当年撤出延安，被胡宗南追得行无定所，但借得窑洞一孔，弹指一挥，就横扫蒋家百万兵。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发展迟缓的原因到底何在?

向最基层的普通人学习，是毛一向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成了毛政治品德和工作方法中最鲜明的一条。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曾写到对毛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毛曾说："当年是一个监狱的小吏让我知道了旧中国的监狱如何黑暗。"毛在1925年到1933年曾认真做过农村调查，1941年又将其结集出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共产党人也不能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那时他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呼声。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延安的一个农民，一次天打雷劈死了他的毛驴，就说："为何不劈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要以反革命罪逮捕这个农民。毛说，他这样说必有他的理由，一问是边区农民负担太重，毛就让减税。所以，当时边区地域虽小，生活虽苦，但领袖胸如海，百姓口无忌，上下一条心，共产党终得天下。

这次，毛一路或骑马或步行又重新回到百姓中间，所见所闻，隐隐感到民间积怨不少。他想起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谈话，那时虽还未得天下，但黄已问到他将来怎样治天下。他说："只要坚

持民主，让老百姓监督政府，政权就能永葆活力。”想到让人民监督，毛忽然忆起一个人，此人就是户县农民杨伟名。杨是一个普通农民，在村里任大队会计，他关心政治，以一点私塾的文化底子，苦学好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1962年曾向中央写万言书，系统分析农村形势，提出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如：允许单干；敞开自由市场；不要急于过渡，再坚持一段新民主主义；要防止报喜不报忧……现在看来，这些话全部被不幸言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一叶知秋》，意即，从分析陕西情况即可知全国农村形势之危。其忠谏之情溢于言表。毛对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便愤而批曰：“什么一叶知秋，是一叶知冬。”

其时，党内也早有一部分同志看到了危机，并提出了对策，比较有名的就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这篇文章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而黄河之滨这个朴素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则被大会批、小会斗，后在“文革”中自杀。（2002年，陕西曾开研讨会纪念杨伟名，并为他出版文集。2005年，我曾访其故居，秋风小院在，柿树叶正红。这是后话。）这次毛重走黄河，又到陕西，看到当年的许多问题依旧没有结果，就想起这个躬耕于关中的奇才，便着人把他接来，作彻夜之谈。毛像当年向小狱吏请教狱情，在延安街头光着头向农民恭问政情一样，向这个农民思想家问计于国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共领袖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对话。不是《三国演义》中卧龙冈的“隆中对”，也不是1945年延安的“窑洞对”，而是在黄河边的某一孔窑洞里的“河边对”。杨伟名一定侃侃而谈，细算生产队的家底，纵论国家大势。毛会暗暗点头，想起他自己常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又想起1948年他为佳县县委题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

人民的一面”。当时他转战到这里，部队要打佳县，仗要打三天，需十二万斤粮，但粮食早让胡宗南抢掠一空。他问佳县县长张俊贤有没有办法，张说：“把全县坚壁的粮挖出来，够部队吃上一天；把全县地里未成熟的玉米、谷子收割了，还可吃一天；剩下的一天，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群众拉着粮、驴、羊支前，自己吃树叶、树皮。战后很长时间，这个县见不到驴和羊。那时候，政府和百姓，真是鱼水难分啊。看来这些年离群众是远了一点。（毛是性情中人，他或许还会当场邀杨到中央哪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工作，就像后面要谈到的，他听完就三峡问题的御前辩论后，当场邀李锐做他的秘书。何况杨本来就一直是西北局的特聘编外政策研究员。而以杨的性格则会说，臣本布衣，只求尽心，不求闻达，还是躬耕关中，位卑不敢忘国，不时为政府上达一点实情。）送走客人，他点燃一支烟，仰卧土炕，看着窑洞穹顶厚厚的黄土，想起自己1945年在延安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早已生根开花，但却要将忘其土啊。

总之，还不等走完黄河全程，在晋、陕、宁、甘一线，毛的心情就沉重复杂起来。在这里，当年的他曾是“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可现在毛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轰轰烈烈，怎么就没能解放出更多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境遇呢？

毛继续沿黄河前行，北上河套，南取宁夏，绕了一个大弯后西到兰

州。在这里向北沿祁连山麓就是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向南沿黄河就将进入上游的青海、四川。他决定在兰州休整一周。这兰州以西是历代流放钦犯和谪贬官员的地方。他想起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就是经过这里而贬往新疆的。毛泽东出行，电台、文件、书籍三件宝，常读之书和沿途相关之书总要带足。现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馆”里存有他出行的书箱，足有一米见方。林则徐是他敬仰的人物，长夜难眠，他便命秘书找出林的《云左山房诗钞》挑灯阅读，卷中有不少是林则徐在河南奉旨治完黄河后又一路继续戴罪西行，过兰州，出玉门的诗作，多抒发他的报国热情和记述西部的山川边情。林诗豪放而深沉，毛性刚烈而浪漫，把卷在手，戈壁古道长无尽，窗外黄河呜有声。此时，两个伟人跨越时空，颇多共鸣。毛有抄录名人诗作练字的习惯，他读得兴起，便再披衣下床，展纸挥毫，抄录了林的一首《出嘉峪关感赋》：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

㊟ 尉侯，汉代设在西域的官。博望，张骞通西域，封博望侯。星槎，神话中来往于海上或天上的木筏。崆峒，甘肃东部的名山。卢龙，长城东部古要塞，在河北喜峰口。山海，山海关。这首诗的大意是：自从张骞凿通遥远的西域之路后，东西古道上的官员就往来不断。笳歌声中，我倚剑遥望，嘉峪关连绵直接崆峒山。长城下将士乘着月色去饮马，戍楼上苍鹰在盘旋。除了卢龙、山海两关，在这以东还有何处能比得上雄伟的嘉峪关。

这幅书法，借原诗的气势，浓墨酣情，神采飞扬，经放大后至今仍高高挂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东墙上。书罢林诗毛推窗北望，想这次只能按原计划溯黄河而上，祁连山、嘉峪关一线是去不了了，不觉有几分惆怅。新疆是他的胞弟毛泽民牺牲的地方，那个方向还有两件事让他心有所动。一是当年西路军在这里遭到极大损失，这是我军史上的极悲惨的一页。二是，1957年反右之后一大批右派发配西部，王震的兵团就安排了不少人，这其中就有诗人艾青等不少文化人。现时已十年，这些人中似可起用一些，以示宽慰。他在这里休整一周，接见了一些仍流散在河西走廊的老红军，听取了右派改造工作的汇报，嘱咐地方上调研后就这两事提出相应的政策上报。

离开兰州，毛一行逆黄河而上，又经月余到达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他登上南岸四川阿坝境内的一座小山，正是晚霞压山，残阳如血，但见黄河北来，蜿蜒九曲，明灭倏忽，如一道闪电划过高原，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吟道：

九曲黄河第一弯，长河落日此处圆。
从来豪气看西北，涛声依旧五千年。

他想，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黄河，对得起黄河儿女。

这里已近黄河源头，海拔四千米以上，他们放慢速度，缓缓而行，数十天后终于翻过巴颜喀拉山，到达长江的源头大通河，这便进入长江流域。

三

接下来，毛泽东走长江与走黄河的心境不同。在黄河流域，主要是勾起了他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对老区人民的感念，深感现在民生建设不尽如人意，得赶快发展经济。而走长江一线更多的是政治反思，是关于在这里曾发生过的许多极“左”错误的思考。

顺沱沱河、通天河而下，入金沙江，便进入四川、贵州界。这里是中央部署的大三线基地。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从战争中走来，总担心天下不稳，国家遭殃。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又力主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可以支持原子战争的大三线基地。他还把自己的老战友、新冤家彭德怀派来任基地三把手。毛彭关系，可以说是合不来又离不开。历史上许多关系到党的命运和毛的威信的大战、硬战，都是彭帮毛来打。最关键的有三次，红军长征出发过湘江、解放战争时的转战陕北和刚建国时的朝鲜战争。尤其是出兵朝鲜，中央议而不决，彭从西北赶回，投了支持毛的关键一票，而在林彪不愿挂帅出征的情况下，彭又挺身而出，实现了毛的战略。但是自从进城之后，毛彭之间渐渐生分。战争时期，大家都称毛为“老毛”，进了北京，渐渐改称“主席”。有一天，彭突然发现中南海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叫“老毛”，便很不好意思，也悄悄改口。这最后一位称“老毛”的角色由彭来扮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之深和彭性格的纯真率直。但1959年在庐山上，两个战友终于翻脸。其时毛正醉心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雄心勃勃，自以为找到了迈向共产主义的好办法。彭却发现农村公共食堂里农民吃不饱，老百姓在饿肚子，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他要为民鼓与呼。这

场争论其实是空想与实事求是之争。结果是彭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又扩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全国大反右倾，株连五百多万人。后来黄克诚说：“这件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但是，直到下山时毛还说，我要写一篇大文章《人民公社万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成就。并已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他准备材料。但还不到年底，农村就败象渐露，这篇文章也就胎死腹中。1965年9月，毛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便派他到三线来工作。

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三十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毛泽东盖世英雄，向来敢翻脸也敢认错。他在延安整风时对“抢救运动”中被错整的人脱帽道歉；1959年感谢陈云、周恩来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冷静，说“家贫思贤妻，国难识英雄”；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的错误认错。现在毛经三年来的沿河考察，深入民间，所见所闻，许多争论已为历史所印证，他也许会说一声：“老彭，看来是你对了！”

行至四川境内，毛还会想起另一个人，即他的秘书田家英。庐山会议前，毛提倡调查研究，便派身边的人下去了解情况，田家英被派到四川。田回京后给他带去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实情报告，他心有不悦。加之四川省委投毛之好又反告田一状，田在庐山上也受到了批评，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起，田即自杀）。这时他一定会想起田家英为他拟的那篇很著名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觉怅然若失。看来自己过去确实是有点好大喜功，下面也就报喜不报忧，以致造成许多失误。长夜静思，山风阵阵，

江水隆隆。他推窗望月，金沙水拍云崖暖，惊忆往事心犹寒。

解放后毛出京工作，少在北方，多在南方，所以许多做出重要决策的、在党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多在长江一线。如 1958 年 3 月毛坚持大跃进，周恩来、陈云被迫作检讨的成都会议；4 月再次确立了大跃进思路的武汉会议；1959 年 4 月检讨大跃进的上海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提出骑马走两河）；1959 年 7 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1961 年纠正“左”的错误的第二次庐山会议等。总的来讲，这些会议上都是毛说了算，反面意见听得很少。

但有一次毛是认真听了不同意见，并听了进去。这就是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争论。自孙中山时，就有修三峡的设想，毛也曾畅想“高峡出平湖”，但到底是否可行，毛十分慎重。1958 年 1 月他曾在南宁组织了后来被称为“御前辩论”的两派大对决，也就在这次他很欣赏反对派李锐，当场点名要李做他的秘书。毛曾在 1958 年 3 月 29 日自重庆上船，仔细考察了长江三峡，至 4 月 1 日到武汉上岸。他对修三峡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说：“最后下决心准备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这次毛骑马从陆路过三峡一定会联想到那个当年轻易上马，现已沙淤库满的三门峡水库。幸亏当时听了不同意见，三峡才成为大跃进中唯一没有头脑发热、轻易上马的大工程。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看来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二十四年后，1992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这个长过程中因为有反对意见，才有无数次的反复论证，人们说三峡工程上马，反对派的功劳比支持派还大。）

毛从四川入湖北，过宜昌到武汉。这次因是带着马队出行，当然不住上次毛住过的东湖宾馆，他就选一依山靠水之处安营扎寨，这倒有

了一点饮马长江的味道。毛不禁想起他1956年在这里的诗作："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又想起1958年4月在这里召开的武汉会议，在鼓动大跃进的同时，毛给那些很兴奋的省委书记们也泼了一点冷水。但全党的狂热已被鼓动起来，想再压下去已不容易。他想，那时的心态要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再从容一点，继续给他们降降温，后果也许会好一点。

离开湖北进入江西不久就到了庐山。这庐山堪称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坐标点。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这里首先买地盖房，开发庐山。从1928年到1947年，前后二十年，蒋介石在这里指挥"剿共"、抗日。1927年，瞿秋白在这里起草"八一"起义提纲。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正在山上举办的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提前结业，直接奔赴抗日前线。1948年蒋介石败退大陆，泪别庐山。蒋离去十年后，1959年毛第一次登上庐山，住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别墅，看见工人正要凿掉"美庐"二字，忙上前制止，说这是历史。就是这一次在山上召开了给党留下巨大伤痛的庐山会议。1961年，毛欲补前会之错，又上山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借用《礼记》里的一句话"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痛感革命事业不可能有人先给你准备好成熟的经验。这一次毛在山上说，他此生有三愿：一是下放，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骑马走一次长江、黄河；三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统统写入，让世人评说。他认为自己好坏七三开就满足了。1970年毛又三上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敲山震虎，与林彪已初显裂痕。还有一件事少有人知，蒋介石去台多年，自知反攻无望，愿意谈判回归。1965年7月已初步达成六项协议，其中有一条：蒋回大陆后所选的"汤沐之地"（封地）就是庐山。

惜“文革”一起，此事告吹。

到了庐山，毛的两河之行已完成四分之三。他决定在这里休整数日，一上山便放马林间，让小白马也去自由自在地轻松几日。他还住美庐，饭后乘着月色散步在牯岭小街上，不远处就是当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黄克诚合住的176号别墅，往西三十米是张闻天的别墅，再远处是周小舟的别墅，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此方寸之地，却曾矗立过中共党史上的几位巨人。除周小舟资格稍差外，彭、黄、张都是井冈山时期和毛一起的“绿林好汉”，想不到掌权之后他们又到这座山上来吵架。毛忆想那次论争，虽然剑拔弩张，却也热诚感人，大家讲的都是真话。他自己也实在有点盛气压人。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如果当时这庐山之争也能像三峡工程之争一样，允许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后果也不会这样。后来虽有1961年二次庐山会议的补救之举，但创痛实深，今天想来，他心中生起一种隐隐的自责。回到美庐，刚点燃一支烟，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1959年他一上庐山时的那首豪迈诗作：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他在自己的这幅放大的手迹前伫立良久，光阴似箭，不觉就是十年啊。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

安得倚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

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

这诗，虽是自责，却椽笔墨海，隐隐雷鸣，仍不失雄霸之气。他抽完一支烟，又翻检了一下当日收到的电报、文件， 办了一会儿公，便用铅笔将这首诗抄在一张便笺上，题为《三上庐山》，放入上衣口袋，准备明天在马背上再仔细推敲，然后就上床歇息。（毛二上庐山时也写有诗，就是那首为江青所拍的仙人洞题照。）毛泽东下山后，一路过安徽，下江苏，走扬子江、黄浦江，直往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市而去。

两河之行结束，大约是1969年的9月，正是国庆20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回顾整理了一下四年来两河调查的思绪，便将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召集到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重点抓一下经济建设，暂不搞什么政治运动（这比后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早九年）；二是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戒假话、空话，加强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次的全党思想大整顿）；三是总结教训，对前几年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这比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十二年）。三个决议通过，局面一新，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没有彭德怀等一批老干部的损失，也没有田家英等一批中年精英的夭折。如果再奢望一点，还可能通过一个关于党的领导干部退休的决议（这比1982年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早十三年）。因为到这年年底毛就满76岁，两河之行，四年岁月，一万里路云和月，风餐露宿，鞍马劳顿。他一定感到身体和精力大不比当年长征之时，毕竟年龄不饶人。而沿途，

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发现无数基层干部，有经验，有知识，朝气向上，正堪大任。要放手起用新人。这几个决议通过，全党欢呼，全民振奋。国家、民族又出现新的机遇。真如这样，历史何幸，国家何幸，民族何幸！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

四

2009年10月1日，建国60周年，万民同庆，举国欢腾。当时我在天安门阅兵庆典的观礼台上，手机响了，收到这样一条信息：

> 中国医学科学院成功克隆毛泽东，各项生理指标处于其50岁水平。新闻发布后引起强烈反响。奥巴马立即声明：美国在3天之内废除与台湾关系，并撤走在亚洲的一切军事力量。日本首相于当天下令炸毁靖国神社，承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国内24小时县级以上干部退缴赃款980万亿，全国股市一片红，房价下跌60%；13亿中国人民再次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是一个善意的调侃，红色的幽默，也包含着一种社会思考，一种对过去美好一面的怀念和对现在腐败一面的批判。过节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节庆，是共和国的生日，60岁的生日啊！人们忘不了开国领袖。他老人家要是还在多好啊，这天安门城楼本来就是他当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虽然他老人家后期搞“文革”也曾犯有大错，但前期对民族确有大功，所以人们总希望他还能一如前期那样的英明。

这善良的愿望，反映了人们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怀念，对未竟之业的遗憾。如果斗柄能够倒转，如果历史能够重写，如果那次骑马走两河能够成行，如果毛泽东在60年代能反思自己的错误，晚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该多好。这一切当然都不可能，我们也知道这永不可能。但是后人想一想还不行吗？这样的假想，是对历史的复盘，也是对再后之人的提醒。历史不能重复，但是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再创造新的历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民族。不要忘了，正是“文革”浩劫之后的大思考才成就了今天的复兴。

毛泽东是一本我们永远读不完的书。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戎马生涯》，秦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共产党80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三版。

《解放战争》，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林则徐诗选注》，周轩著，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到庐山看老别墅》，方方著，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

《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我很想学徐霞客》，陈晋，《党的文献》2006 年第三期。

《文献与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0 年第十四期。

《学习时报》2010 年 4 月 26 日、5 月 10 日、17 日、24 日

《新华文摘》2010 年第十五期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记

到韶山参加一个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意外地发现在离毛故居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座毛泽东图书馆。为伟人、名人建纪念图书馆，在国外几成风气，美国每个退休总统都有一座，中国却极少见。关于毛的这座图书馆也未能建在北京等大都市，而是在他家乡的小山冲里。我很好奇，便进去一看。

图书馆不大，实用面积只有六百八十平方米。这里只收三类书，一是毛写的书，各种选集、文集、单行本；二是毛看过和评点过的书；三是写毛的书，即各种研究毛泽东的书。馆的功能以收藏、陈列为主，兼有一点借阅，游人可免费参观。但因知道的人不多，来者寥寥，那天我去时馆内十分清静。

一般无论博物馆、图书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我问接待我的刘馆长："能不能看看你们的宝贝？"他自己先戴上一副薄薄的白手套，又递给我一副，然后让管理员捧出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本蓝皮黄纸的书，小三十二开本，约有一寸之厚，他说："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是已知的历史上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选集》。"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中央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王稼祥是副主任。整风过后，为了推动干部的学习，晋察冀边区请示中央宣教委会后决定编一本《毛泽东选集》，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邓是党内的才子，是一个好学习、好收藏、好研究问题又很

有政治眼光的知识分子，他平时犹好收集毛泽东的讲话、文章。边区党委1944年1月下文件，邓三个月后就编出了这本书。现在我们看到版权页上写着，编印：晋察冀日报；发行：晋察冀新华书店；定价：三百元（边币）；一九四四年五月初版。

我俯下身子仔细观察这件宝物，虽然手上也戴着一双白手套却不敢去翻它一下，生怕碰碎那已经被岁月浸泡了七十年的薄纸。全书分为五卷，实际上是一本五卷本《毛选》合订本。解放后正式出版《毛选》合订本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当时是四卷合订。我记得刚看到这种合订装帧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想不到在抗日的满天烽火中就曾诞生过《毛选》合订本，而且还是五卷。看着这本小书，你会明白什么是思想的力量，什么是领袖的魅力，而书籍就是在收集思想，收藏历史。以当时的条件，毛泽东的文章不可能收齐，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只收了前两个部分。这本集子主要来源于邓拓个人的剪报资料。当时纸张奇缺，从书的封口上可以看出，纸质和色度都不一致。印装也有失误，如124页后就找不到125页。但它却有一个惊人的装帧——蓝色缎面精装。这是从地主老财家找来缎子被面，用手工制作的，这样的精装本只做了十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本子是三年前图书馆花了三十万元从河北一个收藏者手里买来的。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另一本，品相比这还好一点，缎面上的一朵暗花正好在封面的中心，拍卖价已经出到一百六十万元，主人还不肯出手。《毛选》的编辑出版贡献最大者有两人。一个是邓拓，在战火中编了第一本《毛选》；一个是田家英，精心保存了毛的许多手稿，是解放后《毛选》编辑的第一主力。可惜这两人在“文革”中都死于非命。

在珍品室还有这样几件藏品。一件是解放前国统区正申书局出版的

小册子，封面书名为《孙中山先生论地方自治》，打开后里面却是毛泽东的文章选编，这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检查。还有一本《六大以前》，落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印，1942”。当时为配合整风，中央编了《六大以前》《六大以后》《两条路线》等几本书。因为是作为高干学习之用，印数很少，又赶上胡宗南进攻延安，撤离时大都销毁了，所以流传极少。这本《六大以前》现在全国仅存两本。

馆内收藏的各种毛泽东著作版本约两千多种，1949年以前的有七百种。其中还有一些珍品。如1945年7月我江南根据地在芦苇荡里用芦苇制纸印刷出版的《毛选》，有陆定一曾签名收藏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3月编的《毛泽东选集》1～6卷，等等。最特别的是一种手抄本《毛选》。抄者大都是书法爱好者，且对毛泽东有特别的敬仰之情，做这件事时怀有一种僧人抄经式的虔诚。一位河北沧州的退休干部用行书在宣纸上手抄了全部《毛选》四卷，每个字如小核桃之大，然后手工装裱成本四十八册，在1998年12月26日毛生日那天他亲自将书送到韶山。还有一个手抄本更为奇特，也是毛笔宣纸手抄四卷本，但一色蝇头小楷，每个字与《毛选》里的铅字一样大，每一页无论页码、标点、版式、字数都与原书相同。抄完后也手工装订成一套《毛选》四卷。这简直是一件巧夺天工，以手工而夺现代印刷机器之工的稀世艺术珍品。这些手抄本都曾有人出天价收藏，但作者只捐赠这里，分文不取。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也许是一种巧合，他在中南海办公的地方就名菊香书屋。读书是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他平时睡一张大木板床，半张床上却堆满了书。他在延安时说：“如果我能再活十年，我就要读九年零359天书。”直到去世前七小时他还在阅读，真正是伴书食，伴书眠，伴书工作，伴书而终。毛去世后从菊香书屋

清出九万多册书。这些书上有他大量的批注手迹，都一起移送中央档案馆了。而那张与书共眠的大木床则被乡亲们请回了韶山，现保存在离图书馆不远的毛泽东遗物馆。毛晚年视力不好，阅读困难，他就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一批大字本的书，共一百一十九种。开始用三号、二号字印，后来视力再减退，干脆用标题字来印了。可想他当时想要读书的急迫之情和捧读之苦。毛的读书习惯是看一遍画一个圈，有的书上竟画了二十四个圈。他一生读过多少书，已经无法统计，从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到《红楼梦》，甚至还有《安徒生童话》等，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九万册书啊，这是一个伟人为自己筑起的一座蜿蜒逶迤的知识长城。单凭这一点，毛也该赢。当然他最喜欢读的还是中国的史书，现馆内收有一套线装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复制本。

馆藏书中最多的还是第三类，即后人研究毛泽东的书，大约有三万多种。这些书研究他的生平、思想、战例、战法、著作、讲话、家事、家谱、生活习惯等。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有长期追随他的将军、书记、部长的追述，有学者的研讨，还有近年兴起的借毛的思想对经商、处世、治学的研究。毛去世已近四十年，人们对他研究的热情并不稍减。这个研究经历了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又融入尘俗的微妙过程。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没有办法，历史抹不去毛泽东。毛走过了一个时代，创造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物事件，边边角角，时时处处，都折射着他的影子。在书架的长阵间浏览，你会看到许多这样的书名，《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蒋介石》《毛泽东与斯大林》，还有《毛泽东与佛教》《毛泽东与戏曲》，直到《毛泽东与南阳》《毛泽东与城南庄》等，从大到小，从近到远，一草一木都无不与之相关。这真是一个毛泽东时代，普天

之下的每一根神经都连着这一个中枢。这时突然你会明白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他的思想、意志、魅力摆在那里，你不得不随他前行，而他离开这个世界后却仍然定格在历史上。

从图书馆出来我又重游了毛的故居。真不敢想象，就是从这几间小土房子里走出了这样一位巨人。故居旁是毛 8 岁时开始上的第一个私塾——南岸私塾。他八年换了七个私塾，总是不停地发问。小山冲已经放不下他，他便到长沙求学，到北京大学工作，去见李大钊，见蔡元培。从南岸私塾到毛泽东图书馆，一个伟人就这样走过了一条读书之路。这两处的空间距离只有一里地，而时间跨度是八十年。八十年的读书、思考、奋斗造就了一个伟人；而八十年的血与火，情与泪，功与过又全部留在他的书里，藏在山坡上的这座图书馆中。

2013 年 11 月 6 日记于韶山

红毛线，蓝毛线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有人得天下，有人失天下。中国从有纪年的公元前841年算起，不知有多少数得上名的君臣、政客，他们也讲操守，也讲牺牲，以换取人心，换取天下。唐太宗爱玩鹞子，魏征来见，忙捏在手里背在身后，话谈完了，鹞子也死在手中；王莽篡位前为表明不徇私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处死；汪精卫年轻时也曾有行刺清廷大臣的壮举。人来人去，政权更替，这种戏演了几千年，但真正把私心减到最小最小，把公心推到最大最大的只有共产党和他的领袖们。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将有一次政权大更替时，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明。

如今，在西柏坡村口立着五位伟人的塑像，他们是当时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刚从村里走出来，正匆匆忙忙像是要到哪里去。这时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曾经觊觎中国的河山并将之蹂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日寇终于心衰力竭，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了，中国大地上突然又只剩下两大势力集团：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二十年前，蒋介石就"剿共"，现在日本人走了，蒋介石又重做这个梦，你看"东北剿总""华

北剿总”，又到处扯起“剿”字旗，他想在北方重演一场当年在江西的戏。但这时，早已南北易位，时势相异。毛泽东从从容容地将五位书记一分为二，他说，我和恩来、弼时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少奇和朱老总可先到河北平山去组织一个工作班子。平山者，晋陕与北平间一块过河的踏石，此时一收天下之势已明矣。

虽然已经有人马数百万，土地数千里，就要开国进京了，但是当五大领袖住进这个小村时，并没有什么金银细软。他们和其他所有的干部一样只有一身灰布棉制服。刘少奇带着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文件箱，那是一个如农家常用的小躺柜，粗粗笨笨，一盖上盖子就可以坐人。这箱子后来进了北京，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幸亏保姆在上面糊了一层花纸才为我们保存了这件文物。现在这小木箱又按原样放在少奇同志房间的右角，而左角则是一个只有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这是当时从老乡家借来的。少奇同志就是伏在这个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他写好《大纲》后，就去村口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露天里搭了一个白布棚算是主席台，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搬些石头块子散坐在棚前。座中一位最年轻的代表，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

这个朴素的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一千多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这话经太行山里的风一吹，便火星四溅，燃遍全国。

而全国早已是布满了干柴，这是已堆了一千多年的干柴啊，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这场火着了又熄，熄了又着，总没有着个透。现在终于大火熊熊，铺天盖地。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三大战役中民工支前参战就达八百八十六万人，八百多万啊，相当于国民党的全部陆海空军。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只平山县，土改后，王震同志振臂一呼："保卫胜利果实！"一次就有一千五百人参军，组成著名的三五九旅平山团，这个团一直打到新疆，现在还驻扎在阿克苏。解放战争实质上是十年土地革命的继续，是中国农民一千多年翻身闹革命的总胜利，而土改则是开启这股洪流的总闸门。但开启这个闸门的仪式竟是这样的平静，没有红绸金剪的剪彩，没有鼓乐，没有宴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这个木柜，这张二尺小桌，和河滩里这一片曾作为会场的光秃秃的石头。

1948 年 5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也来到了这里。五位书记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在隔壁的院子里布置了一间作战室，国共两党已经斗了二十年，他要在这里再最后斗一斗蒋介石。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三十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作战科用，一张情报科用，一张资料科用。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那时已开始有电灯，但又常离不开油灯）。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势态。虽然我们这时已在进行着百万大军的总决战了，但其实还穷得很呢。这时南京国防部大楼里的是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穷。其实到这时共产党还从来没有富过，尤其是党中央

最不富。当年中央红军走到陕北时只剩万数人马，一千元钱，人均一毛钱。毛泽东只好向红二十五军去借，徐海东也没有想到中央会这么困难，忙从全军七千五百元的积蓄中抽出五千元。毛、周留在陕北，晋察冀吃穿用都比陕北强。贺龙过河来看毛泽东，毛的警卫员看着贺老总警卫员身上的枪直眼馋。贺胡子也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央机关会这么苦，赶快对警卫说："换一下。"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们爱穷，他们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九百年前封建名臣范仲淹就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真正实现了这句名言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毛泽东和他的参谋班子就是在这间最简陋的指挥部里和蒋介石斗法。这反倒生出一种神秘，就像武侠小说上写的，突然有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随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烟管就挑飞了对方手中的七星宝刀。作战室旁那个有一盘小石磨的小院子里，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一百九十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战役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共产党的每个普通干部在延安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纺毛线，想不到这毛线今天派上了这个大用场。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改造出狱后坚持要来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感慨欷歔，连呼："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蒋介石怎么能不败呢？共产党克己为民，其公心弥盖天下，已经盖住并熔化

了敌人的营垒，连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都服而不归了。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 年 3 月 5 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现在会议室里还保留着原来主席台上的样子。说是主席台，其实没有台，就是在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长方桌，后面放一把旧藤椅，台两侧各有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没有麦克风，更没有录音机，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四名中央委员，十九名候补中央委员，毛主席坐在长桌后面，其余的人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每个人就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带个凳子。会议开了八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其实这已是老习惯了，许多人都见过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站着作报告，黄土地上摆一个小凳子，凳子上放一只大瓷缸子。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据说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党内，就是领袖和百姓也亲密无间。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炕上至今还放着一架纺车。五大领袖走过雪山草地，到过东洋西洋，统率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有的还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融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已经自然地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日升高，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你想让他降都降不下来，他当然不会再另外摆什么样子。

1949年春的中国共产党，他的五大领袖，他的三十四名中央委员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这间旧伙房里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决定着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该怎么办。住了二十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党没有忘记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哲学的基本原理，没有忘记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准则。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本来会议开始时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像，到闭幕时就不这样挂了。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天地可鉴。当年袁世凯筹备登基，光龙袍上的两颗龙眼珠就值三十万大洋，而共产党为新共和国奠基却只借用了一间旧伙房。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不需要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真理不需要过多的形式来打扮，不需要端着架子来公布，它只要客观真实，只要朴素。清皇室册封嫔妃是用金页写成，每页就用十六两黄金。可她们的名字有哪一个被后人记住了呢？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其实那时使用什么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的心早已到了，任何一件普通东西上都附着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诚则灵，天下来归，传檄而定，望风披靡。而蒋政权人心已去，好比一株树，

水分跑光了，叶子早已枯黄，不管谁来轻轻摇一下都会枝折叶落。

当参观结束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领袖合影一张。五位书记昂首向前，似将远行。到哪里去？当年在村口毛泽东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1996 年 11 月 20 日写于西柏坡，《人民日报》1997 年 1 月 23 日

西柏坡赋

西柏坡乃冀中一普通山村。然其声沸海内，名传八方；瞻者益众，研者益广。天降大任，托国运于僻壤；小村何幸，成历史之拐点。

1948年春，中国北方大地正寒凝将消，阳气初升，国共两党还胜负未分。时毛泽东方战罢陕北，过黄河，进太行，一路西来；刘少奇正经略华北，闹土改，分田地，发动群众。中央五大书记，自一年前延安分手，重又际会于此，设立中国革命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将要夺取大城市，问鼎北平。

是时也，日寇甫败，蒋介石心气正盛，仍欲圆“剿匪”旧梦。于是设指挥部于南京，乃六朝古都，纸醉金迷之城。共产党则选定这个山沟，穷乡僻壤，无名无姓之村。当是时，势虽必胜，党却还穷。战事紧，参谋竟无标图之笔，而以红蓝毛线推盘演兵；文电急，领袖苦无办公之所，只就炕桌马灯草拟电文。借得民房一室三桌，是为情报、作战、后勤三部；假小院石碾一盘，以供毛、周、朱选将、发令、点兵。虽军情火急，院门吱呀，不废房东荷锄归；指挥若定，读罢战报，还听窗外磨面声。谈笑间，一战而取辽沈，二战而收淮海，三战而下平津。全国解放，大局已定。

当此乾坤逆转，将开国定都之时，中共高层却格外之冷静。一间大伙房里正在开党的中央全会，静悄悄，审时度势，析未来；言切切，防微杜渐，议党风。斯是陋室，无彩旗之张挂，无水茶之递送；甚而

上无主席台之摆设，下无出席者之席尊。主持者唯一把旧藤椅，代表席即老乡家的几十个小柴凳。通过的决议却是不祝寿，不敬酒，不命名。其心之诚，直叫拒者降，望者归，大江南北，传檄而定；其风之严，令贪者收，贿者敛，军政上下，两袖清风。孟子言：先贤而后王；哲人曰：先忧而后乐；共产党人，未曾掌权，先受戒骄之洗礼；五大领袖，进京之前，相约不做李自成。

中国革命乃土地革命，政权之争实民心之争。仰观自陈胜吴广至太平天国，起起灭灭，热血空洒黄土旧，悲歌唱罢王朝新。只有共产党，地契旧约照天烧，彻底解放工与农。党无己利，人无私心，决心走出人亡政息周期律；言也为民，行也为民，载舟覆舟如履薄冰。西柏坡，一块丰碑，一面铜镜，一声警钟；二中全会，两个务必，两个预言，再三提醒。自古成由艰辛败由奢，谦则受益满招损。正西风烈，柏松翠，坡草青，精神在，长久存。

《人民日报》2011 年 6 月 23 日

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

一棵茂盛的古树用它的枝丫轻轻地托着一颗未爆的炸弹，就像一个老人拉住了一个到处乱跑、莽撞闯祸的孩子。炸弹有一个老式暖水瓶那么大，高高地悬在半空，它是从千多米高的天空飞落下来后被这棵树轻轻接住的。就这样在浓密的绿叶间探出头来，瞪大眼睛审视人世，已经整整八十年。眼前是江西瑞金叶坪村的一棵老樟树。

樟树在江西、福建一带是常见树种，家家门前都有种植。民间习俗，女儿出生就种一棵樟树，到出嫁时伐木制箱盛嫁妆，三五百年的老树随处可见。但这一棵却非同寻常。一是它老得出奇，树龄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往上推算一下该是北宋时期了。透过历史的烟尘，我脑子里立即闪过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和他的《岳阳楼记》，以及后来徽宗误国、岳飞抗金等一连串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才有资格称古呢？山、河、城堡、老房子等都可以称古，但它们已没有生命，要找活着的东西唯有大树了。活人不能称古，兽不能，禽鱼不能，花草不能，只有树能，动辄百千年，称之为古树。它用自己的年轮一圈一圈地记录着历史，与岁月俱长，与山川同在，却又常绿不衰，郁郁葱葱。一棵树就是一部站立着的历史，站在我面前的这棵古樟正在给我们静静地诉说历史。第二个不寻常处，是因为它和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人紧紧连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一棵参天大树，他有八十三圈的年轮，1931 年，当他生命的年轮进入到第三十八圈时

在这里与这棵古樟相遇。

那时中国大地如一锅开水，又恰似一团乱麻，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已走到了尽头。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土地不均的矛盾已经到了非有个说法不可的时候。这之前，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已经闹过无数次的革命，但总是打倒皇帝坐皇帝，周而复始，不能彻底。这时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农民来一次彻底的土地革命。共产党的总部设在上海，它的行动又受命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革命知之甚少，又乱指挥，造成失误连连。毛泽东便自己拉起一杆子队伍上了井冈山，要学绿林好汉的样劫富济贫，又参照列宁的路子搞了个“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他在六个县方圆五百里的范围内坚持了两年，后又不幸失利。1931 年，毛泽东率队下山准备到福建重整旗鼓再图发展，当路过瑞金时，邓小平正在这里任县委书记，就建议他在此扎根。于是 1931 年 11 月 7 日苏俄十月革命胜利 14 周年这一天，在瑞金叶坪村的一个大祠堂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来被中国人称呼了近半个世纪的“毛主席”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虽是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也只能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这是一座南方常见的木结构土坯二层小楼，狭窄、阴暗、潮湿。小楼与祠堂之间是一个广场，是红军操练、阅兵的地方，广场尽头还有一座烈士纪念塔。这实在是一处革命圣地，是比延安还要老资格的圣地。共产党第一次尝试建立的中央政府就五脏俱全，有军事、财政、司法、教育、外交等九部一局，都设在那个大祠堂里。毛泽东等几个中央要人则住在广场的南头的小楼上，楼后就是这棵巨大的樟树。

一走近大树我就为之一震，肃然起敬。因为它实在太粗、太高、太大，我们已不能用拔地而起之类的词来形容，它简直就是火山喷出地面后突然凝固的一座石山，盘龙卧虎，遮天盖地。树干直径约有四米，树身苔痕斑驳黝黑铁青，树纹起伏奔腾如江河行地。树的一半曾遭雷劈，外皮炸裂，木质外露，如巨人向天狂呼疾喊，声若奔雷。而就在炸裂开的树身上又生出新的躯干，干又生枝，枝再长叶，一团绿云直向蓝天铺去。好一棵不朽的老树，就这样做着生命的轮回。因地势所限，树身沿东西方向略成扁平，而墨绿的枝叶翻上天空后又如瀑布垂下，浓阴覆地，直将毛泽东住的后半座房子盖了个严实。

那天，毛泽东正在二楼上看书，空中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他并不在意，起身到窗前看了一眼，又回到桌前展纸濡毫准备写文章。突然一声凄厉的嘶鸣，飞机俯冲而下，铁翅几乎刮着了屋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警卫员高喊“飞机”，冲上楼梯。毛停笔抬头，看看窗外，半天没有什么动静，飞机已经远去，轰鸣声渐渐消失。这时房后已经乱作一团，早拥来了许多干部、群众。很明显，这架飞机是冲着临时中央政府，冲着毛泽东而来，只扔了一个炸弹就走了，但炸弹并没有爆炸。大家围着屋子到处寻找，地上没有，又仰头看天，突然有谁喊了一声：“在树上！”只见一颗光溜溜的炸弹垂直向下卡在树缝里。好悬！没有爆炸。

这时，毛泽东已经走下楼来。人们早已惊出一身冷汗，齐向主席问安，天佑神人，大难不死。毛泽东笑了笑说：“是天助人民，该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亡。”毛泽东戎马一生，不知几遇危难，但总是化险为夷。胡宗南进攻延安，炮声已响在窑畔上，毛还是不走，他说要看看胡宗南的兵长得什么样子。彭德怀没有办法，命令战士把他架出

了窑洞。去西柏坡的途中，在城南庄又遇到一次空袭，他又不急，继续休息，是战士用被子卷起他抬进防空洞的。毛的性格坚定、沉着，又有几分固执、浪漫，从不怕死。唯此才能成领袖，成伟人，成大事业，写得大文章。

历史的脚步已走过八十年，这棵老樟树依然伫立在那里。枝更密，叶更茂，干更壮。树皮上的青苔还是那样绿，满地的树阴还是那样浓。那颗未爆的炸弹还静静地挂在树上。现在这里早已辟为旅游景点，人们都争着来到树下，仰望这定格在历史天空中的一瞬。古樟树像一个和蔼的老人正俯瞰大地，似有所言。一千年的岁月啊，它看过了改朝换代，看过了沧海桑田，看尽了滚滚红尘。远的不说，只从共产党闹革命开始它就站在这里看红军打仗，看第一个红色中央政府成立，看长征出发；又遥望北方，看延安抗日，北京建国。它的年轮里刻着一部党史，一部共和国的历史。它怀里一直轻轻地抱着那颗炸弹，这是一把现代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试其定力，然后又戒其权力。它告诫我们，革命时要敢于牺牲，临危不乱；掌权后要忧心为政，如履薄冰。

《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20 日

第三章

学习毛泽东，写出好文章



说官德

——《官德》序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牟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现曾国藩等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

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1940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

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羡慕，使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周恩来“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五分钱的茶水费。

但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副省长胡长清，2000年2月贪污五百万元，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贪污一千万元，死刑。后来就多得数不过来了，数额也高得惊人。高官贪贿再多也只能判个无期。虱子多了不怕咬，法不责众了。去年的公开数字，只外逃贪官卷走的钱有说五千亿，有说八千亿。高官贪，小官亦贪，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公布，大连街道办下面一小区居委会主任王仁财，职务在科级以下，2007年至2009年期间贪污九千余万元。此外还联同当地黑社会，犯下了多宗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小偷专偷贪官，网上流行词“小偷反腐”。原因很简单：一、贪官有钱；二、是不义之财；三、失主不敢报案。这样想来小偷的“偷”倒是一种客观上的义举了，类似当年土匪的劫富济贫。而且因破小偷小案牵出不少大贪大案。成语“小巫见大巫”又多了一个姊妹词“小偷见大盗”。国之大盗，监守自盗。这还只是贪财之腐败，其余还有买官卖官、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吃喝嫖赌等等，不一而足。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变成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却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衰。治理的办法当然是有的，如领导带头，

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还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不该去犯。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近年来官场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坏风气呢？现在官场道德之坏主要表现是：私、贪、假、惰、媚。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整新风，笔者在官场已观察多年，对症下药开了十味药方，这就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有些是老生常谈，但官场总是旧病复发，有的还是顽疾难除，虽是常谈也只好再说再谈了。恰逢有出版社来约稿，就辑为《官德》，这十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十讲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讲主要是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讲主要是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一个榜样。

孙中山临终遗言说，他致力于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改革开放眼看也要奔四十年而去了，小平若在世当会叹息道：贫富不均世风日下，同志仍须努力。

2012年3月

说文风

——《文风四谈》序

在中国历史上，凡社会变动都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正当十八大闭幕不久、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之际，各方面的工作都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大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如宋玉所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上面讲大话，"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

品口号化。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之风，全民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

“五八之浮”“文革之左”“现在之假”，这是我们六十多年来的“文风三痛”。正如恩格斯所说，人对自然的每一次破坏都要遭到报复。1958 年的报复是饿肚子、死人；“文革”的报复是国家濒临崩溃；对现在“长、空、假”的报复是信任危机，离心倾向加重。所以十八大新班子一上台就疾呼整顿文风，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作风。

文风，望文生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凡是经文字、语言、艺术等手段之传播而成为一种时尚的，都可以算作文风。文风的范围可分为三大类：与政治、行政关系密切的文件、讲话、会议及政要人物的文章、著作；大众传媒中的文字和节目；出版或上演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文风与社会政治走向，特别是与主政者的好恶关系极大，所以文风的倾向最先反映在与施政相关的第一类文字中，再从第二类到第三类。

“长、空、假”的要害在“假”。虽然坏风无有不假，但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假风已深入骨髓，更加可怕。无论 1958 年吹嘘经济方面的高产，还是“文革”中歌颂“红太阳”，人们内心还有几分真诚，哪怕是在蒙蔽中的真诚。连毛泽东听到钱学森的理论推算，都相信土地能够高产。“文革”中红卫兵真的可以随时为革命、为领袖去献身。“文革”后期曾有“牛田洋”事件，一群军垦大学生和战士手挽手迎向海浪，相信下定决心就能

争取胜利，当然全部葬身大海。这当然是一幕悲剧，但说明那时还是有一点愚忠、愚真的。现在没有人这么“傻”了，学会了伪装、弄假。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没有了“天真”，却假装真诚；没有了“迷信”，却假装服从，这才是最可怕的。

“长”和“空”是为“假”做掩护的。习近平同志说：“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为什么开长会、讲长稿、发空文、争版面、抢镜头及急着个人出书呢？是在作秀，是装着在干活，要弄出点动静来，好显得有才、有政绩。已在位的树碑立传，未到位的借机要官；没有政绩的玩花架子遮假，没有真本事的靠秀才艺壮胆。把工作、干部、群众都绑架在他借公谋私的战车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做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些“长、空、假”的人心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解决问题，都是在为自己捞资本。工作为轻，我为重，工作都是假的，文风焉能不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58 年人人头脑发热，“文革”中全体个人迷信，但还很少有哪一个干部为了个人目的去出书、争版面、抢镜头、发长文。文风之堕落，于今为烈。

这种“长、空、假”怎么治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风是末，官风是本。治文风要先治党风、政风，特别是官风。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要增强党性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努力成为

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

文风后面是政策，是制度。纵观历史，每当一种不好的文风得到治理时，社会也就大前进一步了，我们期待着。

2013 年 3 月

说经典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典就是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不会忘记。

常言道“话说三遍淡如水”，一般的话多说几遍人就要烦。但经典的话人们一遍遍地说，一代代地说；经典的书，人们一遍遍地读，一代代地读。不但文字的经典是这样，就是音乐、绘画等一切艺术品都是这样。一首好歌，人们会不厌其烦地唱；一首好曲子会不厌其烦地听；一幅好字画挂在墙上，天天看不够。甚至像唐太宗那样，喜欢王羲之的字，一生看不够，临死又陪葬到棺材里。许多人都在梦想自己的作品、事业成为经典，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工程的等等，好让自己被历史记住，实现永恒。但这永恒之梦，总是让可怕的重复之手轻轻一拍就碎，它太轻太薄，不耐用，甚至经不起念叨第二遍。倒是许多不经意之说、之作，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不经意间成了经典。说到“柳”，想起至今生长在河西走廊上的“左公柳”。一百多年前，左宗棠带着湘军去平定叛乱，收复新疆。他一路边行军边栽柳，现在这些合抱之木成了历史的见证，成了活的经典，凡游人没有不去凭吊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经典，1939 年陕北公学的一批学生毕业要上前线，毛泽东去讲话说：“《封神演义》里姜子牙下山，元始天尊送他三样法宝：打神鞭、杏黄旗、四不像。今天我也送你们三件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经典就这样产生了。莎士比亚有许多话，简直就是大白话，比如：“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些话被人千百次地模仿。就是《兰亭序》也是在一次普通的文人聚会上，王羲之一挥而就。当然，经典也有呕心沥血、积久而成的。像米开朗琪罗的壁画《末日的宣判》，一画就是八年。不管是妙手偶成还是苦修所得，总之，它达到了那个水平，后人承认它，就常想起它，提起它，借用它。它如铜镜愈磨愈亮，要是一只纸糊灯笼呢？用三五次就破了。

经典所以为经典，原因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

经典不怕后人重复，但重复前人却造不成经典。

文化的发展总是一层一层，积累而成。在这个积累过程中要有个性，能占一席之地必得有新的创造。比如教师一遍一遍讲数理化常识，如果他只教书而不从事科研，一生也不会造就数学或物理科学方面的经典。因为只有像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像伽利略发现了重力加速度，像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等，才算是科学发展史上的经典。马克思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这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经典。它是创新，不是先前理论的重复。唐诗、宋词、元曲，书法上的欧、颜、柳、赵，王羲之的行书、宋徽宗的瘦金书，都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过，实现了“空前”，有里程碑的效果。我们回望历史，就会看到这些高峰，它们是一个永远的参照点。

经典又是绝后的，你可以重复它、超越它，但不能复制它。

后人时时地想起、品味、研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吸收借鉴它，以便

去创造自己新的经典。就像爱因斯坦超越牛顿，爱翁和牛顿都不失为经典。齐白石谈到别人学他的画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因为每一个经典都有它那个时代、环境及创造者的个性烙印。哲学家讲，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比如我们现在写古诗词，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李白、李商隐、李清照的神韵，岂止唐宋，就是郭小川、贺敬之也无法克隆。时势异也，条件不再。你只能创造你自己的高峰，唯其这种“绝后”性，才使它高标青史，成为永远的经典。

我们对经典的重复不只是表面的阅读，更是一次新的挖掘。

经典所以总能让人重复、不忘，总要提起，是因为它对后人有启示和指导价值。“绣出鸳鸯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经典不只是一双锦绣鸳鸯，还是一根闪闪的金针。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了理性的意义，有观点、立场、方法、思想、哲理的内涵，唯理性才可以指导以后的实践。理性之树常绿。只有理性的东西才经得起一遍一遍地挖掘、印证，而它又总能在新的条件下释放出新的能量。如天然放射性铀矿一样，有释放不完的能量。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都是永远的经典，早超出了当时的具体所指而有了哲理的永恒。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朱自清《背影》中父亲饱经风霜的背影，小提琴曲《梁祝》中爱的旋律，还有毕加索油画中的哲理，张旭狂草中的张力，也都远远超出自身的艺术价值而有了生命的启示。

总之，经典所以经得起重复是因为它丰富的内涵，人们每重复它一次都能从中开发出有用的东西，像一块糖，因为有甜味人才会去嚼。同样，一篇文章，一幅画或一个理论，能经得起人反复咀嚼而味终不淡，

这就是经典与平凡的区别。一块黄土，风一吹雨一打就碎；而一颗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亮。

《京华时报》2005 年 5 月 10 日

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一次谈文化，有人问什么是低俗、通俗和高雅？我一时语塞。如果凭感觉来回答，当然谁都知道，再往深说，有什么理论根据呢？我就赶快回来查书和旧日的读书笔记，于是有了一点新的梳理。

谈这个问题先得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是由动物变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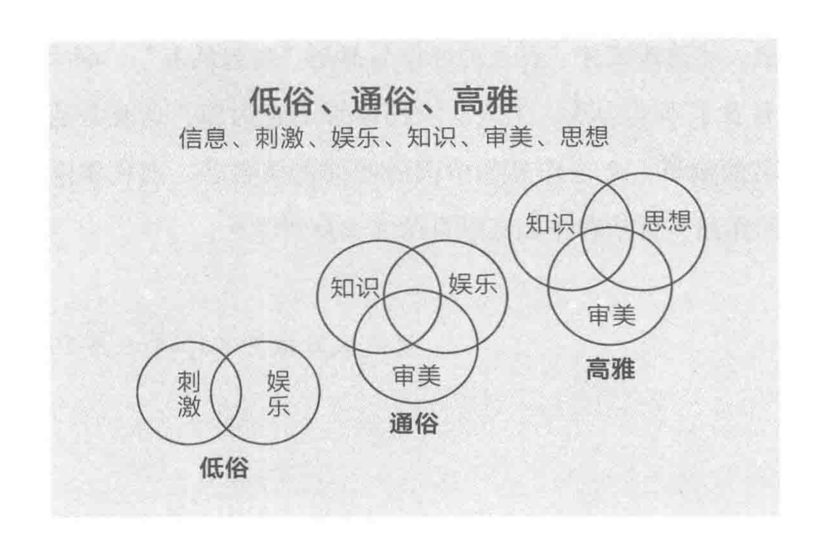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最初的动物中发展出脊椎动物，“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于是人就有了两面性：动物性与人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一般来说，“俗”是指人动物性、物质性的一面；“雅”是指人性、精神性的一面。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分为三种。一是欲望关系，占有的欲望。如见美食就想吃，见好衣就要穿，一个猎人见了老虎就必定要捕杀它。欲望关系是以占有、牺牲对象为前提。二是研究关系，只想弄清对象的真相、规律，并不占有或牺牲它，这是科学的任务。如动物学家跟踪老虎，只是为了研究，绝不干涉老虎的行为。三是审美关系，只是欣赏，并不占有，也不想对它做更深研究。黑格尔称这为心灵的美感。它的特点是不把对象看作实用的个体，心中不起欲望，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只生起一种愉悦的美感。如观众看演出，旅游者看山水。我们从欣赏角度看老虎，也只欣赏它的花纹、雄姿，而绝不会有捕杀的欲望或研究的耐心。

就是说人面对一物会有三念：占有的欲望、冷静的思考和愉悦的欣

赏，就看你选择哪一种。这三种念头第一种源于人的动物性、物质性，可称为“俗”；第三种体现人的精神存在，可称为“雅”。俗与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这就是“通俗”。

人自身的两面性与对外的三种关系，使人在行为方面产生了六种精神需求，也可称为阅读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和审美的需求。大致说来，前两项刺激、休闲是满足物质需求的，可归于“俗”；后两项思想和审美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可归于“雅”。中间两项比较模糊，兼而有之。但最低、最高的两项，即刺激与审美的需求却是很典型的。刺激就是勾起人的欲望，满足人的动物性，是最低的一档。这是一切黄色、凶杀、打斗、赌毒类低俗作品的心理基础和市场基础。过去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人们常问，扫黄、扫黄，为什么总是扫不完呢？它不可能扫完。只要人动物性的一面还存在，人与外界的欲望关系还在，它就要寻求刺激、发泄与满足。我们只能把它控制在最低限度：不公开传播，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危害青少年。相反，这六种需求的最高一档，即审美需求则是来满足精神的心灵的需要，常表现为纯艺术。其代表如已被历史洗练、陶冶过的唐诗、宋词、古典音乐、名画及一切经典作品，它没有任何物欲的刺激，全在净化心灵，这无疑是最高雅的。但是人们食人间烟火，正常的欲望还是要的，还得有作品去满足他的休闲需求、信息需求、知识需求等，这里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就是“通俗”。通俗的标准是不刺激人的欲望心理但又不脱离人的物质的现实。所以纯艺术、纯思辨性的作品不在通俗之列，它归于高雅；另一方面，纯刺激性的作品也不在通俗之列，

它归于低俗，或名粗俗、庸俗。



上面我们从接受角度，即人接受作品时的“两面性、三种关系、六点需求”，谈了低俗、通俗和高雅的存在基础，这样我们就知道社会上为什么会有三类截然不同的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低俗的作品是从人的物质欲望出发，刺激并满足人的贪占、享用要求；高雅的作品是从愉悦人的精神出发，满足人的审美要求。低俗作品让人回归动物的、物质的一面；高雅作品让人升华精神的、道德的一面。

通俗则是低俗与高雅间的过渡地带。但我们一般说的通俗是有方向性的，它是指从高到低的过渡。就是说作品内在的思想、艺术（审美）水准已经很高，但是照顾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兼顾到他的需求（通常叫大众需求），而采用了他能接受的方式。注意，这里的要害是“高起低落”，是从高雅的标准出发落实到一个通俗的效果，从而避免了低俗。如果反过来从低俗的标准出发，就会滑落得更低，而永远不可

能达到通俗的效果。就像委派一个大学文化程度的教师去教小学，可以把小学生培养成人才；而委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教师去教中学，则只能把人才教成废才。真正的好作品都是“高起低落”，深入浅出，专家学者看了不觉为浅，工人、农民读来不觉为深，这就是通俗。这方面著名的例子，文艺作品如中国的四部古典名著，现代作家老舍、赵树理的作品，哲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人民日报》2010年8月19日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近年编书之风日甚，一编者送来一套文选，皇皇三百万言，分作家卷、学者卷、艺术家卷，共八大本。我问：“何不有政治家卷？”问罢，我不由回视书架，但见各种散文集，探头伸脖，挤挤擦擦，立于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咏物、品酒、赏花、四季、旅游，只一个“情”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开揉碎，一个颗粒名为一集。“选家”既是一种职业，当然要尽量开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标新立异，务求不漏，这也是一种尽职。但是，既然这样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学者、画者都可立卷；以题材而分，饮酒赏月，卿卿我我，都可成书，而政治大家之作，惊天动地之事，评人说史之论，反倒见弃，岂不怪哉？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上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过去也确曾这样做过。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地最大之事，只有千万人利益共存同在之事，众目所瞩，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人帮”覆灭、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中国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人心、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钟。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1949 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声雷动，1976 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四人帮"的黑纱白花和汪洋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爆发与流露。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即便是一万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予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绝对分开。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妨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更有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挨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确实

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因为文学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正如绿叶没有红花，也照样可以为其叶。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少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有的还成为名作经典。如《洛神赋》《赤壁赋》《滕王阁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作家对政治的远离是因为政治曾有过对文学的干扰，如果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我们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弄得文学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作品中只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会平淡无味。如杜甫所言“但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事实上，每一个百姓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作家也一天没有离开过政治。上述谈到的近百年内的几件大事，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应该说，我们现在政治的民主空气比前几十年是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的转换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开会时激动，游行庆祝时激动，但是照搬到文学上，常常要煞风景。如鲁迅所批评的口号式诗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学逻辑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间的转换一样，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与文学审美间的转换，才会达到内容与艺术的统一。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对作家来说首先是不应回避政治题材，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这种政治题材

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写，也可由作家来写。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仕，先为仕后为官。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好文，是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过秦论》《岳阳楼记》《出师表》，近代林觉民《与妻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等许多文章，还有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就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它三千字。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是时势所限，环境责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属凤毛麟角了。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者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叫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翻天覆地，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是新中国。邓小平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新中国开创之初，曾有过一大批好作品问世，至今为人乐道。新时期又该再有一轮新作

品问世。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恩格斯论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期盼着新人，期盼着好文章、大文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过去的革命斗争及现在改革开放的业绩不但要流传千古，她还该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这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艺术也流传千古。

《人民日报》1998 年 7 月 11 日

文章三层美

散文既是一种艺术，其美是有层次的。我认为可以分为三层。

第一个层次是描写的美。作者能将要说的事物客观地、清楚地写出来摆在读者面前。要求如实，不走样，能显示事物本来的美。类似美术作品中的素描。

第二个层次是意境的美。作者在对某事物的描写或某种思想的表达中能产生一种美的氛围、意境，将读者引到一个美的精神境界。这个境界是作者的主观境界，是别人无法替代创造的。类似美术作品中的写意。如果是素描作品，不同的画家画同一物互相可以很像。而写意画却不同，画家虽面对同一对象，画出的却大相径庭。可以看出画家在作品中加入了自己个人的思想、气质。这种美是以现实物为核心衍射出的一种光环，又好像一块糖刚开始溶化，糖连同靠近它周围的水滴（无形的糖）一起构成一种甜。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是客观的美，第二个层次就是主观的心灵美。

第三个层次是哲理的美。作者在对客观事物做了描述，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并感染了读者后，又进一步升华到一种哲理思想上，并理出一种新理念，创造出一些警句哲言，将其“定格”下来。第二个层次的艺术力量主要是在人们的胸怀中鼓荡，以情动人，使读者或悲或喜激动不已。第三个层次的艺术魅力是一种冷静的思索，使读者在经过一番景的陶醉、情的激动之后，静思其中之理，并悟出宏观之道。而这种道理又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经你道破后人人承认。所以这一层次的美又返归到客观的美，

不过更高一层。与美术作品比，它是抽象的、象征的画。还以那块糖比，这时糖已全部化完，我们找不见它的原形，但甜味是客观地存在着的。

第一个层次借助客观形象，其艺术力是暂时的，过目即忘；第二个层次袒露作者主观的心象，有个性，艺术力持久；第三个层次又返归到客观真理，点破天机，使人们永久地折服。列简表如下：

第一层次	描写美	客观形象	直觉暂时
第二层次	意境美	主观形象	情感持久
第三层次	哲理美	客观抽象	思想永久

当然在一篇散文中要同时达到这三个层次是很难的，每篇文章可以主要追求一种美。比如明人魏学洢的《核舟记》就是一种典型的描写美。我以为古文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三个层次兼备的好文章：大量的绘声绘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这是描写的美；由景而及情，“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宠辱皆忘，把酒临风”，这是意境的美；最后将这所有的景和情的积蓄一起迸发出来，点破一条哲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读者读至此处没有不点头的，而且这千古至理名言，一读之后永远不忘。正因为这篇文章在这三个层次上都有完美的体现，所以千百年来人们传诵不衰。

我在前期的写作中并没有悟出这个层次，而且这样划分和解释也未必能得到文艺理论家们的同意。但我在自己后来的创作实践中是按自己的理论来走路的，较能体现这个思想的是《马列公园赋》。

1988 年 5 月

文章五诀

一篇文章怎样才好看呢？先抛开内容不说，手法必须有变化。最常用的手法有描写、叙事、抒情、说理等。如就单项技巧而言，描写而不单调，叙事而不拖沓，抒情而不做作，说理而不枯燥，文章就算做好了。但更多时候是这些手法的综合使用，如叙中有情，情中有理，理中有形，形中有情，等等。所以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花纹交错才成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这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文章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有人看；形式死板，没有变化，也没有人看。

变化再多，基本的东西只有几样，概括说来就是：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文章五诀”。其中形、事、情、理正好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个内容，又是描写、叙述、抒发、议论四个基本手段。四字中“形”“事”为实，“情”“理”为虚，“典”则是作者知识积累的综合运用。就是我们平常与人交流，也总得能向人说清一个景物，说明白一件事，或者说出一种情感、一个道理。所以这四个字是离不开的。因实用功能不同，常常是一种文体以某一种手法为主。比如，说明文主要用“形”字诀，叙述文（新闻亦在此列）主要用“事”字诀，抒情文主要用“情”字诀，论说文主要用“理”字诀。

正如一根单弦也可以弹出一首乐曲，只跑或跳也可以组织一场体育比赛。但毕竟内容丰富、好听、好看的还是多种乐器的交响，和各种项目都有的运动会。所以无论哪种文体，单靠一种手法就想动人，实在很难。一般只有“五诀”并用才能做成斑斓锦绣的五彩文章。试用这个公式来检验一下名家名文，无不灵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一篇“记”，但除用一两句小叙滕子京谪守修楼之事外，其余，“霪雨霏霏”“春和景明”都是写形，“感极而悲”“其喜洋洋”是写情，而最后推出一句震彻千年的大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形、事、情、理四诀都已用到，文章生动而有深意，早已超出记叙的范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讲国家图强的论文，但却以形说理，一连用了“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等九组十八个形象，这就大大强化了说理，使人过目不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从张思德牺牲说起，是事；沉痛哀悼，是情；为人民服务，是理；引司马迁的话，“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典。特别是借典说理，沉稳雄健，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支点。有人说马克思的文章难读，但是你看他在剖析劳动力被作为商品买卖的本质时，何等的生动透彻：“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这里，“形”字诀的运用，已不是一个单形，而是组合形了。可知，好文章是很少单用一诀一法，唱独角戏，奏独弦琴的。我们平常总感到一些名篇名文魅力无穷，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暗合了这个“文章五诀”的道理。

常有人抱怨现在好看的文章不多，原因之一就是只会用单一法。比如，论说文当然是以理为主，但不少文章也仅止于说理，而且还大多是车轱辘

话，成了空洞说教。十八般兵器你只会勉强使用一种，对阵时怎能不捉襟见肘，气喘吁吁。不要说你想“俘虏”读者，读者轻轻吹一口气，就把你的小稿吹到纸篓里去了。前面说过，形、事为实，情、理为虚，“五诀”的运用特别要讲究虚实互借。这样，纪实文才可免其浅，说理文才可避其僵。比如钱钟书《围城》中有这样一句话：“（男女）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这是借有形之物来说无形之理，比单纯说教自然要生动许多。

“文章五诀”说来简单，但它是基于平时对形、事、情、理的观察提炼和对知识典籍的积累运用。如太极拳的掤、捋、挤、按，京戏的唱、念、做、打，全在临场发挥，综合运用。高手运笔腾挪自如，奇招迭出，文章也就忽如霹雳闪电，忽如桃花流水。

《人民日报》2003 年 1 月 10 日

开会与讲话

党政部门的日常工作是大量的开会和讲话，它就像我们吃饭和喝水一样平常。但是在这最平常的事情中却最能体现出我们的作风和效率。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平时开会与讲话的质量，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开会是在酿造新思想

会议有各种类型，传达会、报告会、汇报会、研讨会等等，但不管有多少种名堂，一律要有新思想。与会者到会场来就像人肚子饿了进食堂，总不能再空着肚子回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许多会议就像一张没有上菜的餐桌，大家只能拿着筷子空比画。会议是酿造新思想的，是制作精神之餐的。一个好的会议，连会场中的空气中都充满着思想。一个好的报告会，报告人要能牵着人的思维走，就像一面聚焦镜，能将人的思维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聚拢来又发射出去，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一种共鸣的力量，整个会场有一种共振的效果。一个好的讨论会，会场像一场无形的足球赛，每个人的思维之足都伸向那个唯一的球，激烈地争夺，充分地交锋。如果与会者言不及义，言不由衷，就像一场没有球的球赛，有什么踢头？一个好的汇报会，每一个汇报者就是一团吐着新焰的火苗，听者是一锅平静的冷水，得用你的温度去使他

激动，使他沸腾，直到整个会场万焰跳动，热气腾腾，思想汽化、升华，充满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开会是一件很严肃、很郑重的事。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根据地开一次重要会议，常常要让干部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回来，有的同志就牺牲在来开会的途中。但是没有办法，不开会就不能统一思想，革命会损失更大。现在世界上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双边、多边甚至全球性的会议。人们总是带着原来的想法来到会议室，又带着新的想法离开会议室，去工作，去实践。可以说是会议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推动这个地球。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只记录那些新的创造、新的思想，而把重复的东西统统甩掉。比如科学史上记住了牛顿、爱因斯坦，社会科学史上记住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因为他们有创造。一个会议也是这样，历史只记住了那些划时代的有开创意义的会议，比如中共党史上的一大、七大、遵义会议，因为这些会议产生了新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党的路线，胜利地指导了党的实践。大会如此，小会也是这样，我们开一次会总要能产生一点新的思想，对工作有一点推动，这样的会议才值得开。可惜就像大吃大喝已经失去了吃饭充饥的意义一样，现在许多会议也早已失去了酝酿新思想的意义。会议的浪费是一种更大的隐形的浪费。

要想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有两条应该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选题。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会议既然是酿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酿造的时机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选准题，会前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工作。会议题目选准了，这个会也就成功了一半。会议应急社会之急、工作之急和与会者之急，有的放矢。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这种会绝不会空泛，不会说旧话、套话，它逼着我们必得产生一个新思想、

新方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现在有些会议所以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发展到此时此刻的话题，是一种四季歌式的例会。于是就空谈、就旅游、就吃喝，到时散会走人。二是要调动与会者积极参与。开会如打仗，既要选战机又要鼓士气。会议开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与会者的思想变化。与会者的思想就是会议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采众料，善掌火候，把与会者的各种想法掏出来，再酿出一个统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水过地皮湿，会议也就走了过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大家凑到一起，总会有新思想、新方案，许多突然召集的会议也有开出效果的。可惜我们的许多主持人就是“武大郎开会”，听不出、发现不了每个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厨师一样巧用料，善掌火，变出一个新菜，而是像典礼上的司仪，只会刻板地宣读程序。过去，农村搞极“左”，农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不出粮食。同样，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会议也产不出新思想。凡开会，会前没有急切之心，会上没有求新之心，这样的会议是开不好的。

讲话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写字和说话是我们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发文件和讲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两种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正襟危坐，宣读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讲话就常被当作应酬、客套、例行公事。于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到处可见。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报刊来工作。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动员打仗、搞“土改”，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讲话。那时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就只带

着一双耳朵来开会，听了我们的讲话，回去一传达，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那时候要是也像现在这样打官腔，哪有这个江山？检验我们讲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群众记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话也没有记住，说明你的话没有用，没有入脑、入心，没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没有想到要通过讲话来做工作。

工作是什么？就是改变现状，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复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减、有改进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状，先变工作之人，要先武装他的头脑，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话时要给人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要通过这三把钥匙开启听者的心扉，开启他头脑里紧闭的大门。他接受了你的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新信息。不调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况，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二是浅，没有知识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比信息又进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开始反映事物的规律。凡从事某一种工作，就必须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一棵百尺之树必须有十丈之根。知识是某种专业、某种工作的根。而我们一些同志对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讲话讲不到根上，常抓住一点自以为得意的枝叶、花絮哗众取宠，而听的人却早在暗暗叫俗、叫浅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了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没有新思想。讲话的内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识，还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识是死的，是垫在脚下的阶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里的工具。给人以知识和

信息好像替人打开窗户，吹进清风；给人以思想则是让他自己推窗望远，吐故纳新。“鸳鸯绣出从君看，‘又将’金针度与人”，工具比产品更宝贵。讲历史唯物主义比讲历史更重要，讲辩证法比讲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语言人们才能记得住。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孔子、老子这些哲人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时间长。我们平时讲话不敢企求有多么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导工作，总要超出现象说一点道理，好让人家举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讲话就是一架复印机，省里传达中央的，县里传达省里的，乡里传达县里的。上面的精神虽好，还得要加上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落实。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与自己工作的结合点，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自己的工作之果。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东西，你只有讲这一点时，群众才爱听。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许多同志讲出的话，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涩软蔫。信息、知识、思想都可以是转承过来的，唯有语言只能是自己的，它像笔迹、指纹一样有个性。说的过程也是创造，同样一句台词，不同的演员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清代学者李渔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比如，他这里就故意把“心灰意懒”用成“意懒心灰”。讲话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衣服。人不变，衣常换，也有新鲜感。语言不新没有个性，人们听起来就“意懒心灰”，稍一转换，就“眉扬目展”。比如我们平常说不能讲空话，说多了这词也不新了。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山区，听到一件事。山区多野猪，常于夜间糟害庄稼，农民先以锣鼓惊吓，后将喇叭悬于电线杆上放录音。野猪开始不敢来，后渐渐靠近，最后干脆将电线杆都掀倒了。

这位同志说：讲假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谁还爱听？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们也容易记住。

关键是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心

我们的讲话和会议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责任心要强，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来讲，当我们的工作亟须突破时，这会议和讲话就有实效，因为这时不允许你敷衍。时势逼你尽职尽责。就像我们饭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经心地散步，爬楼梯时就得认真出点力了。没有听说饭后在楼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异化为一种休息；开会、讲话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异化为一种过场。如果我们时时有重任在身，有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会议和讲话的质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创造心。作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追求技压群芳，运动员追求破纪录。他们都把自己的专业生命定位在创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这样，开会必得形成新思想，讲话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没有必要去做。当工作没有新意时，会议就没有生气，讲话就没有新词；当工作找不到新问题时，会议就没有焦点，讲话就讲不到点子上，就像拿眼药水往腿上抹。当一个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心时，他就会把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讲话都当作一次创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时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会议，许多不起作用的只是应酬的讲话可以统统省掉，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

1996年7月8日

笑谈真理又何妨

这个题目是我读初中时，在《人民日报》上见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引列宁的话意，说我们谈话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板着面孔？就是严肃的真理也可以笑着来谈，是讲宣传方式和效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题目，因为天天读报，特别是读言论时，看到的仍是冷面孔多，笑面孔少。

一次参加作品评奖，有一篇题为《“揉屁股”现象及其他》的言论，终于使我笑了起来。文章说小时候惹了祸，父亲气得拉过来狠打一顿屁股，过后母亲又搂过来心疼地揉一揉。现在不少单位在报上挨了批评后，便要求接着发篇改正稿，甚至表扬稿，不发还不行，非得给“揉一揉”才算了事。此稿批评捧场、作假、护短甚至要赖的社会风气入木三分，却又让人忍俊不禁，可谓笑谈真理。

真理的内容是一回事，表达方式又是一回事。许多重大的、艰深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笑谈的。毛泽东一生大都在笑谈真理。重庆谈判，记者问：“和谈破裂，毛先生能战胜蒋先生吗？”他说：“蒋先生的‘蒋’是将军头上加棵草。不过草头将军而已。”说完大笑。又问：“那，‘毛’字呢？”“我的‘毛’是毛手毛脚的毛，又是个反‘手’，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易如反掌。”这回连记者也笑了。这是何等的自信，又何等轻松。当大革命失败，许多人心灰意冷时，他说，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是海上已露出桅尖的

航船，是喷薄欲出的红日，是躁动于母腹的婴儿。革命快胜利了，我们要进城了，他说，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警惕糖衣炮弹。作为接班人的林彪突然叛逃，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科学家也在笑谈真理。有人向爱因斯坦请教相对论，他说，与老妪相坐日长如年，与漂亮的姑娘相坐时快如梭。法拉第做学术演讲，并表演磁变电实验，台下一位爵士说，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说，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向你交税的。现在全世界用电创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谁能统计清楚？

真理是既深刻又平凡的。深刻是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又常为表象所掩蔽；平凡是因为和人的切身利益有关，人人可以感受感知。新闻是不断通过信息（现象）的叠加，供读者分析认识事物；文学是通过故事的叙述让人认识社会的本质；理论是直接揭示规律给读者。笑谈真理则是借读者已经感受到的现象或道理喻知事物的本质，如诗歌艺术中的比兴手法，由此及彼，由浅入深，渐入佳境，更见效果。

真理而能笑谈，第一是作者拥有真理的自信，第二是他知识的渊博。笑，是胜券在握时表现出的轻松。两人辩论，理屈词穷的一方总是紧张得手心都出汗，而将胜一方可以一言不发，只以微笑来逼视对方的窘态。笑谈又是一种附加了形式美的对内容的阐述。像足球射门，可定点射入，也可凌空倒钩一脚射入，虽然都得一分，但后者更能博得观众雷动的欢呼。杂技舞台上的丑角恰是由水平最高的演员担任，他能在技巧之外又加进艺术（语言的、形象的），从而使观众获得轻松的享受。苏东坡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是一种何等自信的实力的显示。

作者只有在吃透了自己所论的问题，同时在知识、语言、方法上又都绰绰有余时，才能笑谈真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又真又美。

1992 年 9 月 18 日

警惕学习的异化

近读《中国档案报》社编辑出版的一本《解码尘封档案》，其中详细记录了“文革”中《毛主席语录》的编写过程，思考良多。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第二年提出军队要掀起学毛著高潮，并说训练、生产都不能冲击学习。1961年4月又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解放军报》要登语录。于是军报开始在头版登语录。1965年8月1日，64开本《毛主席语录》发行，每个战士一本。地方上起而效仿。1966年12月17日，全国各报发表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文革”时，《毛主席语录》已正式由新华书店发行，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印刷，几乎人手一册。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主席语录》热戛然而止。

应该说，当年的语录热，对普及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常识也是那个时候垫的底。但万事不可太过，过则走向反面。学习本是一种自觉的探求，冷静的辨别，科学的实践，求不得轰轰烈烈，更不能搞成运动。既成运动，便来如潮涨，去如潮落，就躲不开涨潮时的盲目和退潮时的寂寞。寂寞之后当然应该有思考。

任何事物，除内容之外还有形式。形式这种东西有自身的价值，便总想脱离内容，闹出点动静来展示自己的独立。如诗词，人们发明了格律，它是形式，但也是诗词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人以为只要按格律填上字就是写诗作词。生活中许多人就这样求于形式，止于形式，因

为这比内容要容易掌握。于是就本末倒置，就异化变味，生出许多有违初衷的事。如吃饭，当七碟八碗，桌上有鲜花，眼前有乐舞时，那早已不是为吃；如服装，当它变成了舞台上模特的奇装异服时，那也早已不是为穿了。而一个事物每当形式完全俘获了内容时，它也就走到了尽头，不再会有生命力。形式越完备，越烦琐，生命就越僵化，越近停止。八股文是这样，“文革”中的手捧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也是这样。过去，我们不知经过了多少学习运动，现在不少地方也在这“学习化”，那“学习化”，口号喊得震天响，什么领导动员、讲演比赛、有奖问答、开卷考试、辅导验收，不一而足。公款买的学习用书发了一筐又一筐。学习已经被异化为一种形象工程或应酬行为。

近日纪念改革开放30年，重读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关于读书与学习的一段谈话。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据家人回忆，小平确实没有读完《资本论》，但《列宁全集》是仔细读完了的。那是他在江西落难的时候，在那个被软禁的小院里，小楼上的灯光彻夜不熄，他在结合读书思考执政党如何治国的问题。据身边的人讲，小平在视察工作时总是多问少说，静静地听；在读书时，不勾画，不批注，静静地想。他是最不爱虚张声势，弄出点什么动静的人。在南方谈话中他还说：“你们查一查，我们三中全会以来所做的决定，哪一条是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抄下来的，没有。但是你再查一查，我们哪一条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没有。”

当年林彪硬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件好事异化成狂热的个人崇拜，他

自己则企图乘机篡权。而邓小平却因坚持实事求是遭到一批再批，毛泽东到去世前一年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毛泽东去世后，邓却力主搞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指出决议的关键是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宁可不搞。诚如他说的，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这是真读书，真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小平倡导的这种学习精神，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好局面。

《新湘评论》2009年第四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五期

用其心还是用其力

康熙时黄河泛滥，经年不治，工程上马后又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治河老臣靳辅在黄河上滚了十几年，因与皇上看法不一被贬。后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又召他回来。他上书说：“我已 70 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还是请皇上另选他人吧。”康熙说：“我知道你老了，我是用你的心，不用你的力。”黄河于是得治。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我们没有海军。十八万公里海岸线基本没有船舰。毛泽东召长征老将、12 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要他任海军司令，组建海军。萧急了，说：“我是个旱鸭子，哪懂海军？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船，每次都晕得不敢动，怎么当海军司令？”主席说：“就看上你这个旱鸭子。”结果他主持创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毛主席很满意，说：“有萧劲光在，海军司令不易人。”他成了世界上任职最长的海军司令。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用人是用其力，还是用其心？其力，当然要考虑，但前提是他的心，即他的思想、品德、意志。思想是管方向的，即做什么，怎样做。品德是操守，要能把握住自己，处理好公与私、个人与事业的关系。意志是坚持力、毅力、攻坚能力。人才学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的能力相差不多，成功与否常在意志方面。靳辅以 70 岁暮年之身，肖劲光以外行之人，结果都不负重托，卓有建树，是心在起作用。

古人有阅人之术，就是观察人。曾国藩就自信精通此道。有时一个

人的好坏，并不要多么复杂的考察，可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很奇怪，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干部，群众早有议论，其恶行丑闻，就是做邻居也要回避三舍的，却照升，照用。最近公布处理的一位副地市级干部，做县委书记时写了一本他与本县名人的书，好借机出名。封面上他挺胸叉腰，雄视河山。十几个“名人”如指甲盖大的头像，环衬在他的身后。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用“换头术”假造了一张中央领导给他发毕业证的照片，到处吹嘘。有中央领导去当地视察，他本不在现场，又如法炮制一张与领导人的合影。其父母过生日，用公款大摆宴席，请剧团唱戏。他最后翻船是因为查出贪污数百万。但如果没有这些经济问题呢？这种瞒天过海、欺世盗名的做派，就是拿一般的阅人术，一看也知是个坏人，倒退一百多年，曾国藩也不敢用他。这种人格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被人嗤之以鼻的。但在出事前，此人还又提了一级。

用其心，用什么？用其公心，忧国忧民、不以权谋私；用其诚心，不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用其忠心，负责敬业、恪尽职守。这用不着多么复杂的考察，稍一了解，或谈一次话，就能阅其大概。正如一张粗劣的假币，一看就知，用不着再上什么验钞机。人格的高下，是放之四海，求之古今都一样的。君子、小人、忠臣、奸相、清官、污吏，早有定格。我们现在只要回到最低门槛，把住其心就行，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良心。有了这个良心，力不足，可以勤补拙，以诚撼天。没有这个良心，力有余，则正好以权谋私，以能售奸。用人还是用心为上。

《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0日

有感于干部不会说话

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主持人一再提醒与会者讲实例，讲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但一天下来仍是千篇一律，个个如念文章、读文件。结果弄得听者呆坐，记者叫苦。现在某些干部学历挺高，文化不低，却为何“不会说话”了呢？

细细观察有三种“不会说话”：一是离了稿子不会说。某些干部张口就是拿稿来。讲话必要稿子，甚至主持会议的几句开场白、结束语，包括感谢、鼓掌之类的话也要打印工整。真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请客宴宾是不是也要备下“请饭词”，与菜单同步置于桌面，每菜一句，直到“再见，慢走”。讲话不是不能用稿，重要的场合不仅必须用稿，而且还要反复讨论几易其稿。但如果没有稿子就不能讲话，这已不是说话的能力问题，而是为政者的为政资格问题。

二是交流性的话不会说。常见一些讲话者一念到底，听者反应如何、会场效果如何全然不管，讲完了就完了。讲话是一种交流，在会场上讲话虽不能如朋友聊天那样一来一往，但总要看看听者的眼神专注不专注，会场气氛集中不集中。现在科学已发展到人机对话、人机交流，连电脑都能感知人的情绪，根据人的要求应变，而我们一些干部反倒成了落伍的机器，许多会开得不生动，讲话不引人，就是因为讲者缺乏这种随机应变的本事，而这本是一个常人最普通的本能。成语“对牛弹琴”，就是说不看对象，不求效果。人家来开会，听你讲，是带

着问题来，想解决问题。对这些不管不顾，只能说明讲话人或是官僚主义应付差事，或是不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应变的智慧。如果考察干部，只看这一条，就能看出他的工作态度及智商的高低。

三是举例说明不会说。这说明他没有干多少实事。人总是在用思想指导行动，干部指导工作除了有思想，还要有典型，这叫有虚有实。但许多干部在讲话时却只虚不实，你让他举例说明，他做不到，即使做了，也例不证理，驴唇不对马嘴。因为平时本来就少调查研究，心中没有典型，没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悟出的道理，从来没有完成过一个实践—理论—实践的全过程。中央文件传到省，省到县，县到乡，等到向上汇报时，嘴上说的还是文件上的话。一个不会用自己亲力亲为的事例来说明问题的人，在思维上必然没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转换功能，在工作上也绝对不会有什么新创造。

如果离开稿子不会说，回答问题不会说，举个例子不会说，还会说什么话呢？就剩下官话、套话、虚话、假话，工作也成了演戏、念台词、走过场了。这种干部要之何用！

《人民日报》2002年4月1日

让形式不再只是形式

中央提出反形式主义，很得民心。我们要干工作自然会诉诸某种形式。但如果总是重复形式而无实效，就招人烦。最近到陕北府谷县采访，却意外地收获一点惊喜，聊慰烦心。

评“百强”是一种形式，全国各种“百强”已不知几多。府谷是全国“百强”县之一，但他们没有借此形式来招摇，反倒自找其弱，自补其虚。全县还有三万贫困人口，他们决心三年解决“富中贫”问题，类似城市消灭“城中村”、“棚户区”。而且高标准，全国农村贫困线是两千三百元，他们提到三千元，以缩小差距，共同富裕。

“领导送温暖”是一种形式，最常见的是春节慰问。在府谷，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干部不去“骚扰”群众过年，而是等春节过后，就入村落实当年的生产规划。他们不叫“送温暖”，叫送项目和措施到村、到户、到人“三到位”。而且从书记、县长到乡、镇干部，扶贫“三到位”发文公布，年底验收。

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党代会，是我国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种形式。代表、委员应切实参政、议政。可惜基层的代表、委员经常被“形式”为一种空头荣誉，开会才露脸，平时找不见。在当地我也惊喜地看到了其内容的回归。全县的“两代表、一委员”必须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众履行扶贫之责，人人有联系点、帮扶对象，并与党政干部同在一张表上向全县下文公布。

移民建新村也是这几年常用的扶贫形式。但常常进了新村，丢了老根，无法生存。他们吸取教训，除坚持群众自愿外，还有几条“留老根，扎新根”的硬规定：每户留一亩口粮田；离原村五公里到八公里（农民与旧村还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离集镇不超过十公里，可享受集镇公共配套服务；有新的收入来源（务工、“三产”、政策补贴）等。真正移得动，留得住，贫变富。类似还内容于形式的还有很多。

事物总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但是形式可以独立存在，而且往往有摆脱内容去顽强表现自身的价值取向。如诗词的格律、语言的修辞、音乐的旋律等都有独立的美学价值。于是就有了绕口令、风景画、无标题音乐等艺术形式。但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表演艺术家，不能陶醉于自己的工作形式，专门“作秀”。不能总是在那里画风景画，奏无标题音乐，说绕口令。大凡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在革命、改革的上升阶段，总是借新内容打破旧形式；而当有了成绩、有了权力时，就开始保守、骄傲、自恋，借形式来粉饰工作，自欺欺人。形式主义是一个团体僵化、老化的表现。所以中央在“八条”之后又提出反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就是回归内容，让形式不再只是形式，是“革自己的命”，像一棵树，不断退掉身上的老皮，抽出新枝。共产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哲学，总在寻求革新和自我革新。延安整风反过形式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我们反过形式主义，现在党中央又提出反形式主义，我们的事业在波浪式前进。

《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

官员答记者问的十四个“不要”

因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经常采访官员和参加各种官员举办的记者招待会，总觉得我们官员答记者问的水平还待大大提高。这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态度问题，然后才是技巧问题。答记者问是现代政治的一种运作手段，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是主动提供信息、表达沟通意愿、争取民心、获得支持和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切不可有应付、对抗的心理。以低标准来要求，起码须做到十四个“不要”。

1. 不要做报告。答记者问是有问才答，不问不答。虽有时也可借题发挥，但不可太多。常见的毛病是不管人家问什么，只管念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做了一个小报告。甚至是故意占住时间，怕人多问。

2. 不要抖家底。一些地方官，不管回答什么，总要不厌其烦地将自己所辖地的土地、人口、物产、产值，甚至山川、历史、气候，全都抖落一遍。这些并不能见报，也无人关心。

3. 不要居高临下。答记者问就是答客问，对客人要尊重、客气。和气生财，谦虚生威。

4. 不要环顾左右而言他。这样不礼貌，人家觉得你心不诚。相反，答问时你最好始终看着对方的眼睛，人和人的交流主要靠语言，而无言的交流主要靠眼睛。语言加眼睛，诚恳而生动。

5. 不要以不变应万变。不要用外交辞令，否则会给人“滑”的感觉，自以为得计，其实有损形象，吃大亏。

6. 不要有对抗心理。所提问题有时可能尖锐，但不必介意，不要立即摆出一副防范、抵抗状，这样问答将无法进行。

7. 不要念稿子。凡问答都是即时的，试想，你与亲人、朋友谈话，或者你年轻时谈恋爱，是否也先有一份稿子？有稿，就有其心不诚、其人无能之嫌。

8. 不要上专业课。答记者问就是通过媒体普及你的思想、你的观点。你讲得又专又深就等于白说。钱学森要求大学毕业生交两篇论文，一篇专业论文，一篇科普文章。真懂是能深入浅出。官员也要有两种本事：一是起草文件、写工作报告；二是动员群众，包括回答记者。

9. 不要假装幽默。幽默是宽余的表现，是达到目标的同时还有一点花絮，如篮球的空中扣篮，足球的倒钩射门。没有真本事，不要幽默。许多官员以为答问时幽默就能得分，结果身子能倒钩，球却进不去，弄巧成拙。

10. 不要借机捧上级。大型记者招待会，有时是各级官员出场，由最高官员主持。常有低级官员借答记者问捧上级，让人肉麻。虽面向记者，却心系领导。这是封建政治、奴性人格的表现。无论民主政治还是现代传媒都无此内容。

11. 讲话的前奏不要太长。答问，是接问作答浑然一体，如太极拳之借力发力，四两拨千斤，一开口即要接上记者的问话，不要自加前奏，自泄其气，反招人烦。

12. 讲话不要超过五分钟。长则有水分，长则惹人嫌。

13. 不要讲空话、套话。你要明白这些话统统不会见报，所有的记者都是挑最有个性的材料和语言来写稿。

14. 不要向记者发脾气，更不可动粗，否则弄不好身败名裂。就算

已看出是对方设的圈套，也要机智地、有风度地绕过去。

这十四个“不要”所否定的行为都是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屡屡看到、现仍在发生着的。特整理奉上，以资官资政。

《人民日报》2010 年 3 月 24 日

地震教我们如何说话

“5·12”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外只有一个呼声：抗震救灾。过去常不绝于耳的几种声音，如老百姓对政府的批评，西方媒体对我们的挑剔，社会上的谣言和猜测，统统没有了。大地这一发威，把舆论都震住了。

舆论是比军事的、经济的、物质的等一切硬实力还难对付的软实力。俗话说众口难调，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又百口莫辩，任你怎样解释，人家总是不信。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对付，这就是事实。要学会用事实说话，用重要的事实说话，用真诚的口吻说话。抗震救灾，检验了我们的经济实力、组织能力，也检验了我们的说话能力、把握舆论的能力。

大道无形，强不言兵，最好的说话方式是不必再说。过去群众对政府的工作有意见，如腐败、效率等等。这次收到地震消息时，总理还在外地回京的路上，立即掉转车头直奔机场，就在飞机上发表抗灾动员。四个小时后，已落地在废墟中指挥救灾。当日就近调帐篷五千顶，十天后又在全国再增调九十万顶。救援队水、陆、空并进，三天内，来自数千里外不同方向的，挂着北京、广州、青岛、沈阳等不同牌子的白色救护车，已按划定分工出现在灾区各县、各镇。这时百姓还有什么话说，无论是灾民，还是全体国民，只有一句话：政府效率高，政府想着百姓。什么是政治？国家、民族的全体大事就是政治，这几天救灾是最大的事，就是政治。儒家的思想“民为邦本”，孙中山说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毛主席说“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政府，能给老百姓办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这是人类长期积累的共同的政治文明。此时此刻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最得人心的政府。全国人民高高举起的双手既是对灾区的支援也是在对政府的致敬，哪里还会有什么牢骚？

信息公开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表现。最好的工作形式就是无形式，这次救灾工作及其报道，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明。地震突发后，相关部门每天都召开新闻发布会，电视台二十四小时滚动报道，各媒体都有记者深入到灾区的每一个角落和后方的每一条生产线、运输线实时播报。一时，人们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概念，一是灾难，百年不遇的大难；二是救灾，一刻不停地救灾。事实的透明带来思想的统一。这场救灾检验出了我们的两个进步，一是政治进步，政府坦诚，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欢迎监督，每一笔资金、一项物资都可跟踪调查。二是科技进步，通信、电话、网络提供了全程、全方位的服务和监督。或捐赠救灾、寻找震后亲友，或监督举报都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及有救灾帐篷流向市面，怎么解释。民政部立即答应查办。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这样，小道消息还有什么市场？我们要感谢在地震前不到半个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这比美国1976年出台的《阳光下的政府法》晚了三十多年，但我们还是追上了世界政治文明，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就遇上了这个刚刚出台十多天的法规，这也是天意。

过去西方媒体最喜欢做的文章就是中国的人权。我们常对他们说，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也许他们没有什么体会。当温总理在废墟上大喊：第一是救人！当连续三天，全国都为死难者下半旗志哀时，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政府是怎样尊重生命。而近来在西方，无论是政府、国会

还是媒体都一片声地称赞中国政府的救灾行动。谣言止于透明，偏见化于诚恳。当年朱镕基访问美国，示威者围着他下榻的宾馆闹人权，朱第二天讲话说，你们急什么，我们自己的事，我是总理，我比你们还急。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耐心地解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什么事一乘十三亿太多，一除十三亿又不够。这都是诚恳的态度。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向全世界再次显示了这种诚恳。就在一个月前，西方还有人借“藏独”说人权，地震后却出奇的平静。诚恳再加事实，总会理解，总能沟通。

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洗涤剂。灾难也是洗涤剂，这次地震帮我们洗掉了许多旧方法、旧作风。让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大进了一步。我们不敢说以后有多好，但再遇到困难时，听到批评时，我们就想一想这次地震。就像过去常说的想一想战争，想一想长征。

《人民日报》2008 年 6 月 30 日

谁敢极言？谁能极言？

我们平常讲到一个问题的重要，或者为引起重视，就说“极言之”如何如何。可见人们的思维习惯是要听要害之点，不愿听不痛不痒的套话。

我们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能忘记小平同志在1980年1月的一段著名讲话：“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当时为强调不受干扰，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买两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你看，横下心、不受干扰、始终如一、顽固一点、买两吨棉花，何等坚决，这就是“极言”，抓住问题的要点，以极其鲜明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回首三十年的大发展，大成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这段话的精辟。什么叫振聋发聩，什么叫挽狂澜于既倒，什么叫力排众议，此言之谓也。

就像名医号脉、扎针，政治家、思想家之评事论政也是号脉扎针，不过取的是思想之穴，号的是时代之脉。回顾二十八年前邓小平这段话，又使我们想起马克思也有一句“极言之”的话，讲得更彻底：“无论哪个旧的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无论、绝不”，其口气之坚决，

不容半点商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小平那段话，经二十八年的检验足见其真，而马克思的这一段话已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是在栽了几个跟头，吃了许多亏后才深刻理解的。

能极言，敢极言，除了深刻的洞察力，还要有坚持己见的勇气。自信自己是站在真理一边。彭德怀在庐山遭批判后六年不认输，1965 年毛泽东给他分配工作时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近读到一则史料。当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大造舆论。梁启超毅然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其中有一段可谓极言，掷地有声："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当年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生育受到批判，他也是这种勇敢："老夫年过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压制，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极言，是指极准确、极深刻、极彻底，绝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意气用事，故走极端，逞一时之快绝不算什么英雄。敢极言之人恰恰是深思熟虑，敢当大事、能为大事之人。中英香港遗留问题是个难题，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谈判想再拖延交还香港。外交谈判一般是讲究方式、方法，甚至用语还要圆滑一点，但邓小平却以一席直白的铁板钉钉，力不可撼的极言，敲定了香港回归的大局。他说："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 1997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当时我方一部长失言，说香港回归后可不驻军，邓说，无知，立即将其撤职。极言的后面必有极坚决之立场和行动为证，当年梁启超讲了那段极言之后就与他的学生蔡锷联络，策划起兵反袁了。

“极”是什么？是极点，是思想的最深处，问题的最关键点。观察事物要能找到那个点，写文章要能说出那个点。福楼拜说：“写一个动作，就要找到唯一的动词，写一件物体，要找到唯一的名词。”中国古代叫“推敲”。这是在语言层面求准确，而进一步求思想层次的准确，就是要找到那个问题的唯一的关节点，也就是极点、拐点。这样的文章才有个性，才有深度，才是一把开启人思想的钥匙，是一座照路的灯塔。

古今文章无不在追求两个极点，一是形式美的极点：字、词、音韵、格律、结构，如“落霞与孤鹜齐飞”之类；二是思想的极点，一言成名彪炳千古。我们还可举出一些著名的例子。如毛泽东在1930年革命低潮时讲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还有林则徐那封关于禁烟的著名奏折：“鸦片不禁几十年后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若鸦片一日不禁，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还有当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头角，遭人构陷，险掉脑袋。大臣潘祖荫等上书也有一句极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救了一个历史功臣。这一句话也成了名言。凡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极言都成了思想的里程碑。可惜我们现在报章上的套话太多，有思想光芒的极言难得一见。这是学风文风不振的表现，极言之，将是民族思想的萎缩，令人担忧。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文章。

邓小平认错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进步，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时，不能不追溯到三十年前的一个思想细节。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

人孰能无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事后认错。普通人认错难，有光环笼罩和鲜花托举的伟人、名人认错就更难。但也正是这一点考验出一个人的品格与能力。纵观历史，名人，喜功、贪功的多，自责、担责的少。像邓

小平这样，大功不自喜，大德不掩错，是真伟人。平时，我们看一个人的成功，总是说他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其实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是他承认了什么，改正了什么？当一个人承认并改正了前一个错误时，就为他的下一个创造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而当一个伟人这样做时，他就为国家民族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伤害了革命同志，毛泽东亲自到会道歉，脱帽鞠躬。1958 年犯了大跃进错误，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错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当然，这次认错不彻底也为以后的“文革”留下祸根。“文革”之后，小平主政，总结历史教训，他没有委错于人，而是代毛泽东认错，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后来他又多次讲到，不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是这种谦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证了大转折时期的平稳过渡。一个领袖的英明，包括他的智慧、魄力，也包括他的谦虚、诚实。一个民族的幸福不只是有领袖带领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更是带领他们绕开了什么灾难。领袖一念，国家十年，伟人多一点谦虚，国家就少一次失误，多一次复兴的机会。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当我们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喜悦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李瑞环的文风

——在李瑞环新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的时候，瑞环同志分管宣传工作，当面听过他的讲话，印象很深。现在读这本新书觉得很亲切。后来我在《人民日报》值夜班，为了画版面，定占位，编辑们就给领导人分别定了头衔：正国级、副国级。在中组部干部管理系统大概没有这些词儿，后来慢慢流传开了。瑞环同志属于正国级的干部，因为他当过政协主席。正、副国级的干部就是国家的领袖了。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头脑里，领袖就是毛、刘、周、朱，很高大又很遥远。以后正、副国级的领袖越来越多了，现在人大、政协正副主席、委员长动不动就几十个，有的既无大功亦无大名，大家记不住了。对这些领导人（领袖）老百姓怎么看，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当然最大的希望是他们能带领国家走向富强，这是最基本的。这就说得深了，通俗一点，就是两条。第一就是干事。当然在其位总要谋其政，但是希望能主动干一点有个性的、创造性的事。我们第一代领导人有个性的创造很多。领袖就是带头，就是创造。第二个是说点新话，领袖首先是思想领导、思想创新。无论在言在实，都要领风气之先，不能领风气之旧。可惜在这两点上，前几年老百姓都不太满意。高官越来越多，套话越来越多，有个性的创造越来越少。毛、周已不能再，像瑞环同志这样的干部也不多了。

今天在座的有不少瑞环同志的老部下，白头公务员，谈笑说瑞环。虽是旧事，差可为鉴。在我的印象当中，瑞环同志是干了几项有个性的工作的。他在天津引滦入津，解决了一个大的民生问题。主持宣传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求实、宽松。后来在政协这个务虚的部门，却干了很多实事。比如他在西北帮助老百姓改水，我到西北出差，很多人都念他的好，也由此念共产党的好。这本来是他可以不干的事。官不修衙，他主持政协的时候，却把政协礼堂重新修了一下，工、艺俱佳。上个月我到那儿去开会，不由得要拍拍栏杆。他爱说实话，这在社会上早有流传。有一次他到外地视察，别人说现在不好讲话，他说有什么不好讲，有什么说什么就好讲了。他一直是这么做的。

十八大以后新八条里有几条特别涉及文风，呼唤新风归来。文风问题实际上是党性问题、人心问题。这里有两点要特别说一下。在党、在官（我们的官大部分也在党）的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合党性，真为公为民；在普通干部，要问一问是不是合良心、真心。要敢说，有什么，说什么（当然还要有合适的环境）。

第一点，居庙堂之上者，在高位，担大责，只要讲党性，出以公心，心里就有底气。有底气，就用不着拉大旗，不必说空话。不用每次讲话甚至发个通知，也要讲在什么什么指导下，以什么为宗旨，一大串地穿靴戴帽。就是毛泽东说的“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所有的讲话、电报、文稿，包括很长的著作和大会报告，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开门见山。那一年我去广西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文物柜子里有当年起义后小平给中央的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第几军情况如何。我很激动，没见过重要文件这样开头。小平南方谈话时说，你看我们三中全会决

议里面有一句马克思的话吗？没有。但是句句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一代领导人就是这样，一心为党，为事业，心里有底气，用不着拉大旗，文风自然正。

第二点，作为普通干部、公务员要有骨气，对得起自己。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用不着讨好、媚上、跟风。这是人心问题、人格独立问题，这是五四反封建就要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要解决的问题，现又封建回潮。习近平同志批评现在的文风“长、空、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文风四谈》中又加了一个字：“媚”。心有媚则风不正，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墙头芦苇”。伟人的口，如来的手，总之没有逃出毛泽东的预言。官无底气，心则虚，文就空；人无骨气，性则媚，文必假，要希望社会有好文风，难矣！我们从瑞环同志所出版的三大本书里面能看出他的文风。他为官是想干事，读马列，读哲学，心里有底气，有什么说什么，不但不去跟风，还有创造、敢带头、倡新风，这才是领袖之风，宋玉《风赋》里讲的大王之风。

瑞环同志这本书没出版前，社会上已流行他的很多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当面听他说：“我是一个木匠，木匠是玩斧子的，斧子不听话我要你干吗？”这是讲宣传工作，讲舆论工具。类似这样的话，这本书里还有好多。他说报纸就是一面镜子，有人对报纸批评有意见，但你不能砸镜子啊！他说搞城建，盖房子，肯定是大部分人不懂。不懂的人说好，懂的人说出好在哪儿，这叫真好。不懂的人说不好，懂的人说好，摇头晃脑，很神秘，不叫真好。这段话很精彩，现在人们嘲笑的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楼就是这样，让他说中了。这些话都已整理成书，读者可以仔细去读了。我又想起前年人民出版社还出了一本

《朱镕基讲话实录》，也很受欢迎。假风盛行，忽有真话，让人兴奋，尤其是在高层。

过去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现在自己也写书，和出版社也熟。出书，特别是领导干部出书，有三种情况：一是书出了没人看，直接化纸浆；二是书出了，人们抢着买；三是书还未正式出，人们就禁不住传看、传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者是检验图书的唯一标准。出版不比新闻，图书不是报纸，不是易碎品。我们搞出版工作的，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百年计或者以千年计来看问题，抓一些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书。

2013 年 4 月 16 日

朱镕基不修传

《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了，里面一则资料很有趣。有人要为他写传，他就给人家写信说："我必须明确表态，千万不要这么做。国事艰难，舆论纷杂，飞短流长，诚惶诚恐。如再授人以柄，树碑立传，罪不可逭。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

借权出书立传在各级官员中已成趋势。方式有两种：一是自己写回忆录、日记，亲自立传；二是动用权力、财力，组织他人为自己立传——或二者并举。于是书市就多了一些垃圾，历史就多了一些包袱，同时也多了一点幽默——留下了一些笑话。

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人。传者，传(chuán)也，能传给后人一点东西才有价值。既然是为后人而立，那就让后人去做，从来都应是政声人去后。你看，凡史上有价值的传记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由后人从容道来。但急于立传者不这么看，理由是"趁我在世好核实材料"。说是核实却常是隐恶扬善，添枝加叶，自为粉饰。还有一个潜台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着在任，何不享受一下吹捧的泡沫？说到底是私心加虚荣。过去帝王和权贵常在生前大修陵墓，为的是死后再延享生前的荣华尊贵。生前立传有如活人修墓，也是此意。但这实在靠不住。陶渊明有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比今人还懂得

唯物辩证法。连亲人也只有短时余悲，外人能念你几时？如果你没有干成一点大事，有何理由让人记住？如果你干了大事，历史又怎能忘记？再说既为官就是以身许国，还要这点虚名干什么？你看第一代领导人，毛、刘、周、朱等，没有一个人生前修传，周恩来连骨灰都不留。方志敏为敌所俘，敌兵搜遍全身并无分文。他当然也没有想到此生要为自己留一本传记。开国将帅，许多人身上都留下了累累弹痕，但谁也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本传记。再往上推，文天祥被俘九死一生，在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他没有想到去写自传；司马迁是中国传记文学的鼻祖，写了许多至今还熠熠生光的人物列传，却没有为自己写一个小传。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懂得这一点，在位时不给自己修传，而是听由后人根据他的行迹来评说。传者，写人不写己，传世不娱时。

朱镕基不让人为自己修传的理由有二：一是“国事艰难”，顾不上干这种事。一个高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心忧天下，无心抹脂粉。二是干这种傻事必将“授人以柄”，传为笑话。他说，我脾气不好，就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座右铭。朱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性格直率，容易冲动，在任上骂人无数。朱说：“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其实，不贪让人刚强，更让人冷静。朱镕基在修传这件事情上就不肯上当。他说：“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你看，又求人家，又感激人家不要给他写传。真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只缘心中无私欲。其实老百姓对公务人员的要求就是少点私心，多点真话，这是底线、最低要求。但不少官员硬是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反而私随权增，利令智昏，授人笑柄。

《北京日报》2011 年 9 月 29 日

普京独行在空旷的大街上

网上视频播出，普京参加完自己柔道启蒙教练的葬礼后，拒绝记者、警卫的跟随，一个人行走在圣彼得堡空旷的大街上。

他紧贴着临街的窗户，走在窄窄的有点老旧的人行道上，一会儿又跨过一条马路，跃上对面的人行道，偶有行人看他一眼，也各行其道。

以我们的习惯思维，这首先有安全问题，其次还有老百姓的围观。我老觉得那临街的窗户里会随时伸出一把手枪，或者路边会有人下跪上访，给一个难堪。但是没有，普京只是自顾自地走着，别的行人也没有大惊小怪。官不觉官，民自为民，这是一种多么平静的政治生态。微风吹起普京西服的下摆，他扬起头，甩着一副摔跤手的臂膀，目光向前。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想安静一会儿，还是想看看这片他治下的土地？他难道就不怕安全不保，不怕有人来纠缠？但从画面看，他一身胆气，淡定自然。这不只是因为他柔道出身，有一身好武艺，还因为他别有一种政治上的自信。

这场面又令我联想起几个镜头。毛泽东当年也常这样一个人走在延安的大街上，不时和迎面而来的农民打招呼。这有斯诺的《西行漫记》为证，也曾有一张他双手叉腰与人说话的照片。周恩来喜好话剧，20世纪50年代他常去看“人艺”的戏，夜戏散后就和回家的演员一起，同行在北京后半夜空旷的大街上，热烈地讨论着剧情和演技。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下班后就到超市买菜，还排队交钱。法国总统希拉克是个

大个子，也爱一人漫步巴黎街头。一天他发现一个小孩紧随其后，便回身问："是要签名吗？"孩子说："不，不需要签名。天热，我走在你的影子里凉快些。"童言无忌，他大惭，人民不看重他的虚名，而是要他给民以实惠。当晚，他写了一篇《我愿给你们带来阴凉》的讲稿，后来引入他的施政纲领。

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政治家或者我们的干部，与群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自己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常态心理？中国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后，深刻地懂得了一个真理：领袖是人不是神。不但一般人从政治现实中深切地明白了这一点，党也将此作为一种政治经验总结成文件。1980年7月30日中央通过少宣传个人的五条规定，同年10月20日又通过决定，二三十年内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像，防止个人迷信。可惜，中央带头了，基层却很"牛"。有些人经常表现为无事忙，有事慌；对下欺，对上瞒；对内硬，对外软；无事拿架子，有事扶不起。我出差就不止一次地遇到"清街""闭景区"等。共产党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服务员去服务的时候怎么能让被服务者回避呢？当然更不能敲锣打鼓，像刘邦还乡那样。正常地生活在人民群众中，这不仅仅是对共产党政治家的要求，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甚至封建政治家也能做得到。但现在我们却还是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说起，时时提醒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害怕群众，不要画地为牢，不要"作秀"，也不要哗众取宠。要学会先自自然然地做人，再兢兢业业地做事。

但政治家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要有特殊的机敏和坚定的信念，虽不"作秀"，却必须做事。几乎与这个独步街头的画面同时，电视台还有一个画面是普京怒斥日本记者的挑衅。日本首相安倍与普京会

谈后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应是一个严肃的场合，安倍在喋喋不休地讲话，普京在一旁无聊地玩着手中的一支笔。我立即想起奥巴马对普京的印象：“他很随便，就像一个坐在后排的懒散的学生。”但是，当一个日本记者问普京：“为什么俄在‘北方四岛’继续修建地热发电站？这是日本绝不接受的举动。俄什么时候能停止推行这一十分令人气愤的政策”，普京，这个打盹的老虎，立即犀利地回答：“我发现您是在认真地读写在小纸条上的问题。我想请您向指示您提问的人转达以下内容：这些领土问题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这是一百年前就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您想捣乱，继续直接提出强硬的问题，那您也一定会直接得到强硬的答案。”这是打狗给主人看，在一旁的安倍如坐针毡，但也无可奈何。普京是无事散，有事强；对内柔，对外刚。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毛泽东在中国还不得不依赖苏联的情况下在谈判桌上痛斥赫鲁晓夫：“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都拿去？”还有，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对为香港问题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绝不能谈判。”震得“铁娘子”出门就跌了一跤。还有陈毅那段有名的外交逸事。有外国记者问及陈毅“中国是否好战”，陈毅拍着桌子怒道：“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

我曾有诗言：“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政治人物算得上是有作为的大丈夫了，切不要自宠、自伤。他要独对的是各种复杂的问题，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是一片空旷的未来。为了对得起这个职位、这个局面，他首先内心得自然坦诚，宁静致远。古人言“居官无官官之事”，就是说不要走路坐卧总把自己当个官。

无论是毛泽东在延安的街头，周恩来同演员谈戏，还是希拉克与儿童对话，普京逛街，默克尔买菜，他们都有一个坦诚的“我”，不是总拿自己当个官。然而，他们又随时不忘自己的责任，该变脸时就变脸，敢变脸。无论是普京怒骂记者还是邓小平斥“铁娘子”，都是为国家利益而担当，这时又没有了自我，只有官身、官责。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评价自己时说的“一半猴气、一半虎气”。能公能私，能我能国，或猴或虎，是为真男子。普京脚下踩着一片坚实的土地，行走在一条空旷的大街上，任我行，不“作秀”，不回头。

《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

什么是政治

一

政治是被人误解最多的一个概念，也是定义最不确定的一个词。它常被人误会为权术、争斗或干脆曰：说不清。

词典解释："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这有点就事说事，没有讲出事情的本质。政治学的解释，政治是民众将自己的权力出让出来，委托给公共机构及其人员代为行使。这倒是说出了本质，但有点绕口，很学术。政治家又各有自己的说法。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长期当记者，深入百姓，出入官场，后来又从事管理，身为官员，经历了老百姓怎样看政治，官场怎样看政治。我想给政治下这样一个定义：政治是一定的个人或集团，借用公民所委托的权力来为社会和民众办大事。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是"办大事"，不是做小事，不要作秀，不要庸俗化；二是"公民委托的权力"，你手中的权姓公不姓私，政治家干的事是公事，不是私事；三是"个人或集团"，就是说再大的事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机构或人来干，可能干好，也可能干坏，因此必须有监督和制约。以上这些再简化一点可概括为"一大二公三

集团”。用这三点去判断和分析政治，如用数学公式解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或更方便些，下面分别说之。

二

凡政治之事都是大事。这个“大”有三层意思：一是它和多数人的利益相关，为多数人所关心；二是这事情的覆盖面大，影响全局，可能是一地、一省也可能涉及全国、全球；三是作用时间长，影响到历史的进程，成为历史的坐标、里程碑。凡大的战事、灾害及一切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事件、决策、成就等，都是政治。如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香港回归，还有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等等。反之那些八卦新闻、明星隐私、家长里短、游山玩水之类的琐事都不是政治。社会五花八门，政治之外当然还有其他门类，如经济、军事、教育、卫生等等。不是说这些事不重要，是说一般情况下它们都在自己的范围内动作，当它们越出自己的范围而影响到更多数人的利益、覆盖全局、影响历史进程时，它也就不能自已，再扩大、深化而演变成了政治。如2003年中国的“非典型肺炎”，由公共卫生事件上升为政治事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由体育盛事上升为政治大事。军事上的许多大战役都是政治，因为它已经影响全局。

一部世界史、中国史就是世界和中国以往的大事记。而文学只要是有影响力的，又经常是以政治为题材。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现代许多二战题材的小说、影视，还有从贾谊的《过秦论》直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的散文，都是在说政治。

三

凡政治之事都是公事，是公开进行的为公众的事。解放初老百姓常把政府工作人员称为“公家的人”，现在则称为“公务员”，又有一个新词叫“公共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对政治最好的诠释，人民是最多数的公众。公与私是政治与非政治的一条分界线，也是底线。政治可以有不同的派别、观点，它分别代表着一定范围和数量的公众。封建社会朕即是国，帝王认为他就代表了所有民众，百姓仰视真龙天子，愚昧，奴性，服从专制，这是封建政治。到资产阶级思想家出现，说不行，不能你一人说了算，不同阶级、派别都可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总之，政治一是为公，去努力代表最多数的民众；二是公开，透明、竞争、监督，好争取到最多的人自觉跟你走。

关于为公和公开这一点，梁漱溟批林彪堪称一例。1971 年，林彪出事，全国批林，梁在政协会上说：“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称得上是路线。林彪不是路线，是阴谋，政变夺权而已。刘少奇有许多公开的主张，彭德怀有给毛主席的公开信，都是为国家、民族，只是政见不同。”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刘、彭还正在被打倒，戴着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呢。而梁自己也不避斧钺，敢于公开说出，他是在讲政治。随着世界政治的进步，这种公开、公平的竞争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专制和阴谋。

四

政治是由人，由组成集团的人来具体实施的，需要监督。从理论上讲，政治是民众把自己的权力出让，委托公共机构去代为行使。但这个机构不是一座办公大楼，不是一个会议室，而是由人组成的管理集团，是一群人，包括这群人的领袖。他们的活动是政治活动，他们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不是神，不是机器人，是活着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私有利的人。这就生出两个问题：一、人孰能无错，他们在办事过程中，因知识、能力、经验所限，可能会犯错误。二、人孰能无私，他们可能碍于私情，动了私心，为集团或个人之利办一些损公利己的事。这样就会有工作的失误或吏治腐败，有贪有诈，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政府都不可避免的，是政治运作中一个永远的难题。于是就需要监督。权力与监督如人之双腿，鸟之两翼，失去一方就不平衡。要做到政治清明，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当政者自制力极强，觉悟极高，修养极好，不用监督；要么有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过去，中国的老百姓总是盼望能出一个好皇帝，幻想中的尧舜。领袖人物中也会有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但这只是个别的、短暂的现象，从来没有什么自觉的政治，只有监督下保持平衡的政治。监督的办法包括权力机构的相互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如果监督无效，当权者就失误、腐败，矛盾就激化，最后就要更换管理集团，更换领袖。千百年来就这样演绎着权力更迭、改朝换代的故事。

五

怎样依据这个道理去实践政治。对政治家、公务员的最低要求是守住四条底线：

一、要干事，干一点大事。本来老百姓给你权力是要你办实事，办大事的。你看他们是怎样评价政治家的："毛主席让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些政治人物都曾在自己掌权时办过大事。一般来说，给你千里之地，百万之众，两年之内应有政绩。"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谪贬之臣都能出政绩，何况我们多是提拔的新秀呢？可惜现在平庸的官太多，升也平平，去也无名。官升人去后，去后悄无声。

二、为公不要营私，更不要贪污腐败。一朝为政，就要准备奉献、牺牲。周恩来所谓"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范仲淹所说的"先忧后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都是讲的为公为民这个理。政治本来就是借民之权，为民服务，姓公不姓私。按孙中山的说法是"管理众人之事"，不是"苟营私人之事"。不要让你保管一下玉玺，就以为自己是皇帝；给你一张任命书，就以为是尚方剑、免死牌，胆大包天，滥用其权，谋私舞弊。

三、光明正大，公开透明。虽然政治斗争离不开策略、方法、保密等，但玩阴谋却要不得。因为政治说到底是看你能代表多少人，如毛泽东所说，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而搞阴谋终会失人心，虽胜一时，终输历史。

四、勤政敬业，勤学多思，尽量少犯错误。政治家以个人之身担天下之事，其压力可想而知，这就更要如履薄冰，虚怀若谷。以毛泽东

这样的伟人，稍一不慎都会犯“文革”这样的大错，况我们这些普通公务员呢？

对一般人来说，也不要鄙视政治，不要存偏见。不要与己无关，高高挂起，不要以远离政治为清高，不要把政治家都看成阴谋家。政治毕竟是大事，是大家的事、国家民族的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我们的生活好坏，确实也脱离不了时局，脱离不了政治。无论是从前老百姓盼望能有一个好皇帝，还是现在人人议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包括议论物价、治安、环境等，这说明人们心里还是有政治，从来也没有忘记政治。

2010年11月13日

怎样让政治与我们更亲近

——《走近政治》序

这是一本尽量通俗的、以政治为内容的文集。集内的文章大都曾发表于《人民日报》《求是》《新华文摘》《学习时报》《理论前沿》等报刊。有的篇章还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或被选入全国中学教材。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政治总是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确曾经历过一段“突出政治”的“左”的时期，使人们的心理产了一些逆反。但如果因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淡化政治也是不对的。如何让人能理解和接受政治，并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化为思想力量，化为行动，这不仅是政治思想工作的课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艺术课题。

政治是某一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关乎全社会的大事，它的共性较强，对每个人来说，有时关系紧密，甚至命运攸关；而有时并不直接，难免会有一点距离感，甚至觉得与己无关。政治是经济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意志的集中表现，要集中就要抽象，它常常要被抽象为理论、政策、方针，对常人来讲这难免会觉得有些枯燥，并常被误解为政治就是条文、口号。

针对以上这两条误解，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讲话，要遵循两个思路。

一是要切实联系实际，包括个人的生活、工作、思想的实际，社会历史的实际及我们工作方面的实际。恩格斯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十六大报告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过去我们的一些政治文章、口号之所以让人觉得空泛，就是没有能紧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没有说到这个方针、理论、思想与群众利益的关联点。只有在结合实际，关联到对象的具体利益时，才能消除大政治与小个人之间的距离感。读者、听者才会感到一个政治理论或一种思想是这样的可亲可信。

二是要讲清道理，说清理论的来龙去脉，将口号还原为根据、事实，甚至是故事。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一个人的行为标准除了利益选择外还有理性选择，人总是遵循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理去行事。为了这个"理"，他甚至可以抛弃眼前的"利"。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第一代革命家中就有许多人是抛弃个人利益，背叛剥削家庭，明社会发展进步之大理而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理可以服人。总之，只要力避空泛，求实际，讲道理，每一个人就都会感到政治于己确实是用得着、离不开的东西。

我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不管是写理论文章、思想评论还是从事政治题材的文学创作，都谨记以上这两条，一般来讲效果还好。另外还要加一个第三条，就是在求讲清利害，以理服人的同时，要尽量追求美感。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因为政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历史之大美大情，感人最深。只要文字运用得当，完全可以给政治插上美的翅膀，政治文章完全可以写成一篇美文。

现应出版社之约，将这方面的文章汇为一集，一方面满足读者的要

求，另一方面也是想与思想宣传战线的同行切磋，探讨一下政治题材方面行文说话的方法。是为序。

2002 年 10 月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近翻四十年前的日记，有一段政治趣闻。1971 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这个“接班人”“副统帅”，一夜之间成了叛徒、奸雄、大阴谋家，全国掀起“批林”高潮。当时我在内蒙古巴盟当记者，上面传达的文件里有一句话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生产队开批判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前几天我与一位宣传工作老前辈、中宣部的老部长吃饭，席间说起这个笑话，他很认真地说：“现在仍然是这样呀！到基层去，农民老问，你们那‘三个代表’还没选出来啊？”

前后相距近四十年的两则政治笑话，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老百姓怎么看政治？”四十年了，我们的政治口号、中心任务已不知几变，而不变的是老百姓看政治的目光。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就是说，我们提政治口号并宣传解释时一定要能和普通百姓的具体利益相结合。

什么是政治？政治学的解释是：政治是人民群众将自己的权力出让出来，委托给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来执行。这个机构可以是执政党，也可以是政府。这里有几点本质之处常被掩盖忽略：第一，这权力属于人民，执行机构不过是代行；第二，代行之时要能提炼、概括人民的具体要求，使之上升为一项方针政策，凝结为一个口号；第三，这口

号必须为群众所理解，与其利益紧密关联。这三者哪一个环节缺失或欠完美，都将影响政治运作的效果。至少宣传工作者要懂得这个政治规律和宣传艺术。

其实这规律和艺术也很简单，就是能不能从老百姓的目光来看政治，能不能把一个政党、政府的大政方针翻译成群众语言，能不能把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的本质和群众关心的具体利益相联系。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反正，你的政治目标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联系。联系得好就成功，联系得不好就失败。这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李自成起义，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一下就说到赋税重压下的农民的心里，从者如云。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口号是“保卫胜利果实”，分得土地的农民就踊跃参军。而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将国际义务、爱国精神和“保家”的具体利益都概括进来。这对新中国刚成立正在建设幸福家园的群众来说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堪称政治动员口号中的精品。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大包干的概括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对推动农村改革也极具号召力。其实，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新政策出台时，都有一些好的动员口号，如环保方面的口号“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教育方面的口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都很有号召力。一般来讲，越接近基层，宣传就越能联系实际。一次我到甘肃采访，车在无人的田野上行驶，路边埋着光缆。一条红色立地标语映入眼帘：“光缆无铜，偷盗判刑。”它讲得再明白不过，光缆里面没有铜，你偷了也无处可卖，还要判刑，何苦呢？八个字，把最要害的利益说得清清楚楚，还宣传了科普知识。这虽是一条标语，

却比站一个警察还有效果。

政治是什么？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让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觉去行动，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也是管理的艺术。

《人民日报》2010年9月10日

政治人物不应称爷爷

政治就是“一大二公”，是国家大事、公家的事。讲政治就是要分清大小，分清公私。大事不能乱，公私不能掺。报纸宣传犹要注意。一些细节，虽一时无大碍，但潜移默化，事关规矩。社会运转自有一套大规矩、大程序，是公共程序。在这套程序中，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各有定位，各尽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政治生活。政治是严肃的，唯其严肃，才有效率。政治生活之外，还有人情、人伦的私生活，但两者不能混淆。北宋名臣富弼出使辽国，一走数月。有人捎家书来，他不拆，直接放灯上烧掉，曰：徒乱人心。当此时也，他如无家、无妻儿，只有使臣身份。我们一些报纸，一些记者，常用孩儿语、私家情去写严肃的政治，弄得不伦不类。如报纸上报道孩子们对国家领导人的称呼常用“爷爷”。到过六一儿童节，整版通栏大标题“喊”爷爷。个别稿子，可以动笔改一改。但对这种风气，便只有认真向有关部门反映，提请研究改正。下面这封信是我当时写给中央有关部门的一封信，并得到重视，通知各媒体注意改正。

附：给中央领导的信

某某同志：

您好！

最近的“六一”报道中，许多报纸提到孩子们对国家领导人称呼时都用“胡爷爷”、“温爷爷”等，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我觉不妥。一方面欠严肃，另外，也涉及未成年人教育的一个问题。从晚辈尊老的角度讲称爷爷当然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国家意识、领袖意识和社会观念。一个看似简单的称谓，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是不是在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和宪法、法律的启蒙教育，是个政治问题。孩子一懂事，除了让他们懂得家庭、亲情、尊老爱幼外，还要逐渐让他们懂得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上和国家中，这样才会有责任感和纪律性，进而有爱国心。像“主席”“总理”这样的职务是代表国家的，在媒体上的公开宣传报道中还是称职务好，比较严肃。上世纪幼儿园、小学里教育孩子也是称“毛主席”，而不是称“毛爷爷”。我们提倡党内称同志，但在报纸上对国家领导人还是称职务好。

不知妥否，仅供参考。

2004 年 6 月 5 日

用文学来翻译政治

时值建党90周年，散文集《红色经典》再版，编辑约谈一点创作体会。

我一直认为文章写作主要有两个目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文章最后作用于读者的或是思想的启发，或是美的享受，可以此多彼少，当然两者俱佳更好。文章的题材可以是多样的，有的便于表现美感，如山水；有的便于表达思想，如政治。但政治天生枯燥、抽象，离普通人太远。其中虽含有许多大事、大情、大理，却不与人“亲和”，难免敬而远之。怎样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让人愉快地接受，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想，强化其美感。文学是艺术，如同绘画、音乐一样，专门给人美的享受，但它又不像绘画、音乐那样是纯形式艺术，它有内容，有灵魂，内容美加形式美有更强的震撼力。

写政治题材的文章，不怕缺思想，因为那些经典的思想早已存在，它比作家自己苦想出来的不知要高出多少。怕的是翻译不好，转换不出文学的美感。而一般读者首先是为了审美而阅读，如果只是为了思想，宁可去看政治或学术读物。这种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主要体会如下。

一、选择适合的典型

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借政治人物、事件的光芒来照亮文学领地，照亮读者的心。文学是典型艺术，红色经典虽然足够宏大，但并不是所

有的政治素材都能入文学，它还要符合文学的典型性。选材时我力求找到每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点。如写毛泽东就选他延安时期最实事求是的那一段（《这思考的窑洞》），写周恩来就写他最感人的无私的品德（《大无大有周恩来》），写瞿秋白就写他坦诚的人格（《觅渡，觅渡，渡何处？》），还有选取西柏坡等这些能代表历史转折的关节点。而对人物又选其命运中矛盾冲突最尖锐的那一刻，而这多是悲剧的一瞬，却最易看到其生命的价值。如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文革”中在江西被管制劳动的邓小平。历史又从来是现实的镜子，典型性就是针对性，这些已往的红色经典移入文学作品要能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已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二是针对现在的问题仍有批判、指导、启发作用；三是为读者心中所想所思，有受众。我严格遵守这三个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作品一发表就反响较大，以后又被连连转载和再版的原因。

二、还神为人

政治是治国管人的学问，高高在上；文学是人学，有血有肉。文学所说的“人学”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曾经高高在上的“管人者”一下成了作家笔下解剖的对象，这好像很难接受。而我们过去又曾有过一段造神运动，把最高管理者，即领袖人物神化，作家不敢写，读者不爱看。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政治人物就要还神为人，要写出他们的情感、人格。一旦突破这一点，转过这个弯子，政治就贴近了读者。怎么转？一是淡化其政治身份，集中剖析他的人格；二是摆脱旧有形象，聚焦其真实的情感。写人格，如瞿秋白：

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向上推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写情感，如小平落难时为受株连而身残的儿子洗澡：

多么壮实的儿子啊，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了。他替他翻身，背他到外面去晒太阳。他将澡盆里倒满热水，为儿子一把一把地搓澡。热气和着泪水一起模糊了老父的双眼，水滴顺着颤抖的手指轻轻滑落，父爱在指间轻轻地流淌，隐痛却在他的心间阵阵发作。这时他抚着的不只是儿子摔坏的脊梁，他摸到了国家民族的伤口，他心痛欲绝，老泪纵横。

写周总理在毛泽东批评后被迫写检查：

从成都回京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枯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总理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

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

政治人物原来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

三、“顺瓜摸藤”，还原形象

政治讲究结论，文学注重形象。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还原结论之前的过程，你要告诉读者这“瓜”是怎么结出来的，描绘出它的藤和叶，这就是形象。是讲政治内容，但必须有文学形象。比如写毛泽东转战陕北：

胡宗南进犯，他搬出了曾工作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电报，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俘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一面指导战争，签发电报，一面还要从事理论研究，写文章。这种双重身份是用这样一个形象来表达的：

他只能将自己分身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写文章。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古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飞箭，再准备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脚去踢，用嘴去咬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层、更早一步的人。

这些形象读者印象深刻，读后还常常说起，它早已不是那个天安门上挥巨手的形象了。

四、含蓄表达，留出想象的空间

政治要明确，文学却要含蓄。政治是方针政策、法律，甚至可以是口号，但文学不行，它是艺术。相对来说小说还可以直白一点，大篇幅地铺排，散文不行。散文精短，要求含蓄，诗歌更短，就更要含蓄。这时反而要把明白了的政治理念翻译成含蓄的文学意境，本来可以一步到达偏要曲径通幽。人的思维就这么怪，朦胧和距离产生美感这是美学规律。在散文创作就是要找到“意象”。意象是最能体现文章立意的形象，是一种象征，是诗化了的典型，是文章意境的定格。作家动笔之前，诗人先找韵脚，小说家先找故事，散文家先找意象。

散文名作中常有意象的运用，如朱自清的《背影》。政治题材天生宏大，找意象不易，可是一旦找见就顿生奇效。比如，用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来写瞿寻觅人生渡口而终不得的悲剧（《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一条小船来写共产党八十年的历程（《一个大党和

一条小船》）；用红毛线、蓝毛线来写西柏坡时期党的战略转移（《红毛线，蓝毛线》）等。文章发表后像“觅渡桥”“红毛线、蓝毛线”等，已经成了纪念馆新的重要内容，而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参观者在举头敬仰之时，心中又多了许多美好的联想。意象在文章中的使用一是天然性，可遇不可求；二是要有“象”，即具体的形象；三是要有“意”，即有象征性；四是要“意”大“象”小；五是“意”“象”之间要有较大反差，以收奇险之美；六是唯一性，既要空前，也要绝后，收个性之美。这是散文与其他文学形式的不同之处，也是政治散文最难写之处。

五、善用修辞

政治严肃，用消极修辞，以内容的准确表达为度；文学浪漫，用积极修辞，不仅准确，更求生动。生动的文学碰上严肃的政治，全靠语言的转换。不但修辞方面的十八般武艺都要用上，古典、口语、诗句、长短句等各种风格都要灵活运用，以尽显语言的形式美。有时吸收口语所长，句式或整或散。如：

> 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
>
> 《红毛线，蓝毛线》

有时或整齐严谨，暗用旧典，求古朴深沉的韵味。如：

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李清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大无大有周恩来》

对重大理论思想也可用幽默来表达：

可是我们急于对号入座，急于过渡，硬要马克思给我们说下个长短，强捉住幽灵要现形。现在回想我们的心急和天真实在让人脸红，这就像一个刚会走路说话的毛孩子嚷嚷着说："我要成家娶媳妇。"马克思老人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先得吃饭，先得长大。"

《特利尔的幽灵》

《人民日报》2011 年 6 月 14 日

干部何必展示才艺

现在干部的文化基础水涨船高，大学本科已是起码的门槛，硕研、博研比比皆是。不像解放初的工农干部，胼手胝足，只会闷头工作。于是除工作之外便有了“才艺展示”。

胡长清人人皆知，是新时期第一个因贪污而处死刑的省部级高官。他选的才艺是书法。据说他在监狱里还对牢头说：“你善待我，我出去后给你写幅字。”可惜笔未落纸，头已落地。还有一位地方官，治民无方，治地发生群体事件，他处理不下，化装逃出。但他却会弹钢琴，他常会客的宾馆里放着一架专用琴，每当酒酣之时部下就会巧妙地暗示：我们领导还会弹琴呢。客人就赶快知趣地说，真的吗？愿闻其妙。于是，他就半推半就，走上琴台，才艺展示一番。

多才多艺没有错，关键是分清主次，才当其用。大凡一个稍有文化、中等智力的人，身上总会有数种甚至十数种以上的才，这不足为奇。据说人身上的二十三对染色体，只有一对管起码的体力智力，其余二十二对管不同的才，人人有才，人皆多才。君不见随便一个民间二人转演员，从要手绢到吹唢呐，都能在台上玩他一个眼花缭乱。但他真要成名却不容易，一是要有一个专门的才，二是这才还得是别人没有的绝才。这就难了，这里有个角色分工问题，也有人生态度问题。如果唱旦角的不攻旦功，而旁骛丑功，则“旦不成而丑不就”，为老实人、聪明人所不为。政治舞台与演艺舞台其理同一。

干部的主要角色是什么？是理政。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毛泽东说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你要有行政能力。心忧天下，心系百姓，把握大势，拆难解困，卒然临之而不惊，捧之宠之而不喜。老老实实把该管的事管好，勤勤恳恳为百姓谋一点福，如果还能有一点创造，比如有一点新政，那就更好。正如朱镕基答记者问所说，希望是个清官，干一点实事。我们常爱在官员前加“父母”二字，称父母官，暂不说其是否准确，但这却有强调责任的一面。父母者，首先解决子女的衣食等事。如果一个父母每天拿不回粮米，进门就只会给孩子唱歌，子女也实在乐不起来，要这等父母何用？其实无论是百姓还是上级，直到中央，对干部并没有什么过多要求。干部考核表上也没有“才艺展示”这一项。但是为什么有些干部喜欢频频展示其才艺呢？原来花拳腿脚比真功夫既好看又省力。

才艺对政治家有没有用？有用，但那是锦上添花。有一点，更见其彩，没有也不影响为官做人。毛泽东诗词写得好，中国人为有这样的领袖自豪；邓小平不写诗，仍不失为伟人，人们照样尊敬他。政坛上的人物的才气可分为四种：一是有政治之才又兼有艺术之才；二是只有政治之才；三是只有艺术之才，投错了胎，误入政途，如宋徽宗、李后主；四是既无政治之才又无艺术之才，阴差阳错，戴上了官帽。不管哪一类，既入政坛，就要一心务政。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无不多才，周恩来年轻时就演话剧，张闻天写小说，海军司令萧劲光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但从没有听说他们“露一手”。

官者管也，管好老百姓的事，同时也管好自己。有才艺可以，但不必频频展示，不要本末倒置，否则适得其反。宋徽宗好字画，李后主好诗词，明朝还有一个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这些业余才艺反倒促使

他们更快地人亡政息。共产党员早期重要干部顾顺章会两下魔术，执行秘密任务途中，过汉口码头禁不住上台露了一手，结果暴露身份，被捕叛变。凡热心于小技小艺者，其心必浮，难有大成，亦难托大任。足为之戒。

《人民网》2009 年 11 月 2 日

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

报载某地开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却是一首五言顺口溜长诗，凡六千字，一韵到底。这到底是工作创新还是亵渎职守？媒体议论纷纷。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与内容本是对立统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们常记住了“统一”，忘了“对立”。原来形式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比如诗歌这个形式，就有句式、节奏、音韵的美，这是形式的资本，所以它总时时想逃离内容，闹独立。就像一个美女，不想与穷汉厮守，总想换一个有钱人过日子，她有这个本钱。这就是为什么年年反形式主义，却总是反不掉，就如年年扫黄，总是扫不尽，本性使然，规律所在。

形式爱表现，但它自己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干实事的，虽也会用到形式，但内容第一。如经商、从政、军事等等。另一类是玩形式的，专门开发形式的审美价值，如音乐、美术、语言等艺术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术有专攻，本无可厚非，最怕的是乱了阵营。你是要干事还是要从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后主，本是当皇帝的，但坐在龙椅上不办公，一个爱画画，一个爱写词，虽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国之君，当了俘虏。还有那个爱作曲、会编舞的唐明皇，也招来了天下大乱，自毁江山。我们有些干部总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想要两头沾，既当有才的宋徽宗

又当有为的唐太宗，既要政界的光环，又要艺人的光彩。无数事实证明，于公，这是亡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症。只有放弃一头，才能保住一头。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有大才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孰轻孰重，毅然割爱才艺，献身革命。陈毅参加革命前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曾与徐志摩论诗；张闻天是第一个发表长文把诗人歌德介绍到中国的人；周恩来的话剧才能更是尽人皆知。但他们都不敢“以才害政”，也从不借政坛炫艺。

再说形式与内容相搭档也是有一定之规的，就像穿衣服要讲场合。或可称之为“形式伦理”。如果是纯玩形式，有艺术界的行规；但要做事，特别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规矩：以事为主，选取适当形式。什么叫“适当”？突出内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点式”是健美比赛的形式，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装，是演古装戏的形式，为突出古典氛围。人大工作报告重在时政阐述，要严肃、鲜明、直白、缜密，用长于浪漫、抒情、吟唱、夸张的诗歌形式去表现，就像参加晚宴时穿着古装或“三点式”，那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就是单从语言表现来说，诗歌有格律管着，也不能尽达政治之意。闻一多说写诗是“戴着镣铐跳舞”，用诗去做工作报告则是镣铐之外又加了一层面具。比如，这篇六千字的报告，一色五言，一韵到底，你就是想“此处有掌声”也会受到一层限制。历史上曾有人以诗写论文，唐代的司空图用四言诗写了一本《二十四诗品》，是学术名著，但也没有超出以诗说诗的范围。现在以诗来写工作报告，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

形式是有逃离内容的本性，其实还是因为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腿，有一个不专心正业的人。奇怪，在其他行业，如商业，就没有人敢用

诗歌来签合同，军界也没有人敢用诗歌来下命令。因为，一是他的权力有限，二是立即就会碰钉子。而政界却能出这种怪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政治的不成熟。

《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26 日

居官无官官之事

魏晋风度崇尚隐逸。东晋时的大官刘惔是晋明帝的女婿，皇亲国戚，身份显赫，但他为政清静，死后人赞之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作秀，不太把做官当回事，而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率真。最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无官官之事”不是让你玩忽职守，掉以轻心，而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去干事。这句话类似“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把握主旨，不一味地抠词掰句。又类似“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说交情淡，而是说交往的形式简单，更见真情。

近来中央召开扶贫工作会议，令我想起一件亲历的扶贫小事，可为“官官之事”作注。那年秋风乍起，我所在的单位赶紧向对口扶贫的某县送去六大卡车棉衣、棉被，正好由我负责带队送达。三个月后，元旦已过，彼县长来京，我问：“棉衣发下去没有？”答曰：“没有，等春节前‘送温暖’时再发。”我大怒：“现在春节还未到，你身上怎么已经穿上棉衣？”可知他们整天就是这样做着些“送温暖”之类的“官官之事”，还又时时端着一颗唯恐人不知的“事事之心”。就像一只老母鸡，下不下蛋无所谓，但只要下一颗蛋必定叫得咯咯响。这哪里还有一点官责和官德？用这样的官去治理地方，只能贫上加贫。还有某地矿难，经几日抢险总算打通了生命通道，危困井下的工人终于可以升井了。但且慢，还有一件“官官之事”不能少，领导还没有

来到井口，明天报上没有他与升井工人现场拥抱的镜头怎么行？工人与自己的亲人拥抱、流泪都不算。于是宁可让他们在井下再忍一会儿。“官官之事”已经演化为官场的“官官之规”。

一个人不做官也罢，他只要做了官，身上就同时有了三层含义。一是为官之责。政治学上讲，老百姓把自己的权力出让给公共机构，委托它来管理社会。所以官员手里的权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谁赐予的，而是老百姓给的，官的本质是为民办事，为人民服务。二是为官之德。它的底线是怎么做人，官做到多大也逃不出人格与人性。可惜，官场的人性扭曲往往比民间严重得多。三是为官之形。任何事物总有个方式，施政之官权在手，其行事的方式自然与普通百姓不同。如讲究成就、荣誉、排场、权威、效果等，即所谓的“官官之事”。明白这三层意思，就知道“坐官”（坐在官的位置上）时最重要的是“为官之责”和“为官之德”，为百姓、国家、民族办事，做一个真正的、实在的人。至于“官官之事”不是一点不要，但毕竟是形式上的次一级的“官元素”。可惜不少官员常忘了“官责”与“官德”，倒把“官官之事”看得比天还重。

这“官官之事”在古代也就是骑马、坐轿、宴请、写奏折之类，现在“与时俱进”了，闹得更大更新。如：求政绩，大搞短期行为；多应酬，巧于上下打点；泡会议，镜头来，版面去；造假势，汇报预演，视察排练；讲排场，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等等。官场成了剧场，官员成了演员，演得很是过瘾。把这些“官官之事”办好了，虽然表面上还是官照“坐”，权照掌，但民心已失。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恐去官之日不远矣！慎之，慎之。

《人民日报》2012年1月13日

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中国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我排了一下有十篇。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政治美文”，就是说既要有思想，还要文字美。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文章提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的思想；二、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词广为流传，成为格言、座右铭，有的已载入辞典，丰富了民族语言；三、文章符合艺术规律，词、句、章，形、情、理都达到了美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就文字“选美”，当然还会选出更多，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等，那是另一个范畴。

下面按这个标准一一分析。

贾谊的《过秦论》，探讨一个政权为什么会灭亡。为政必须施仁政，不能反人民。后来说到农民起义时常用的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即出自本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生命的价值，提出一个做人的人格标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成语“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出自本篇。

诸葛亮的《出师表》，提出忠心耿耿的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神。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亲贤臣，远小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等广为流传。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文学的手法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从中可以看出老庄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西方的政治名著《乌托邦》《太阳城》与其相类似。“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汉，不识晋魏”，已成后人常用的成语。而“桃花源”已经是理想社会和优美风景的代名词。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探讨一个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并且塑造了一个较理想的君臣关系样板。提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提出“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就是1942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谈的政权周期律。后人常说的“居安思危”“水可载舟覆舟”，即出于此。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为政理念。这句名言成了范之后所有进步政治家的信条。范的这篇文章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做到了形美、情美、理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治的典范。

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提出为人要有正气的气节观，鼓舞了历代的民族英雄，成了中国人的做人标准。“天地有正气”成了战胜一切邪恶、腐败势力的旗帜。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反对保守，提倡革新。提出抛弃老朽的中国，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振兴中华。几乎通篇都是美言美句。

林觉民的《与妻书》，呼唤共和，敲响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丧钟。再次响亮地喊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牺牲个人，报效祖国。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宗旨。

这些文章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

好文章是替时代立言，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这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一样，不是随便就能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2012 年 1 月

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兼论“实事求是”的阻力与动力

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难

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建国已六十年，马上又是建党90周年，可以说从1921年建党以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事求是。人们感叹，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么难。

实事求是，说易也易，说难也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客观事物摆在那里，你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它，照实去说、去做、去办事，应该不难。

说它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来自客观方面的。“求是”是探求客观规律，而规律常为现象所掩盖。人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失败、总结，才能得出那么一点真知。这在自然科学最为明显。比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阳光、空气、水。直到1665年，牛顿才发现光是七色的，解释了彩虹现象。直到1777年，才由法国科学家拉瓦锡发现空气中的氧气，可以助燃，可以活命，氧和氢可以组成水。而这之前一百多年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有“燃素”，与空气无关。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你得慢慢地摸索。每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无不如此。

另一方面是来自主观的，人为因素。人不论是进行科学实验还是生

产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都要相互合作。这时候我们发现与人合作原来比与一块石头、一根木棍的合作要难得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一个“主观”的自我。你要说服他实在难。于是就争论，就吵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自建党、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不光是我们，古今中外都这样。争吵，在家里最多是夫妻吵架摔盆打碗，在一个党、一个国家，就是路线、方针之争，一错就是几十年，船大难掉头，改正又是几十年，你说难不难。在红军时期，井冈山根据地要听上海王明党中央的，上海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李德，十万红军都要听他瞎指挥。根据地丢失，死伤无数。彭德怀气得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痛。”用这么惨重的教训，才换来一个遵义会议，一条正确路线。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不犯错，果然后来我们又连连失误。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事后一次又一次地总结教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实事求是。相对来讲，来自客观方面的影响比来自主观方面的影响要少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比革命、建设、治国、处世更易接近实事求是。

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其实“难”是正常的，不难反倒不正常了。就像我们读书难、科研难、打仗难、建设难，世上的事，总是逆水行舟，不顺利的多，顺利的少，不如意者常八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发现与进步的乐趣。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如此复杂、丰富的、永恒的思维话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认识规律。恩格斯把认识世界的学问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实事求是是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哲学，管着自然、社会，当然也管着我们“人”。虽然我们也曾天真地像楚霸王那样，想抓住头发

把自己提起来，但是当我们走过了三十年、六十年的时候，回头一看，还是无法离开实事求是，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们知道了，不可能绕开它，只有认真地去研究它，实践它。

实事求是的十种阻力

“实事求是”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必然会遇到阻力。大概有十个方面：知识、经验、习惯、书本、自满、情感、权威、利益和行政。这十个可以分成两组，前五个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后五个是人为的影响。可以说是：五分天灾，五分人祸。

一、知识阻力——无知无畏更可怕。

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因之一是无知，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缺乏相关的知识。这种人办起事来牛头不对马嘴，离题太远，又浅又浮。有时却表现得很执着，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孜孜以求，蠢得可爱，倔得可气。情况不明胆子大，盲人瞎马跑得急。他连事情的最基本情况都不管不顾，哪能谈得上去求什么内在规律。

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代又一代接力完成的，后人总是在接过前人的知识后，再根据新的实践（实事）探求更新的规律（求是），好比上了二层楼再上第三层。如果没有以往的知识作基础，就像空中硬要起楼阁，无苗硬要收庄稼。许多时候的不实事求是，都是无知造成的。科学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永动机派”，他们想发明一种机器，可以不增加新能源就永远不停地转下去。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一派人真是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虽然

没有一例成功，但还是一茬又一茬，顽固地坚持下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国民党败将黄维，他在监狱里服刑改造，还提出要造永动机，毛泽东说给他材料、钱，让他试，结果当然造不出来。因为这违背一条物理学基本原理——能量守恒。这条规律是1847年29岁的英国科学家焦耳发现的。能量可以互相转换，但不能凭空产生，只要机器转，就得不断补充能源。不可能有什么一次能源的“永动”。秦始皇曾派徐福到海岛上去求长生不老药，这种蠢事以后又有不少帝王干过，只因两个字“无知”。他们不知道关于生命的基本知识。我当记者时采访过这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寨、昔阳被树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一当典型就神化了。当时省水利厅帮县里修一条大坝，地质部门认真钻探后选定坝址，县委某领导人来到现场一看，说不好，搬起一块石头，离开坝址几十步，往地上一放说：“就从这里起线！”技术人员哭笑不得。他没有水利和地质的基本常识，怎么能实事求是参与决策呢？

无知是实事求是的第一道屏障。一个人没有对这个事物的基本了解就没有发言的资格，更不用说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如缘木不能求鱼、男人不能生孩子一样天经地义。无知是空白，是断层，是真空，是横在我们前进途中的沟壑，必得先有知识之桥搭接对岸，才能有下步的探求。但遗憾的是我们常会碰到一些无知的人硬是在按自己的理解去办事，去碰壁，使一些与之合作的人也常感到“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事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求不出个结果。

二、经验阻力——经验的一半是失误。

凡有一定年龄、一点经历的人，处事都有了自己的经验。这经验有时对探索新事新理有帮助，有时却是一种阻力。因为它是主观的先验

的东西，而客观事物却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循规蹈矩、驾轻就熟是人的天性，但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就会主客观不符，无法实事求是。中国古代有许多智慧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就是指这种人。

在漫长的科学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有大胆创新、谨慎实验的著名范例。但是也常会栽倒在自己的经验面前。1781年英国人发现天王星，不久发现它的轨道有些反常，人们怀疑在它之外还有一个未知星球在起作用。果然经过计算、观察，1846年9月发现了海王星。海王星也不安分，照前面的经验来推论，还会有一颗未知星，果然后来又发现了冥王星。应该说再二、再三，这个经验是有效的。1854年，人们发现水星的轨道也有点反常，就又设想，水星附近还会另有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但这一次经验误导了科学家。人们连续找了六十一年，不见任何结果。直到1915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才有了新的科学解释。有一年在美国召开的全球石油大会的主题是“我们曾在老地方用新方法发现过石油，也曾在新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但从没有在老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就是说一定要跳出经验。

经验可以帮助实事求是，但只靠经验不可做到实事求是。真正地发现规律，只有靠新的实践。在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对经济建设就不适用了。1958年的失败，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经验的失败，是革命党经验对执政党实践的失败。事实上我们犯的许多错误都与沿用过去的经验有关。对于过分相信自己经验的人，需要大喝一声，经验的一半是失误。因为这里面只含有被过去的实践所证实的部分，还有一半等待将来的实践来检验。经验可以是通向实事求是的大门，但这门上有一道高门槛，要跳一下才能过去。一个有经验

的人和一个无经验的人同时面对一件事，前者可能会自恃经验不再调研，结果失败。后者倒可能因无经验参考而十分小心，尽力操办，反而办成了。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随时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有经验本来是好事，但也可以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

三、习惯阻力——画地为牢。

这里说的习惯指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社会习惯。列宁讲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生物学家巴斯德说："精神错乱莫过于按自己的愿望去相信某样东西。"人们认识事物有时不能实事求是，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没有实践，而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求新知，去实践。跟着习惯走，自古如此，岂不知习惯有时恰恰是错的。习惯和我们前面讲的经验还不一样。经验是知识，是有限的模型；习惯是思维方法，是力量无穷的武器。用错了危害更大。习惯思维就是保守，是妨碍创新的一大障碍。

一重一轻两件物体从空中落下，哪个下落得快些？人们习惯认为重的快。但伽利略不相信，他在1590年（时年26岁）做了著名的斜塔实验，证明了从上抛下的轻重铁球同时落地。并从此有了"加速度"这个概念，推动了物理学大进一步。

在社会变革中，经常有许多束缚人的东西，它明明是错的，是应该改掉的，但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改，甚至要改变它倒成了大逆不道。比如旧社会中国妇女缠足，明明摧残身体，但这个习惯保持了几百年。改革开放之初，又有许多旧习惯在阻碍进步。比如人们没有法律意识，即使有理也不愿上法庭，认为丢人；比如羞于经商，认为是投机赚钱；还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种自留地、把私营企业、

把集市贸易、把商品交换、把市场经济，甚至农民多养几只鸡，种一点菜，工人下班后在外干一点私活，都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把商品流通说成投机倒把。把对上面的、甚至报上的不同意见就打成反党、反革命（现在回想很难理解）。而且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已成了是非标准。这种习惯常常可以统治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甚至全国人民多少年，而很难改变。习惯把人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思维空间，使你看不到新的外部世界，当然也就难实事求是，发现客观规律。

习惯这个东西是不问对错的，而只问有无陈例。中国封建政治多少年一直是把法先王之法当成处事惯例，这样最省事。一种概念形成之后对少数人来说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对大多数人是在习惯的“惯性”中运行，轻易不会跳出这个惯性空间去思考、去探求。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从“苹果落地”这个习惯思维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引力；爱因斯坦所以伟大，是他从经典力学的习惯中跳了出来，发现了广义相对论；邓小平同志所以伟大，是他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跳了出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事物认识的飞跃，有时就表现为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突破。正如物理学上打破惯性状态要一个外力，在认识上打破惯性思维，也要有一个外力，这个力常常表现为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理论或一场新的行动，直至革命行动。

四、书本阻力——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本阻力其实是本本主义，就是教条化的知识和理论形成的阻力。陈云同志在晚年有一句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总会总结成知识和理论，并写成书，留给后人。我们遇事常常会自然地想到，书本上是这样说的。对实事求是

来说，无知是阻力，但已有的知识和理论也会成为阻力。正像人们学游泳，一点不会当然难学，但如果会的是一种错误的姿势则又更难学。因为你先得纠正现有的错误，这凭空又多了一层阻力。古语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书本与现实间有误差。当它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顺风，当它不符合实际时，这书本就是行船的逆风。

知识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总和。由于这种认识要靠一代代人的接续才能完成，前代人只好将已有的认识付之于书。赫尔岑说，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前来接班的年轻人的遗训。由于书籍太多，人们又经过实践检验而筛选出各种经典用以统率相关的知识，指导人们的行为。政治的、科学的、经济的、军事的、哲学的，几乎凡每一学科，每一领域，都各有其经，各有其典。这些经典由于其权威性，一方面对后人的参考价值极大，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迷信力、束缚力也很大。这些巨著一方面如灯塔，不知为多少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一方面又如一堵石墙，不知使多少开拓者裹足墙下，甚至碰壁流血。不是经典不好，是读书人不好，不该把它看作万能，不该作茧自缚。恩格斯就曾告诫那些企图从自己书中寻找未来社会图画的人说：你们在我这里连半点影子也找不到。邓小平说："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古今纸上谈兵、抚书论政而误大事的实例多得很。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其父都说不过他。后来他带兵打仗，数十万人全军覆没。中国革命得力于马列书本的指导，但是由于运用不当，照搬照抄，书本在很长时间也变成实事求是的阻力。中国革命史上有两次照搬的高潮，一是王明照搬马列书本，不顾中国革命实际；二是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的书神化僵化，大搞形而

上学。这两次都使革命事业和国家民族遭受大损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突破了书本、经典的阻力，强调调查研究，实践检验，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一步又一步实事求是，才有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两次大飞跃。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几十年来，我们又不知道出版了多少没有用的误人的书。

实事求是总是从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开始的，因此它可能有两个过程，一是通过实践验证书本的结论，二是推翻和补充书本上的结论，探寻未知的客观规律。所以说书本用得好，是我们前进途中跨越天堑的一座桥；用得不好，是横在面前的一堵墙。这种潜在的阻力常常可以因时因势，在特定条件下变成实事求是的具体阻力。

五、实践阻力——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实践阻力是指当时某一阶段的客观实践发展还不成熟，还不足以揭示事物的真相和规律，主客观无法一致。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五道障碍。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继续实践，等待瓜熟蒂落。

恩格斯在解释假说并不是真理时有一段名言："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海王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可见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实事求是，而是客观实践还没有到这一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在氧气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物质里有"燃素"，到

拉瓦锡认真观察实验之后，才知道不是什么“燃素”而是氧气在起作用。在开普勒以前，人们认为行星绕太阳按圆周轨道运行，经开普勒的深入观察计算，指出行星运行轨道不是圆周而是椭圆。并不是拉瓦锡、开普勒以前的人不想实事求是，是客观实践还没有成熟。1976年10月，逮捕了“四人帮”，大家急着让小平出来工作。叶帅说：“不能急，要不真成了宫廷政变了。”现在我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殊不知就在这次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才进了小小一步“不要包产到户”。实践之履在艰难前行。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四个建设”，不是以前不想提，实践要一步一步来。

科学研究常有假说，社会科学方面常有先进的理论。就是说，人们从理论上已经可以推出某一规律，但是在实践没有检验之前，仍然不敢下结论。爱因斯坦1905年就推出质能互变公式，但到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才证明这种互变引发的巨大能量，中间又经过了四十年的艰苦实践，也就是说他们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了四十年，终于求得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又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设想。在这之后的一百六十年间，世界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实践)。苏联东欧是一支，建立社会主义七十四年后又垮掉了。北欧社会民主党的试验是一支，过去我们不承认，现在看来，值得总结。中国几经曲折，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见要逼近真理，其间隔着一个多么漫长的实践过程。这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将来的社会主义还会有更大的差别。这是理论与实际的误差。修正这种误差

只有靠实践，谁也不要奢望省略它，超越它，一步跨到共产主义。

我们第一，要尊重实践，特别是要尊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第二，要耐心，千万不能犯急性病，不能妄图缩短甚至跨越实践。轻易不要提什么“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之类的口号。

六、自满阻力——唯我独尊，听不进意见。

人一自满，便不能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凡这种人大都有知识，有经验，而且还很丰富。当他的知识、经验在胸中胀满时，便要以我为标准了，好像一个富翁，财大气粗，什么也瞧不起。我们平常说要虚怀若谷，就是时时把你的胸怀空着，准备接纳新事物，接纳未知的东西。你自以为大，店大欺客，主观欺侮客观，反过来必定自己受欺，客观事物决不会向这种人袒露真情。这种人在当初可能曾经实事求是，但当他取得一点知识，有一定经验之后就渐渐变得骄傲自满，变得故步自封，滑到了唯我独尊的深谷。

历史上因过分自信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上马谡失街亭、关羽失荆州都是由于过分自信，脱离了战局的实际。李自成也是个自满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曾劝人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在夺取政权之前待人处事，审时度势，各方面还比较谨慎，比较能实事求是。一坐上大顺朝的宝座，就忘了内外危机，就不能明察秋毫，终至脱离实际，丢了江山。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是首倡实事求是作风的，进城前还特别提醒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在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特别提出谦虚谨慎，甚至规定了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少拍巴掌、少敬酒和挂像时不与马列并列等细节。但是到晚年他却背离了这一原则，又过分相信自己的权威，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新实际。庐山会议上关于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他不听，还大发雷霆，下山前宣布说，我要编一本《人民公社万岁》的书，写一篇一万字的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结果书刚编好，就三年困难，不了了之。

自满是实事求是的主观障碍。当你已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你就不可能再去“求”。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追求的目标未达到时，他有强烈的进取心，处处虚心，处处小心。而当这个目标达到时，他就总想保守它，这时便很难找到新突破口，很难发现新事物。不是找不到，而是连找的动机念头也减弱了，没有了。甚至当别人找到新事物时，他还会大喊“不可能”，这是最可怕的。

七、情感阻力——以感情代替政策，靠情感决策。

一个人可能也有知识，也有经验，也不自满，他已克服了前三道障碍，但他把握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第四道障碍面前无法实事求是。因为前三个阻力是他不能为，如有人用障眼法，遮住了他，他力所不能，智所不逮，找不到实事求是的门路。但情感障碍非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感情代替政策。他决策一件事时连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赌气。

孙子兵法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人一旦为感情所俘虏，就会失去理智，明明知道别人对，也不愿附议，宁可不为，也不愿增加他人的光彩。总是后任否定前任。你盖的楼，我偏要拆了重盖。这种心理它已不单单是以我之利害来决是非，而是以我之好恶来定取舍了。哈恩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1938 年底他正苦苦研究一个核放射课题，未有结果。这时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哈恩的助手发现了伊伦娜的一篇论文，很有见解，哈恩却因二人

过去曾有矛盾，拒不阅读，说我不看那个女人的东西。在助手劝说下，他拿起一看非同小可，受到启发而发现了核裂变，并于194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这一成果直接导致了原子弹的研制。如果他还顽固地坚持私人成见呢，这项成果还不知落在谁手。

情感可以干扰理智，许多大人物，都是被情感打败的。胜利可以冲昏头脑，悲伤也可冲昏头脑。关羽一死，刘备就不顾一切发兵报仇，结果大败。不实事求是，不能冷静分析敌我形势。

八、权威阻力——自以为是，号令天下。

恩格斯说：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显而易见的权威。社会不能没有权威。权威是某一领域正确意见的代表，正像经验是有益体验的总结。但是权威有两面性，它和经验一样，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包办未来。现实生活中只有过去和现在的权威，而没有将来的权威，它一样要受实践的检验。当权威发挥其正确的指导职能时，我们探求新事物会事半功倍；当权威持错误的观点而要别人服从时，我们在通往实事求是的路上便多了一道障碍。况且在很多情况下，除屈从之外，人们更多的是自觉服从权威，这样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权威。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样就造成不少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现在人口问题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压力。1957年马寅初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控制人口。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对，说人多热气高。康生、陈伯达又兴风作浪，批判马是资产阶级人口论，结果“错批一人，多生数亿”。1959年庐山会议前，党内已有不少反

冒进的意见，庐山会议原来也准备纠“左”，会议中间又转成反右倾。连续几年周恩来、陈云的经济思想都遭到批判，在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也连遭否决。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主席的权威和大家的服从，结果使我党在经济建设、农村政策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实事求是。

以权威而阻止后生新进的例子在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光速不变是相对论的前提，但是当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后，物理学老前辈、曾证明光速不变的迈克尔逊很不理解，他遗憾地说：“我真没想到，我的实验反倒促成了相对论这个怪物的诞生。”（他做那个著名实验时爱因斯坦才 8 岁）普朗克提出革命性的量子理论，约请十八位大科学家到会讨论，倒有八个像卢瑟福、居里夫人这样的大权威不支持。1869 年 35 岁的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他的老师，化学权威齐宁却教训他：“不要玩魔术。”1884 年瑞典 25 岁的青年学者阿伦纽斯提出电离理论，母校的教授嘲笑他“鼻子伸到了不该去的地方”，甚至国际化学界还形成一个由著名教授组成的反对阵线，为首的就是曾经发现了周期律的门捷列夫，说这是“奇谈怪论”。但电离说还是胜利了，发现者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我曾经忽发奇想，如果把每一个学者，他当初怎样受权威压制，后来又怎样以权威而压制别人，这样排列下去，就是一条如长城城垛式的波浪线。这正象征了事物的波浪式发展。每一个权威在他事业和学业的兴盛时期都给社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历史所记录的大都是他这一瞬间的光环。但是正如人的肌体会衰老一样，不少权威的思想在晚年都变得保守消极，无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权威，一方面又不能绝对迷信权威，不能靠他们鼎盛时期的光环来为

我们永远地照亮，更要警惕自己不要自充权威。

权威对正确意见的否定，就像家长对孩子的管制一样，是无所谓对错的。按林彪的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权威以自己的自信和经验来决策，别人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来服从。这时的标准只是信与不信或忠与不忠。这里面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实际情况的忽略，因此很可能偏离实事求是。正如经验的一半是失误，权威的一半是过去，它在实践面前同样要重新接受一次检验。但正如我们往往错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也常错把权威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在通往实事求是的大路上又人为地树起一个屏障。

九、利益阻力——私心作怪，明知故犯。

马克思讲：“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是分成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会意见不一，有时甚至会很对立。所以同样一件事，一项政策，会有不同反映，所谓众口难调。这也为实事求是带来困难。有两种情况，一是一项政策好，实事求是，但因侵犯了某一阶层某一集团的利益，遇到客观阻力，难以推行。二是某集团明知这件事对，但考虑到自身利益，昧着事实或良心有意不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它的实现，往往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集团势力的变化。

人总会有一点私心，为保护自己而不实事求是，以对我之利害来决定是非标准。成语言“指鹿为马”，是说秦丞相赵高专权，为试属下之心，便牵来一鹿，硬说是马。大部分大臣惧其势，都跟着说是马，唯少数几人实事求是，说是鹿。为什么有人跟着指鹿为马呢？不是不知，是有私心，不敢说。这样明显“指鹿为马”的事不多见，但为了保官，

保自己的利益而说假话的事却太多太多了。

历史上所有进步的改革政策的推行都是符合规律的，都是实事求是，但都遇到了阻力。商鞅变法，侵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侵犯了朝中保守势力的利益；我们实行土改侵犯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西藏和平改革侵犯了上层奴隶主集团的利益；等等。这些人的利益该不该侵犯，该不该剥夺呢？当然应该，因为如果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妨碍了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些都遭到激烈的对抗，使改革在艰难中推进。如果没有对抗，则历史的进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进程，不知道要顺利多少。

“四人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最大的是迫害刘少奇同志的冤案，硬将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四人帮”派人到解放前少奇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去找蛛丝马迹，找不到就硬编，造假证。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与刘共事，“四人帮”就逼他作伪证。翦进退两难，只好自杀。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违背事实，昧着良心干事，更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但是他们就要这样干，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利益。历史上其他冤案无不是这样造成的。秦桧对岳飞迫害，当人们责问有何证据时，只好以“莫须有”来含混过去。他们本来就不准备实事求是。

上面举的是大的政治集团因利益关系妨碍实事求是而使矛盾激化，这是极端的一面。而实际生活中还有许多小的利益关系。一些小的利益阶层和人群，从本阶层、本团体出发，会对一些本来合理的正确的决定、做法，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抵触和反对，经常妨碍实事求是的进程。这就要求主政者能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按社会规律办事。同时也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特别是不能借权谋私。

十、行政阻力——最后的阻力，强制阻拦。

比之与客观不符的无知、书本和经验阻力更可怕的，就是这种认识被上升到政策、法规、制度、体制，并通过行政权力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遇到的阻力，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法律、行政的制裁与限制。这是一种“硬实力”，一种强制。在这种阻力面前可能有几种情况：1. 说假话；2. 不说话；3. 说真话，如彭德怀；4. 辞职，刘少奇、周恩来都曾辞过；5. 自杀明志，如田家英、翦伯赞。

在黑暗的中世纪，科学面对的主要不是科研本身的艰难，而是教会势力的反对。教会常就许多科学问题明文规定，只许说什么，不许说什么，如只许说太阳绕地球转，不许说地球绕太阳转。因为不按教会的口径而坚持说真话，1600 年科学家布鲁诺被烧死，1632 年伽利略被判刑，直到三百四十八年后的 1980 年才被宣布平反，这三百四十八年间地球照样转，但是教会照样不认账，因为它手里有教会的行政力量。富兰克林发现了尖端放电，并发明避雷针。英国皇宫装上了这种装置，但英皇讨厌富兰克林，因为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富兰克林带头向英国闹独立。一天英皇散步时看见尖尖的避雷针，不由怒火中烧，下令全部改成球形的。下人明知违反科学，只好从命。因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当然这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我国在探索改革的过程中，曾遇到不少阻力，这里有认识上的，但也有已上升到行政规定并以行政权力施行的。如农村土地承包，我们曾长时间认为是资本主义 (认识) 并写入文件限制 (行政)。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家养鸡超过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眼看极“左”的农村政策造成地荒人逃，在就要饿死人的情况下，决定分田承包。但当时这与规

定不符，他们就私下定协议，按手印，立字据，分田承包，如以后事发，甘愿坐牢。可见由行政权力和体制所造成的阻力，已使得实事求是变成一种地下工作，一件多么艰难而又危险的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往前发展就要揭竿而起了。当然，现在小岗村，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荣起点，小岗村农民立的这个字据也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和行政法规相关的是体制。社会在按一定的行政法规运行中必定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体制对人的行为、人的思维，又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书本、经验、权威等一样，当它与实际相符时，有促进作用；当它与实际不符时，就有促退作用。但是只要这种体制不宣布废止，它就是一种制约，这时你要实事求是，就是逆水行舟了。比如与农村"左"的政策相适应曾有一个束缚农业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从 1958 年到 1980 年，整整存在了二十二年。可以想见，这二十二年间本来有多少可以实事求是的事情被耽搁下来。

随着实践的发展、历史的推移，政策、法规、行政命令、体制等必然要过时或不适应，它就成了实事求是的阻力，这时改变它就表现为一种改革或革命，有时甚至是政权的更替。因为这时所求的已不是某一项规律，而是整个社会转折发展之大规律。这较之某一项事业的开拓，这种阻力也就愈大，而克服阻力之后所得之真理，所取得之进步也就愈大。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如逆水行舟，每行一步都有其难。但这又是认识的必由之路，再难也一定要走，而且一定能成功。事物对立统一，有阻力就有克服这些阻力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七个前提条件，或者说七个动力。

只要坚持这七个前提，逆水之舟就会变成顺风之船了。这七条其中有三条，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提到了。

一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说真话，是去求真理。谁不想求真理？但许多情况下是我们不敢去想，不会去想。

要继承就得发展、创新和超越。许多科学发明、发现，首先是它一开始就选题定位好，定在了前沿突破的位置，一入手就着力于创新。科学界有句名言：提出问题比发现问题更重要。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那些唯唯诺诺，找不出现状的缺点，提不出问题，提不出新目标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物理学家卢瑟福指导一个研究生，问他："你上午干什么？""实验。""下午干什么？""实验。""晚上干什么？""实验。"卢说："那你什么时候思考呢？"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多，随风倒的现象多，本本主义多。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又说，"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他还说，要杀出一条血路。两军相遇勇者胜，鲁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可敬。纵观社会革命史和科学发展史，凡第一个发现真理，求得规律的，都是思想解放的勇士，大部分还是年纪不大的年轻人。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规律时26岁，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24岁，瓦特改进蒸汽机时29岁，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

时26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代领导集体大都四十多岁。（在西柏坡毛泽东头上发现三根白发，他说打了三大战役，才三根白发，值。）在勇敢的年轻人的头脑里，无论是书本、权威、习惯、旧势力、旧制度，还是旧的权力、法律、体制都不在话下。为了真知和真理，他们可以受难，可以献身。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谈到，少年如朝阳，如乳虎，气盛、豪壮、冒险，所以能创造世界。勇敢精神，是开拓一切事业的先决条件。

二是不断学习。

无知、自满、书本、权威和经验都可能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这就得靠学习去克服它。因为这五个方面的东西都只代表过去，是建立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上的。要探求新路必须既继承又超越，既保持传统又有创新。只有在学习新事物中才可能找到新规律。一个不学习的人，就像一个不愿攀登的登山者，永不可能迈上新的高峰。

学习，主要是学知识，学理论。

知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在探索社会规律过程中的共识和结晶，是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你只有掌握了最新知识，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客观实际、贴近规律。所以读书、学习，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立身处世的方法，特别是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人如公务员、高级公务员，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如果一个人以旧知识来处理新问题，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刻舟求剑，都是隔靴搔痒，他必定要在新知识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一切革命，都是新知识新观念对旧知识旧观念的否定，最终是新规律的呈现。现在知识更新的速度快，我们学习的节奏也要快。

理论是思想方法，是探照灯，比知识更高一层，解决怎么认识世界。理论拨开事物的现象而揭示规律，因此在本质上更切合实际。许多在

现象上打圈子转来转去的事，在理论上一句话就可以立判分晓。比如，前面提到的永动机研究，只需“能量守恒”一句话就可以彻底说清。我们在取得政权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搞穷过渡，搞越纯越好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直到探索碰壁几十年后才悟到了一个理论：“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早接受这样的理论，可以少走几十年弯路。在物理学研究中，有实验物理学家，有理论物理学家。在有的情况下只靠实验的方法，摸索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这时要靠理论。经典物理学发展到20世纪初遇到了“紫外灾难”，即无法解释紫外短波光部分的能量分布。许多科学家感到一种歧路的痛苦，比之于屈原上下求索，鲁迅夜长如磐的痛苦绝不少多少。经典物理大师，英国人瑞利甚至说：“真理已经没有标准，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了，我悔恨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五年前死去。”你看这和屈原愤而投江有什么区别？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于他们死守住实验这一种武器，而没有想到还有另一种叫理论的武器。著名哲学史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批评英国经典物理学派只讲求实用，“通过感觉达到科学而不是通过思维达到科学”。我们要多掌握一些理论，不要总是靠感觉办事。

学习理论，一方面要掌握继承前人的经典理论，另一方面要学习新理论，从实践中总结新理论。因为如前所述，过时的、不完整的理论也会成为新探索的阻力。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在总结了原有错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实践探索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如十四大提出推行市场经济，十六大的五个统筹，十七大的四个建设。理论好比煤矿开采时的掘进程序，有了掘进巷道，才有下一步的大面积作业面开采。

只有尽量掌握全部的新旧知识和理论，我们的思维才可能尽量逼近

实际，才可能实事求是。

三是勇于实践。

实事求是，说到底你得去“求”，就是说要实践。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回避矛盾，永远得不出什么结论。只有实践的勇气才是带着实事求是列车前进的火车头。

要实事求是，探得一点真知，就要勇于实践，要准备吃苦，准备失败，准备牺牲。哪一条真理不是无数实践堆积提炼而成的？达尔文环球五年旅行，搜求动植物标本，终于找到物种起源的根据。居里夫人用一口大锅，花了三年九个月，终于从一吨矿渣中提炼出 0.1 克镭。卢瑟福顽强地重复实验，终于从 2.5 万张基本粒子的照片中发现六张片子，从而找到人工转变元素的根据。这有点像我们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第一有风险，但也最得甜头。深圳当年多艰苦，现在多风光。毛泽东同志讲，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它，亲口尝一尝。只有亲身参加到某项工作实践中去，才能得到专门的真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所以为近代百年中国三大伟人，是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全身心地投入。而一项事业的成功，常常是要靠数代人的连续勇敢坚定、锲而不舍的实践才能完成。不敢实践，不肯吃苦，远远站着，或浅尝辄止是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的。

四是无私无畏。

实事求是，有时表现为艰苦地探求，有时表现为敢面对事实说一句真话，而许多时候恰恰在这一点上迈不过去，所以无私无畏是实事求是的动力之一。只要有了这把利剑，至少可以砍开前进路上的一半荆棘。

古往今来，无论是政治原则还是处世道德，坦坦荡荡、敢说真话总是放在第一位。欺君之罪，谎报军情，弄虚作假都属十恶不赦，都会酿成大失大错。

特别是当实事求是遇到来自权威和行政方面的阻力时，更要靠无私无畏去克服和坚持。这时的胜利不在知与不知，而在敢与不敢。布鲁诺为了捍卫日心说，在教廷迫害面前宣布“半步也不退让”，坐狱八年，最后被烧死。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到处与教会辩论。他说，“我正磨砺我的爪和牙来对付他们”，“我准备接受火刑”。他被人称为一条好斗的狗。鲁迅说，他是一条有功于人的狗。这都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无私无畏捍卫真理的例子。海瑞是以大无畏精神著称于史的名臣。1565年，明嘉靖皇帝已在位四十年，他听信佞臣、方士，求仙，炼丹，误国。海瑞在这一年上了著名的《治安疏》，直接指出：“陛下之误多矣。”皇帝气得大喊，去抓他，别让他跑掉。属下答曰：“他不会跑，已经买好棺材，在家等着呢。”这种把事实、真理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的实事求是精神，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史上最光彩的一笔，海瑞也因此成了敢说真话的楷模。现代人的例子，比如马寅初在人口问题上坚持正确主张不妥协，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中，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权力压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文天祥《正气歌》里说“在齐太史简”，说齐国的臣子崔杼杀了国君，第一个史官照实记录，崔杀了他。第二个又记，崔又杀。第三个又记，又杀。第四个还这样，崔实在没有办法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张闻天还是要讲话；张被批，黄克诚还是要讲。

这些用生命换真理的勇士在历史上的光辉永存，这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功业等，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有着勇敢无私的抗争精神，

敢说实话的态度，有着高尚的人格。壮士一勇可退三军，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没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燃烧生命去照亮真理的作为，则真理身上所蒙受的尘埃又不知还要推迟多少时间才能褪去。

五是自知之明。

如果在实事求是大路上，无私是一把横扫荆棘的利剑，那么自知之明就是一个灵敏而又谨慎的探雷器。

既然骄傲自满是实事求是的大敌，就需要有“自知之明”这个天敌来制服它。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以会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有时是不知实情，有时是不敢知道实情，有时是知道了而不敢说出实情，而有的时候则是自以为这就是实情，不必要再去了解其他。这样我们就陷进雷区，随时有失败毁灭的危险。认识者一旦将自己置于认识的误区是最可怕的。比如，前几年，社会上流行吃南瓜可治糖尿病，殊不知，不但无用，还会加重病情。通常人在认识事物时，会千方百计估计到客观事物的各种可能，但恰恰会忘记自身主观这一方有几种可能。就像一个猎人，仔细地设想了出行路线、猎物的情况，甚至猎获后如何处理，但却忘记检查一下枪里是否装有子弹。黑格尔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说清了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他本身也需要被认识。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有的人不适合干这种工作，但是他几十年不变地干着，毫无建树，而不知换位。有的人诚心诚意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是坚守错误。事情很简单，只要他肯跳出来，跳出庐山之外，便会立即有新发现。周恩来、博古等同志在红军时期曾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但后来自觉不对，立即改正，为革命做出了大贡献。他们襟怀坦荡，甚至于以后还拿这件事教育党内同志。而王明、张国焘则无自知之明，一错到底，

直到最后碰壁，碰得粉碎。有自知之明，在许多时候首先不是表现为进取，而是表现为避祸、避丑，减少失误。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这样。

曾国藩主持镇压太平军后，其权其威煌煌赫赫，于是有人建议他趁势造反，夺大清天下。他说大清气数未尽，未敢造次。赶紧自裁军队，得以全身。巴金晚年，常有人求字，求题书名。他说，我的字不如茅盾，茅公在世时，能给人写字，我却不能。人们更加尊重他。没有自知之明，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剧。前面提到明代的海瑞，他在某些时候能借无私无畏做到实事求是。但是在“自知之明”这一条上却栽了跟头。1569年，他从狱中被放出后当上南直隶巡抚，驻苏州。当时南方高利贷盛行，农民破产，土地为债主所夺。这类官司极多，已属积重难返。海瑞一上任就要独挽狂澜，先处理了一个曾任宰相的大官僚，又亲自审此类案，每天要收三千至四千状子。他热情极高，没有专门机构，而全靠个人勤政审办。结果卷入纷争，孤军奋斗，四面招损。这次只做了八个月的官，又丢职还乡了。我们的干部也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能力。

可见自知之明应该是加在我们认识路上的一道保险，就像猎人上路先检查一下枪里有没有子弹。这样起码可以排除因主观“不愿其闻”而造成的错误。成语言虚怀若谷，不辞江河是为大海，不辞土壤是为高山。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头脑。”自知之明者，就是要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不足，随时准备纳新知而求真理。

六是发扬民主。

前面讲到，有时可能会因为权威、行政和私念方面的因素而妨碍实事求是，克服的办法是有一个民主制度、民主环境。小平同志在那篇著名的，后来被看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专门有

一个小标题讲“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持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是小平同志对历史的深刻总结，高度概括。我们党曾有几次在实事求是问题上栽过跟头，给我国的革命、建设造成过令人痛心的损失。比如，1958年的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说假话。而这也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这从反面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民主环境，才能保证党的政策方针实事求是。政治上不民主，敢说真话的人就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压制。经济上不民主，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受到破坏。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提出一个政权怎么跳出周期律，永葆活力。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那次谈话后又过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可以说，成也民主，败也民主。将来实事求是还得靠民主。

发扬民主，小者便于人人讲话，集思广益；大者便于一个党、一个政府将自己的政策置于更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七是健全制度。

社会为能正常运行，必得有一定的制度。所有文化形态，不管是知识、思想、道德，还是美丑，都要凝结在制度上来，以制约人的行为，保护社会进步。实事求是人类探求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科学的方法，当然要

靠先进的制度来保护。中国封建社会长，习惯于人治，老百姓总是盼望能有一个好皇帝、好领导，日出东方红。古今文学作品，总是在歌颂好人或鞭打坏人。这是道德教育，还不能代替制度建设。文化大革命一场灾难才使人认识到靠理想、靠个人、靠权威都不行，要靠制度。

1980 年 8 月邓小平关于制度改革有一段经典的讲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实事求是为什么难？最难就在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的、激励的制度来保证人说真话，办实事。“文革”一起，连宪法都不要，冤案遍野，国家主席的生命都不能自保，何谈实事求是？“文革”之后，首先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先从思想上解放，但最后还是要落实在制度上。细想一下，短短的三十年，我们立了多少法律、法规和制度，只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就有九百多部，影响最大的如市场经济体制、人才流动、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试想，如果 1949 年一建国，我们就有领导人不超过

两届任期的制度，毛泽东也不会有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结 论

实事求是，是一个思维方法，也是一个实践过程，它关系一件事乃至一项事业的正误成败，因此它又是一条思想路线，是一个行动纲领。

实事求是四个字，包含了行事者的学识、经验、思想方法、道德品质。同时，它又受时间、条件所左右。因此，它看似简单，实行起来却有许多难处。在此时、此处实行易，在彼时、彼处可能就难。有时，一个人在这一问题上能实事求是，在另一个问题上却难做到。本文谈到十种阻力，是想说明，这是一个综合因素。比如有的人在知识、实践等方面过关了，在无私无畏上却过不了关，或者在经验问题上栽了跟头。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谁也不敢说他永远、时时、处处都能做到实事求是。这就像谁也不敢说他一生一世不犯错误。犯错误不怕，改正就好。要想时时处处都实事求是，这可能做不到，但这不可怕，只要我们永葆这个精神、这条路线，并且在主观上解放思想、不断学习、勇于实践、无私无畏、有自知之明；在客观上能做到发扬民主、健全制度，就一定能做到实事求是。我们的行为就能不断逼近真理，我们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胜利。

1995 年 7 月 7 日

《党建》2009 年第六期

我的阅读经历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由两大背景决定的，一是他的生活，二是他的阅读。

经常有人问我，你读过些什么书，能不能向年轻人推荐一些，我就面有窘色，一时答不上来。一般作家谈阅读时都能很潇洒地说出那些大部头，读过多少外国名著。我却不能，就算读过几本，也早已忘掉了。我不是小说作家，是写文章的，正业曾是新闻写作、公文写作，业余是散文写作。这些都强烈地针对现实，不容虚构情节、回避问题，否则写出的文章就没有人看。所以，从作家角度来说，我的阅读是一种另类阅读，是“撒大网、采花蜜”式的阅读。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人人经历过的最普遍的阅读方式，只不过我可能更认真些并且与写作联系起来了。这种方式对学生、记者、公务员和业余写作爱好者可能更合适一些，我也都曾有过这些身份，下面是我阅读和写作的简要经历。

一、关于诗歌的阅读

人生不能无诗，童年更不能无诗。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注意对孩子专门的选读和辅导，差一点的也会教一些俚语儿歌。这是一种审美启蒙、情感培养和音乐训练。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

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及《唐诗选 》《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几分钱一张。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说到阅读，我是吃着普及读物的奶水长大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总之是在朦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的孩子学钢琴、学跳舞。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九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一说古诗词，人们可能就想到深奥难懂。其实古人的好作品恰恰是最

通俗易懂的。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明白如话，但又不只是“白话”，这里面又有音乐、有图画。因为诗的功能是审美，并不是难为人，好诗人是在美感上争风流的。倒是今人学诗、作赋，食古不化，以僻为荣，不美反涩。

古诗词的阅读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二是意境的美，三是音韵的美。后两个都是审美训练，这是每个人的写作都要用到的。我们常说，文章美得像诗一样，就是要指文章的意境和韵味。在所有文字写作中，只有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是专门来表现意境和韵律的美感的。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现在一般人家节衣缩食给孩子买钢琴，倒不如备一本精选的古诗词。因为成人后，一万个孩子也不一定能出一个钢琴家，倒是有一千个要写文案，一百个会当作家，而且在成人前每个人都得先当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

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象的手法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

建国60周年时我发表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是顺着毛泽东自己曾五次提出要骑马走江河的思路，假设他在“文革”前的1965年到全国去考察（当时中央已列入计划），沿途对一些人事的重新认识。是对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反思，是对 “文革”教训的沉痛思考和历史的复盘。通篇表现出一种反思、悔恨、无奈的惋惜之情。有许多地方一

言难尽，只有借诗意笔法。

设想毛泽东在三线与被贬到这里的彭德怀见面：“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三十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何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这里借了有苏东坡词《江城子》与杜甫诗《春望》的意境。而写毛再登庐山想起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的失误，写道：“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安得倚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在诗意的写景后又代主人拟了一首诗。毛本来就是诗人，其胸怀非诗难以表达。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邓小平“文革”中被贬到江西强制劳动。“他每天循环往复地走在这条远离京城的小路上，来时二十分钟，去时还是二十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这里借秋景来营造一个意境，抒写他忧郁的心情，都是古诗里的句子。

回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百年明镜季羡老》中有这样一段：“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他有一文专记此事。于是，北大这处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花盛花枯，前后不同的诗意。

有时文章到了结尾处情绪激昂无以言表，只好用诗了，如《梁思成落户大同》一文的结尾:“我手抚这似古而新的城墙垛口，远眺古城内外，

在心中哦吟着这样的句子：大同之城，世界大同。哲人之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这种效果有如“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非诗不能表达。

我在中学时开始读新诗，断断续续订阅《诗刊》直到工作后多少年。新诗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审美，而是激情，虽然我后来几乎不写诗，但这种激情一直贯穿到我的散文写作、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的诗人偶像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我都抄过、背过。《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响彻在各种场合。他们的诗挟裹着时代的风雷，有万钧之力，是那个时代的进行曲，能让人血液沸腾。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艺术，而是号角。如郭小川的诗句：“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毛泽东说：“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写过‘我号召’！”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思想多元化，诗歌当不了号角，不能再起动员作用，它又回归到审美，但却是小众的孱弱的美。那时还出版过一本《朗诵诗选》，尽选名家诗作，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保存有几本当年抄诗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抄自书报刊的无名好诗。1968 年 12 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有什么书可读，塞外的数九寒冬四个大学生挤在一盘火炕上念诗，互相回忆过去读过的好诗。从北京带去的《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冬之夜。现在想来是有点幼稚，但却留住了一点激情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见到好诗就抄就背，这种爱好持续到 40 岁左右。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见到新华社老记者

张万舒，我说我背过你的《日出》《黄山松》，“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一次全国作协开会，我与诗人严阵坐在一起，我说，我现在还保存有你的诗集《竹矛》。他们没想到在二三十年前还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大家都很激动，谈起那个诗的时代“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带着采访组到贵州采访。路上，贵州山水如诗如画，我想起了贵州老诗人廖弓弦的一首诗，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幅淡墨画。”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惊奇，他们不知道当地还有这样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已经过世。这是我高二时在中学简陋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在《人民文学》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时的记忆真是宝贵。那时阅览室里杂志不多，怕人拿走，每个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线拴在桌子上。我不但背诗，也写诗，二十多岁时在河套平原劳动，一年后又当记者，夏收季节八百里河套金黄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十分壮观。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麦浪滚滚》，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当然也没有刊物可发。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费不是因为散文，而是诗歌。1975年我调回山西，到大寨下乡，写了一首诗，发在《北京文学》上，稿费十四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四十六元，稿费单插在省委传达室的窗户上，让很多人眼红，我也自豪了一阵子。1988年我将自己多年读、背、抄的诗选了五十六首，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写人、写景、抒情、词曲体、古风体、短句体、长句体等十一类，加了四十条点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新诗五十六首点评》。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

新诗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激情，二是炼字。

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是激情。在各种文体中，诗歌的

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诗歌，叙事不如小说，说理不如论文，但它的长处是综合。如果能将每种文体之长都拿来嫁接在散文中，这就出新了。我后来总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个“情”字就要靠读诗来培养。诗陶冶人性，让人变得热情，可以改变你的性格，你的人生态度。我后来当记者，直至退休多年，每见一新事，就想动笔，甚至一人看电视看到好的节目，听到一首好曲子都会流泪，与读诗有关。当你胸中鼓荡、翻腾，如风如火，如潮如浪，想喊想叫时，这就是诗的感觉，但是不去写诗，移来为文，就是好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文第一要激动》，谈的就是这个体会。青年时期关于诗的训练并不吃亏，都无形地融入了文章中。1984 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夏感》，选入中学课本，使用至今。全文只有六百六十六个字，歌颂生命，抒发一种激昂向上、拼搏奋斗的情绪。其实这就是十年前那首数百行长诗的转世。那首诗我现在连一个完整句子也想不出来了，但那种情绪总在心中鼓荡。诗歌所给予的感情上的律动在我后来的散文中都能找见。阅读诗，但写出来的是散文，正如鲁迅说的，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读诗对写作的另一帮助是炼字、炼句。诗要押韵，就逼得你选字，本来中国字很多，但这时只许你使用一小部分。如果碰上窄韵字更是走钢丝，冒风险。李清照所谓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下笔时经常一处换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字，这就是诗的推敲功夫。从字义、字音、字数上推敲。比如，我在《秋风桐槐说项羽》中说到项羽故里的一棵梧桐和一棵古槐，人们在树下“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于是这两个红色的围栏便成了园子里最显眼的，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

方舟。秋风乍起，红色的方舟上托着两棵苍翠的古树”。这里是该用“布带”“丝带”还是“绸带”。现场实际情况是什么都有，但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要找意境效果。“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扛鼎拔山的形象不合；“布”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飘动感不如“绸”。因为文近尾声，这里强调的是“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隐喻两千年来在历史的天空、在人们的心头飘动着的一种思绪，所以还是选“绸带”好一些。还有诗歌常用叠字，特别是民歌。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中“山丹丹”“背洼洼”“半炕炕”等，自带三分乡土味。我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中，写到毛回到陕北，就是用的当地的这种民歌口语：“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而写到他内心的自责时，则用古典体：“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借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意。

诗歌因为与音乐相连，所以最讲节奏。节奏感主要由句式、章节、平仄构成。我在《新诗五十六首点评》的研究中专门分了长句类、短句类。指出：“短句体借鉴词曲手法和口语句式，节奏强烈，如鼓点，如短笛，如竹筒倒豆。出语就打在你的心上，不另求弦外之音。”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短句诗是一首《同志墓前》，作者叫丹正贡布，并不出名，注明1963年创作于阿米欧拉山下。当时我手抄在一个本子上，第一节是这样的：

五里外，

滚滚黄河，

高唱着

不回头的歌，

五步内，

三尺土下，

炽燃着

不熄的火。

朝朝暮暮，

悼念苦我心，

走近墓前，

泪往草上落……

“五里外、五步内、三尺土”锤锤落地，寸寸剁下。最后的“落”字又落在一个仄声上，节奏更短促急迫。

在散文中，当有需要强调的地方我就多用短句，如敲鼓、钉钉。如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而长句体“它不是打击乐，不求鼓点式的节奏，而是管弦乐曲，收悠长、浑厚、深沉之美”。还以郭小川为例，他的《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这是长句，适宜舒缓的描述。我在《草原八月末》中写对草原的感受就是用的长句：“看着这无垠的草原和无穷的蓝天，你突然会感到自己身体的四壁已豁然散开，所有的烦恼连同所

有的雄心、理想都一下逸散得无影无踪。你已经被融化在这透明的天地间。”而有时又要长短结合。如《红毛线，蓝毛线》中：“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

二、关于散文的阅读

读散文少不了古典散文，这类似现在搞流行音乐的人，也少不了要知道一点古典音乐。对我影响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不搞专业，用不着去找他们的原著，古籍浩如烟海，又艰涩难懂，是读不过来的。好在中国文学有个好传统，一代代精选前作，把最优秀的挑出来，只读这些就够了。关键是精读，最好能背，取其精，得其神。我的古文阅读分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课堂上的学习。中学时我是语文课代表，书中的每一篇古文都是熟背过的，并且要帮老师考同学背书。二是扩充阅读。读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综合选本。最有名的是《古文观止》，但那毕竟是古人编写，离我们还是远了一点。我用得最顺手的本子是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版的《历代散文选》，共选了一百五十篇，基本上囊括了历代名文，注释浅近易懂。编者之一的芦荻，后来一度是毛泽东的古文陪读，最近才去世。它成了我的工具书，平时放在案头，下乡采访时背在包里，早晨起来背诵一篇，那时我已过 40 岁了。三是选更精一点的普及本，经常查阅、体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学普及丛书，每本只有几角钱。如《宋代散文》两角八分，现在插在我的书架上，还没有退役。从司马迁到韩愈、柳宗元、范仲淹一路而下到清与民国之交，梁启超是一

座高峰。梁继承了中华古文中阳刚的一脉，并将雄壮的文风带入了民国。你看他的《少年中国说》，讲少年与老年的不同，连用十四个排比，那气势真如长江黄河顺流而下，摧枯拉朽，为古文标上了一个强烈的休止符。下面该民国和新中国的文章家登场了。

中国古代散文家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和政治结合，除少数专业作家外，好的文章家都是政治家、思想家。我把这个阅读成果编成一本书《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2012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多次重印。十篇文章都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它当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并且现在还在使用；二是文中的词汇或句子是首创，并进入汉语词典、语典，现在也还在使用。这个标准是很苛刻的，就是说无论思想还是语言，必须是独家首创，虽过了千百年仍有生命力。这就是经典，可以做范本。这十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林觉民的《与妻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文章的脊梁骨。这些文章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不知多少改朝换代、人事兴替、血流成河、硝烟战火、经验教训才凝成一篇文章。“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篇能载入史册的名文背后是几代人的心血。

古典散文中除司马迁、唐宋八大家这两个高峰外，还有一头一尾。一是汉赋，一是明清笔记小品。

汉赋，离我们远了一点，词汇可能生僻些。但它从诗歌中脱胎出来，有诗的气质、韵味，语言极度豪华。学习炼字造句不可不看，但也不必去写，毕竟时代不同了。我常看的一个本子是《历代赋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我把赋的意境运用到散文中，主要是

取它一唱三叹、流连往复的效果。其中枚乘的《七发》较为有名，这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引用它有关。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时，说到瞿秋白“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就是从《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而化来的。

明清笔记小品的长处是比唐宋古文有了平易而精致的叙述，在叙述中抒情、说理。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景中有事，事中有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讲故事中说理，他的《狐友幻形》讲一文人有一个隐身的狐狸朋友，会变成各种人，变老、变小、变男、变女，有朋友聚会时就变来为大家助兴，但只闻声不见形。众人就说，为什么不现出你的真形。狐说：“天下之大，谁也不肯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为什么要强求我一人现真形呢？”说罢，大笑而去。辛辣、幽默、深刻。与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正襟危坐、洪钟大吕式的文章相比，又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明清散文我还特别喜欢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本笔记体散文，因是叙述自己的生活际遇，作者原也不准备发表，所以十分真实感人。文字清新流畅，简洁明亮。我是 1983 年左右看到这本书的，一看即爱不释手，深深地为作者高超的文字功力所折服。读这本书不是汲取什么思想，主要是学语言。比如，他写与自己妻子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只八个字：“颔之以首，笑之以目”，一个淑女形象跃然纸上。本书最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后来不少社又争相出版，有白话本、插图本等各种版本。我到处给人推荐，大约买了六七本送人。它实在是我国散文发展到古代社会末期的又一变格，又一个新的高峰。杨绛老先生还仿其格写了一本《干校六记》，可见它在学人心中的地位。

正如古典诗词对我写作的帮助是意境，古典散文对我的帮助是气势。

文章是要讲势的，所谓文势。“文势”是中国古典写作理论中珍贵的遗产，这一点现代散文比较弱。苏东坡讲：“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古文中的好文章大多有气势。往往一开头就泰山盖顶，雷霆万钧，先声夺人。我上中学时，语文课上老师讲的一段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韩愈每写一文时，总要重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太史公的一口气。到后来我也开始作文时深切感到要从经典借气，为文时经常要重读名文，或者曾背过的经典文章会不自觉地跑出来助势。如《红毛线，蓝毛线》的开头：“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的开头：“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就是借的《十思疏》《过秦论》这类文章的势。其实不只是文章讲势，长篇小说的开头也讲势，中国四部古典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最有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都是“文章五诀”中的“理”字诀开头。我在《二死其身的彭德怀》中有一大段叙述：“彭德怀行伍出身，自平江起义，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与死神擦边更是千回百次。井冈山失守，‘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未死；长征始发，彭殿后，血染湘江，八万红军，死伤五万，未死；抗日，鬼子扫荡，围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彭奋力突围，未死；转战陕北，彭身为一线指挥，以两万兵敌胡宗南二十八万，几临险境，

未死；朝鲜战争，敌机空袭，大火吞噬志愿军指挥部，参谋毛岸英等遇难，彭未死。”是借自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而入选中学课本的《晋祠》则有《小石潭记》的影子。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势发力。

阅读现代散文，我是从读报刊文章入手的。我上初中时，家里订有一份《人民日报》，大人看正版，我看副刊。那时报上的名家有秦牧、杨朔、刘白羽、方纪、魏巍等。当时《人民日报》开了“笔谈散文”栏目，一直到现在还流行的“形散神不散”就是那时提出来的。但我一直觉得这个观点是个伪命题，是自搭台子自唱戏，抓住一个“散”字自以为很妙，就衍伸开来做文章。其实散文相对于韵文当然是散的，莫非还要去做“新八股”？而“神”则从来也没有人说可以散。后来我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订各省的报纸，我就每天把副刊扫一遍，阅读量很大。报刊文章的特点是与时代贴近，你不会陷入古籍或自我沉醉，陷入迂腐。缺点是水平不齐，一般来说浮浅的较多，多少天才眼睛一亮遇到一篇好文章。但这正可训练你的鉴别能力，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打捞到一些好东西。如我数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的《笑谈真理又何妨》，还有一篇小品，以推磨磨面，比喻人才的使用：“只要心中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至今仍历历在目。对报刊的阅读随时代的发展又增加了网络阅读，更加快捷，信息也更多。如十八大前，我们对内官僚腐败对外示弱，舆论很不满，我在网上看到普京对内低调对日强硬的几条新闻，随即写成短文《普京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人民日报》2013 年 7 月 18 日）。还有在网上看到某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六千字的五言长诗，正值春节，大年初一无事，便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28 日），瞬间即点读数十万次，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阅读空间。其实，阅读与写作是一

个连续不断的因果关系，你阅读了别人的东西，又转化为作品服务他人。阅读是面，写作是点；阅读是吃进草，写作是挤出奶。在报刊、网络上的阅读是撒大网，如羊在草原上吃草，大面积地吃，夏牧场不够吃又转到冬牧场吃，一般约十亩草场地才能养活一只羊，我就是一头阅读散养的羊。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散文出现了一个高峰。从中学到参加工作，这一段时间一直读的是“革命散文”，虽也有艺术性好一点的，但总不脱解说政治的套子。直到“文革”结束，我读到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选》，比较集中地读到了30年代鲁迅、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让我知道了文学，特别是散文第一要“真”，要有真情实感。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是必须担负说教任务，审美才是它的本行。朱自清的《瑞士游记》：“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蓝的，真平得像镜子一样。太阳照着的时候，那水在微风里摇晃着，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宠爱，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湿软。”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并永远不忘。他们对情和景的解读方式几近完美，这对读了多少年“革命散文”的我无异于一种文学回归，是我的“文艺复兴”。30年代散文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很大的，是散文家夏丏尊翻译的一篇散文《月夜的美感》。这篇文章是我读陈望道先生所著的《修辞学发凡》时读到的，他在书中作为例文使用。我却如获至宝，作为范文研读（可惜1980年再版的《陈望道文集》中此篇被换掉了）。这是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而且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写法的文字。我特别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给《名作欣赏》杂志。文章发出后有热心的同好者来信告知作者是日本作家高山樗牛。而且陈版所引文字不全，还缺另外五个小节，

《名作欣赏》杂志又将全文补齐重发了一遍，这实是一段文学佳话。中、日文的表达方式肯定有所不同，这篇散文的文字魅力应该得力于夏丏尊的翻译，但文中独创的推理表达则是日本作家的发明。作者好像决心不让你先去感觉，而是让你来理解月色的美，在理解中再慢慢地加深感受。一般文人最不敢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倒成了作者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我们平时说月色的美丽，一般总脱不了朦胧、温柔、恬淡等意。这里，作者不想再唱这个很烂的调子了，而是像做一道证明题一样来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朦胧、恬淡。你看他的步骤：先证明月色的青，再证明青在色彩上力量的弱，于是便有"柔"感，生出平和、慰藉之效；青的光不鲜明，于是有神秘、无限之感；便若有若无，这就是朦胧、缥缈之美。这种用推理、用逻辑思维来写风景真是太大胆了。我后来入选中学课本的《夏感》，还有刻在黄果树景区的《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散文，都是得力于这个启示。

从此我开始了山水散文写作，追求清新、纯美的风格。现代散文，我认为最好的是朱自清。朱之前我很崇拜杨朔，他的许多篇章都背过，但后来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模式。我小学时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的《社稷坛抒情》，还有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几千字的长文，也都曾背过。1988年，我把长期阅读散文的体会编辑出版了《古文选评》《现代散文赏析》，与《新诗五十六首点评》合为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强调读而后背的，广读精背，这是一个笨办法。

有阅读就有思考。作品是思想和艺术的载体，读多了就会分出好坏、深浅，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在对大量古今散文作品阅读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散文的真实?

第一，散文是表现一个真实的“我”，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情。不是小说，不能随心所欲编故事。第二，散文有它独立的美学价值，不能注解政治，套政治之壳。虽然由于那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一切艺术，文学、绘画、音乐等都曾背过政治的包袱，但散文在这方面陷得更深一些。关于散文的文艺批评尽管有许多眼花缭乱的理论，却很少触及这两个最普通的大白话式的原理，或者是碍着名家的面子，不愿去说。例如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明明是小说，长期以来被当成样板散文编入课本，收入各种选本。杨朔的散文影响更大，被收入大学、中学课本，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几成一个写作定式。1982 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第一次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十多年后，在中国作协为我组织的作品研讨会上，作协副主席冯牧老先生说：“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次看梁衡同志的这本书，有文章专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谋而合。”“他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这种缺点不光是杨朔一个人有，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为了验证我自己的这种理论，我 1982 年创作了《晋祠》，并于当年入选中学课本。

二、怎样突破平庸。

毋庸讳言，我们平常在报刊上见到的作品，平庸的占多数。这是一个社会现实。某次，一位文学编辑对我说：“我终年伏案看稿，就像被埋在垃圾堆中，心情十分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在跳出庸俗地服务政治之后，又胆怯地回避政治，大散文不多。也正如冯牧先生说的：“我不喜欢一些‘心灵探险式’的散文。杯水波澜，针眼窥天，

无病呻吟。这些散文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这不应该是我们散文写作发展的总体趋势。”1998 年 7 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以这一年为转折，我的散文写作由山水题材转入政治题材。以 1996 年发表《觅渡，觅渡，渡何处？》为转折，这篇文章也入选了中学课本。

三、什么是散文的美，怎样做到美？

我提出散文的“三层五诀”论。“三层”是描写叙述的美、抒情的美与哲理的美，即形美、情美、理美；“五诀”是形、事、情、理、典，五种表现手法。这是一个长期阅读思考的过程。1988 年发表《散文美的三个层次》，2001 年 7 月，在鲁迅文学院讲《文章五诀》，2003 年发表于《人民日报》。我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大量散文名篇，2009 年 7 月在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进行讲解，随后出版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在散文领域我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思考散文理论，一方面是创作实践。我的散文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山水散文，以《晋祠》为代表；后期是政治散文或称人物散文（其实仍是政治人物较多），以《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为代表。

三、关于科学知识的阅读

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苹果。一个记者、作家只读社会科学不读自然科学，他眼里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是学文科的，后来的工作也不是科技领域。但是误打误撞，进入

了科普写作。经过“文革”十年浩劫，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报刊上沉寂了十年后科普文字如雨后春笋。被耽误了的一代，有的恶补文学知识，搞创作；有的恶补科学知识，准备升学或搞科研。我出于好奇，也开始浏览一些科学故事。

那时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跑科学口和教育口。科技工作者思维活跃，读书多，常讲一些我所不知的、他们学科领域的故事，很吸引人，科学并不枯燥。我也常采访学校，看到学生读书很苦，而且不少人对数理化有畏难情绪，心里烦躁。我发现这原因不在学生，而在我们的教学不得法。科学和教育没有沟通。小孩子先有形象思维，数理是逻辑思维，很多学生一下子不适应。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想能不能转换思维，把课本里公式、定理的发现过程、人物故事写出来，让学生像读小说一样学数理化。我决定尝试一下。

第一步是找故事。读所有能看到的科普报刊，按照中学课本里的内容寻找公式、定理背后的故事。大量剪报，分类剪贴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几大本。除了剪报又摘卡片。那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百度等搜索，大学一入学的训练就是手抄卡片。我专门做了一个半人高的卡片柜，像中药店的药柜。只读报刊当然不够用，又读科学家传记，如《伽利略传》《居里夫人传》《达尔文传》等。读单本书不行，还得宏观把握科技进步的过程，又读科学史、工具书，如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之类。有事实和故事仍然不够，还得恶补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论。现在还留有印象的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国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俄裔美国著名科学家阿西莫夫的科普系列，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小册子《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等。我走的还是经典加普及的路线，读那

些大家的最好的经典普及本。如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964年版，一百多页，才三角七分钱一本。

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数学方面的。我们在初中就学过什么是“无理数”，这是个抽象概念，怎么还原成形象？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死后几个学生在争论老师的学问。一个叫西帕索斯的说，他发现了一种老师没有发现的数，比如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去除斜边，就永远除不尽。别的学生说，不可能，老师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你这是对师长的不敬。当时大家正在船上，争到激动时不能控制情绪，几个人便把西帕索斯举起来扔到海里淹死了。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作有理数，这个新数叫作无理数。这就是我小说里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年1月结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词:“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二十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此书作序。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科学阅读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充实了我的散文创作。我们常说，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就是说由宏观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学的

眼光看文学，至少写作时腾挪的空间会更大。比如，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伟人人格的魅力，谈到为什么他们虽已故去多年又让人觉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对论”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原子裂变，即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来喻人格“裂变”的能量。

在《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一文中，写到这个富裕村的陈列室里张贴有八百年前辛弃疾描写江南生活美景的词，又写到他们现在公共福利的分配方式，就用科学术语来解释：

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

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一个漂流的理论基因、科学基因。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辞上有一种格叫“拈连”，把本是用于描述甲事物的词汇移来说乙。如“相对论”“裂变”“基因”都是专用的物理、生物词汇，却用来说人和事。把科学思维、科学术语用于文学，正是一种跨界大拈连。拈连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喻，是隐喻。而比喻中甲乙两物是相距愈远，性质差别愈大，所产生的比喻效果就愈强烈。

因为阅读科普作品，同时又采访科技界，使我有机会参加有关学术活动。1984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思维科学讨论会，筹备成立思维科学研究会，我有幸参加。这种综合学科的研讨与文学界开会有很大不同。会议人数不多，一共才五十九人，但名家不少。我的偶像如钱学森、吴运铎、高士其等都出席了，还有 80 岁的心理学教授胡寄南，美学家李泽厚等。钱学森用一整天的时间做开场报告，后几天就坐在台下仔细听。大家自由争论最前沿的知识，主要是讨论思维规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不同及联系。就在这次会上钱学森提出五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灵感思维、社会思维和特异思维。耳听笔记，这是一种近距离的阅读，让我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个大扩张、大转换。自从增加了科学方面的阅读，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有这么大，思维方式可以有这么多种。自觉头脑比原先灵活聪明了许多。后来我与人合作写了一篇谈思维科学的文章，经钱学森先生审定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四、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

我在《文章五诀》中提出形、事、情、理、典。这个“典”是指经典、典故，特别是理论经典。什么是经典？常说为经，常念为典。经典标准有三：一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三是经得起重复引用，能不断释放能量。由于长期的文化积累与筛选，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经典。而更高层次的是理论和学术经典，特别是政治与哲学方面的经典。

一般人，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常误认为政治、理论枯燥乏味，干瘪空洞，不如文学那样水灵、煽情。这是因为文学与理论属不同的思维体系，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逻辑思维。人们虽感觉到了这个不同，但不知道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只有借助理性的逻辑思维才会更深刻，从而更形象、更生动。就如我们常说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记忆。这中间有一道门槛，翻过之后，就是一片高地。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这是一个半被动、半主动的经典学习运动。说它被动，是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一场运动，人人学，天天读，你不得不学；说它主动，是因为毛的文章确实写得好，道理深刻，文采飞扬，只要一读开，就能吸引你自觉地读下去。

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不认真听课，却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子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

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鲜词，我不觉眼前一亮，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是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文的，并不为学政治，是为学语言，学文章。后来我逐渐通读了《毛选》四卷，还精读了不少篇章。之所以能学下来，政治压力是有的，但主要还是文章本身的魅力。要不，毛之后其他领导人的文章也曾大量公款派送、组织学习，怎么就是学不起来呢？

我对马、恩著作的阅读也是半主动、半被动的。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革”以前，囫囵吞枣，如私塾背书一样，只是储存了下来；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结合形势重新验证马恩的观点，又去主动温习。因为我是学文科的，后来又做新闻，一方面是专业要求，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所以读了不少也忘了不少，留下印象的有《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一些原理是刻骨铭心的。比如，“环保”这个概念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可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抵消了。”（《自然辩证法》）这种深刻、彻底，你不得不佩服。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大失败后重新发现马恩，你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得对，

是我们过去念歪了经。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多么朴素的真理。一部经典不可能全部背下来，只要做到读懂原理，知道观点，记住一些警句，要用时能很快查找出来就够了。

我们不是常说文学是人学，是社会学吗？不是常说爱和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吗？你看马克思怎么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对你的爱，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1844 年经济学手稿》）

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最有用的是他的两本哲学书《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可以作为写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论文、讲话，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反对党八股》等，在 1949 年解放战争后期代新华社起草的《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批社论、时评，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与文学才华。这种阅读对我来说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学了。后来 2013 年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时，我将这个多年来的阅读体会写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大家毛泽东》，《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本文与另一篇在周恩来诞辰百周年时发表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可以说是我对毛、周两个伟人的阅读笔记。

对经典，你读不读、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它客观存在、确实有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没有读，其实是吃了暗亏。就好像说一种好食物，你不知道，没有吃过，但它确实好吃。马恩对未来社会的猜想，也许不能实

现，就像天文学家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猜想，现在也还没有得到验证。但你不得不承认这种理论的伟大和思维方法的科学，要不它怎么能造就数百年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同理，虽然毛泽东后期有重大错误，但在他领导下确实改变了旧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另外，还有他的个人才华和魅力。经典不是一份名人豆腐账，不必拘泥于马恩哪一年到伦敦、到巴黎，与费尔巴哈、黑格尔、杜林什么关系，也不必拘泥于毛泽东当年到哪里，说了什么话。理论经典让人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是后人的刻舟求剑，过度解读，故意神化、僵化，拉大旗当虎皮。就像儒家经典一样，马恩经典也一遍又一遍地被人涂抹、改塑。随着历史潮水的退去，经典突显的只是原理，其他都已不重要。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经典的阅读与出版始终有两条路线。一是真正的学术大家、出版家，为读者着想，筛选出最基本、最精华的东西，做成最便宜的普及本，书愈做愈薄，人愈读愈有味；二是拉经典扯大旗，靠经典吃经典，为出书而出书，不停地注释、索引、解读，书愈做愈厚，让人愈读愈烦，而公款出版又加重了这个恶性循环。经典要转化为有效阅读必须有负责任的、高水平的、联系实际的、深入浅出的普及环节。可惜政治经典的普及做得很不好，远不如文学经典。我印象深的好的普及本仍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我常用的一个本子是《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要》（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另外，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艰深、枯燥、可怕，他们并不缺少文采。如马克思谈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

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他还这样来挖苦书报检查制度：“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毛泽东谈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这种机智、幽默，现在的政治家、文人都是很难企及的。

政治理论经典对我写作的帮助是学会直取问题要害，找到打开读者思想大门的钥匙，登上可以俯视山下的制高点，也就是找到文章的“文眼”。前面说过韩愈为文时要向司马迁“借气”，我则常向马、恩、毛“借力”，借政治之力。在文章看似山穷水尽时，又翻上一层，极目千里，借助政治的高度，是为政治散文。比如，改革开放后农村富了，有钱怎么花，怎么建设新农村？有各种典型，但都摆不脱好吃、好住、高消费。我在江苏看到这样一个典型，他们一切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生活自由、劳动自由、精神自由。村里办有多种企业，早已做到已充分就业，但每家还留了几分地，为的是留住乡愁，享受田园生活的自由。连敬老院也分几种类型，养老方式自由选择。这不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就是恩格斯讲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

由。”于是我写了《在蒋巷村的共产主义猜想》。摘要如下：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到现在还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遥远和渺茫。于是共产主义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我的所经所见大约有两种。一是解放前后“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最初级的“解放版”。二是“人民公社”版，一场黄粱梦。而这次我却看到了一个与前两个不同的比较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版本，我把它叫作“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

蒋巷村不大，一百八十六户，一千七百亩地，八百口人。四十年前曾是一块低洼闭塞的蛮荒之地。村展览室的墙上张贴着一首辛弃疾八百年前描写江南农村生活的词《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追求。现全村已人均年收入两万多，学生上学全免费。老人，55 岁开始每月补三百到六百元，如身患重病者，月补四百元。他们说这是“按劳分配加按老分配”。

按照恩格斯说的那三条，最难的是第三条‘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工作自由已不必说，而养老一项，难在怎样既保证老人既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还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蒋巷村却有办法。全村 55 岁以上老人两百个，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两百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厨、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摩擦。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

蒋巷村的现状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但它肯定是人们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荡的幽灵”。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在蒋巷村我又重读了一遍共产主义的猜想，也读出了一点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蒋巷村，本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水乡的富裕典型，可以写成一般的新闻通讯、游记散文，但是我这里调动了过去对马恩经典的阅读，将江南美景、新村变化、数字事实和传统的小康观念，用“共产主义猜想”这个主题来统领，开辟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和审美角度。

“典”当然主要是指经典的原理。但是典型的人和事，甚至经典的句式都可以拿来引用、翻用，以增加文章的力度和情趣。比如我们年年喊反形式主义，就是反不掉，某地开人大会，领导炫才，工作报告居然是一首六千字的五言诗。我写了一篇评论《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结尾时说：“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跃’，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马克思的原意是，从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顺便再说一下对其他经典的阅读使用。前面讲过经典的作用是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可以指导工作。我在阅读中，总注意寻找那些可以指导写作的理论依据，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1983年前后因对杨朔散文的阅读，产生了疑问，这涉及形式美的问题，便去读美学方面的文字，最主要的有黑格尔的《美学》，并做了详细笔记。那真是一本很难啃的书，我从中只学到一点精髓，就是把握好三个关系：

第一，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黑格尔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是消耗、破坏它，换取自身的生存，是一种消费关系；二是研究它，并不破坏，是思考关系；三是欣赏它，保持距离，是审美关系。就是说，你把对象破坏了不美，研究得很透了也不美，有距离才美。

第二，把握事物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审美价值。既不能让形式妨害内容，也不能降低审美价值，“把它降为一种仅供娱乐的单纯的游戏”。

第三，把握审美的作用，即艺术对人的作用。人是由动物变来的，难免有动物性的粗俗的一面。黑格尔的原话是：“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一体。但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们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们解去自然的束缚。”就是说艺术创作不能粗制滥造，不能媚俗，而承担着净化人的心灵的责任。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审美原理，就像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力学原理，用它可以解答艺术、创作、欣赏、文艺批评中等一些常见的疑问。比如经常困扰我们的，引起读者不满、家长担忧的作品低俗的问题。2010年媒体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我曾写了一文《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就是说人面对一物会有三念：占有的欲望、冷静的思考和愉悦的欣赏，就看你选择哪一种。这三种念头第一种源于人的动物性、物质性，

可称为“俗”；第三种体现人的精神存在，可称为“雅”。俗与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这就是“通俗”。

小说、影视作品中最难处理的“性题材”问题，根子也在这里。作者的着眼点，是刺激读者的动物性的原始性欲，还是启发他的审美，这也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区别。一个美女在色狼眼里是满足性欲的消费对象，在医生眼里是救治的对象，在画家眼里是线条、韵律的美感。人身上动物性与人性共存，就如人体内癌细胞与好细胞的共存。同样是一张裸体画，在一流画家手里是高雅的美，在三流画家手里是放荡和粗俗。人的阅读需求从低到高、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共有六种，分别是信息、刺激、娱乐、知识、审美和思想的阅读需求。这就看作家、艺术家怎样去激发读者的不同需求，是用“慈祥的手”替人拆开“契合一体的粗野性和野蛮性”，还是用“罪恶的手”诱导他回归动物性。反映在作品上的不同就是高雅、低俗和通俗。

经典作品里总是有原理体现。马恩作品里有一般社会原理、哲学原理；毛泽东作品里有中国社会的政治原理；黑格尔的作品里有美学原理。哪怕每一个小的学术分支，只要它够得上经典，就必然会揭示出某一部分的原理，或者可以说，只有含有一定原理的作品才能够称得上是经典作品。这也反过来说明，阅读，不管读哪一类作品，一定要读经典，这样你收获的就不只是粮食，还有种子；不只是几条鱼，还有渔具、渔法。当然再经典的作品也只能作为客观的阅读对象而存在，要收到好的阅读效果，还得发挥阅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修辞学是一个很小的、专业的学术分支，但是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

1968年“文革”后期，我大学毕业后有一年的时间在内蒙古农村劳动锻炼。正苦于无书可读时，在灶台上见到一本已经撕破书皮的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陈是个老革命家，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当年与陈独秀一起做建党工作，脾气不合，就去做学问，又成了中国研究修辞第一人。修辞学很专，我也无心专攻这一行，但我读后从中悟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这再次说明经典的理性光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还没有做新闻工作，这本书里也没有新闻二字。等到我后来当记者，再后来到新闻出版署从事管理工作，新闻界总有一个摆不脱的阴影，就是有人建议“消息散文化”，一时在新闻界形成潮流，好像这是写好新闻稿的出路。为此《新闻出版报》开展了半年的讨论，多数来稿居然也同意这个观点。讨论结束时报社请我写一篇文章，虽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确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理由当然有很多条，其中一条是按《修辞学发凡》给出的原理，修辞分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

消极修辞主要用在应用、实用类文体，如文件、通告、科学著作、教科书等，典型代表是法律文件、行政公文，要极其客观准确；积极修辞用于文学写作，小说、散文、戏剧，典型代表是诗歌，可以任意想象、浪漫挥洒。消极修辞，注重表达事实，以让人“明白、了解”为目的；积极修辞，注重表达情感，以让人“感染、激动”为目的。消极修辞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消极，不张扬、不夸张，恰恰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给文字大家族排出如下序列：法律——文件——教材——各种应用文——新闻（以上消极）——（以下积极）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戏剧——诗歌。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序列表中新闻处于消极修辞的末端，靠近积极修辞处，但从性质上讲，它还是

属于消极修辞。有了这个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张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学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谱图，对号入座一目了然。

假如我们允许“消息散文化”，那么新闻与文学将没有边界，直接的恶果是假新闻的合法化，是记者天马行空地胡说、煽情。

这样用修辞学原理就轻松解开了新闻界这个争论已久的难题。这是理论的力量，经典的力量。

五、有阅读，人不老

大约在三十多年前，1984 年，我的人生有一个小挫折。也许是境由心生，我注意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虽都落实政策回城安排工作，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很多人身体垮了，学业荒了，不能再重整旗鼓，只有坐家养老，等待物质生命的终了。有一部分“右派”却神奇般地事业复起，演戏、写书、搞研究等，又成果累累，身体也好了，精神变物质。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停止读书，反而趁机补充了知识，补充了生活。我当时有感写了一首小诗以自勉：“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也就是这两年，我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和重读了一些理论经典。我的一位官场朋友，受挫折后就去读书，他说读书可以疗伤，后来很有学术成就。“文革”中很多学者都是靠读书挺了过来，并留下了著作。毛泽东在去世前的七十多个小时还在阅读。只要有阅读，人就不会倒，不会老。

什么是阅读？阅读就是思考。阅者，看也。但是比看要深一些，它不是随意地、可有可无地观看。是有目的的、带着问题观看，是一个思维过

程，边看边想。比如我们说：阅兵、阅卷、阅人、阅尽人间春色，就不说“看兵、看卷、看人、看尽人间春色”。而对不需太动脑子的、浅一点的东西，消遣、娱乐的，则说看，不说阅。如看电影、看风景、看热闹、看耍猴，不说“阅电影、阅风景、阅热闹、阅耍猴”。所以当我们说阅读的时候，心境是平静的、严肃的，也是美好的、向往的。

广义来说，人有六个阅读层次，前三个信息、刺激、娱乐，是维持人的初级的浅层的精神需求，可以用“看”来解决。后三个知识、思想、审美，是维持高级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则只看不行，还要想，这才是真正的阅读，可称为狭义的阅读。现在电子读物盛行，主要承担提供信息、刺激和娱乐的任务。它的特点是快捷、方便、形象，但也带来另一个问题，浅显、浮躁，形象思维多，逻辑思维少。这有点像计算器的普及，很多人不再费力心算。德国有一个街头测问，多数人不能背九九表。这作为生活实用可以，但作为人的思维训练，生命进化，却是一大缺陷。钱学森年轻时在美国读书，几个好朋友相约，大家都不看电视。他到晚年还自己剪贴报纸。文字是有一种神奇的诱导人思考、丰富人精神的功能。我注意观察，很多干部家里没有书架，这是一种精神缺失。一次给干部讲读书，我说阅读是为了精神生命的成长和延长，特别是小孩子，不可少了阅读。就算你自己实在不爱看书，为了后代，在家里也要装出爱读书的样子。散场时，有人边走边说：“今天回家后，不读书也要装装样子了。”一说到后代，这个道理一下就明白了。

《名作欣赏》2015年第五、六、七期



我的阅读与写作

定价：39.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梁衡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有很多名篇入选了中学和大学的教材。本书是梁衡先生五十年写作生涯中，关于如何读书、如何写作的文章结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阅读"，收发了梁衡先生的读书心得，有些文章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轰动，既适合文学爱好者引高阅读水平，也适合中学生大学生拓展阅读视野。第二部分是"我的写作"，梁衡先生既是记者编，也是散文家，这一部分收录了他的一些文学评论、新闻写作方法及文学理论研究。能帮助不同层面读者提高写作水平。第三部分是"序与跋"，是梁衡先生近年来为自己的图书及其他人的图书所写的序和跋。

本书中的文章几十年来散见于各大报纸刊物，这是头一次结集出版，内容翔实，装祯精美。是提高阅读与写作水平的好书。



觅渡觅渡

定价：36.00元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梁衡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有很多名篇入选了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七年前梁衡出版了散文集《觅渡》，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至今广受好评。本书是《觅渡》的长级版，收录了梁衡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评论与写作体会。全书分为“伟人如山”“青史如镜”“山川如我”“人生之美”“域外之风”“为文之道”六个部分，几乎囊括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散文、杂文与研究。尤其是在保留老版精华的同时，收录了七年来他新发表的、在全国引起反响的多篇散文。本书既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也大学生和中学生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水平的指导读物。